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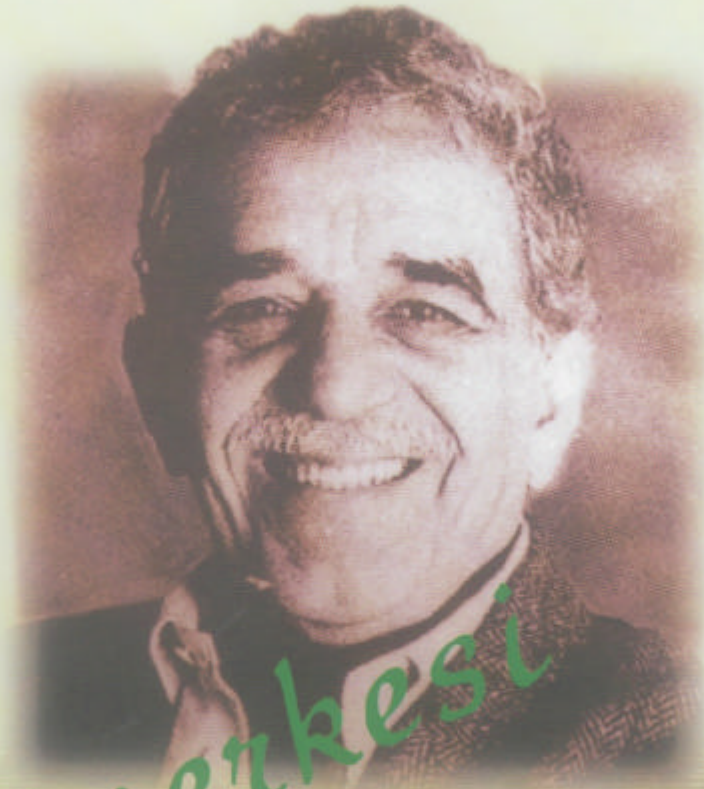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文学艺术家卷

马尔克斯

于凤川编著



Maerkesi

GABRIEL GARCIA MARQUEZ

辽海出版社 ●

引言

“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1996年5月2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瑞士《周报》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作为日内瓦国际书籍报刊沙龙发起单位之一的《周报》，曾要求世界各国的18位文学评论家写出健在的十大作家的名字。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得13票，名列榜首。《周报》说，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并赞扬了其1967年出版后已销售2000多万册的代表作《百年孤独》。

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继“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堪称“当代的塞万提斯”。阿根廷小说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始人之一博赫斯则称他为“哥伦比亚的莎士比亚”。

瑞典文学院曾说，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不能不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独特天地……自50年代末，他的小说就把我们引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的现实生活。”

笔者在哥伦比亚工作期间，时时处处都能体会到：哥伦比亚人民为自己的祖国出现这样一位20世纪的文学大师感到光荣与骄傲。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在中国在世界如此响亮，是与他的《百年孤独》分不开的。这部名著自1967年在南美洲的阿根廷问世后，迄今历久不衰，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他的《家长的没落》又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拉美独裁统治者。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和《爱情与魔鬼》又别具一格地歌颂了幸福的爱情，鞭挞了邪恶。

然而，绝不能忘记，这位生于1928年3月8日的文学大师是从小镇阿拉卡塔卡，即《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走向辉煌的。他天生聪慧。幼时家境贫寒，且兄弟姊妹众多，父母将他寄养于外祖父母身边。外祖父去世才回到父母那里。

12岁的时候，他便乘船去外地的西帕吉拉寄宿中学靠助学金求学。就是在这所荒野上的中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西班牙抒情诗人希梅尼斯、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继而钻进卡夫卡、福克纳和海明威的小说世界，一发不可收拾。

命运之神将他从荒凉的中学引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父母望子成龙，希望他成为社会上吃香的律师，他却对文学着了魔。他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以新颖的风格，活泼生动的语言，打破了当时文坛的沉静，获得了哥伦比亚全国文艺家协会奖。

然而，在大学里加入了自由党的马尔克斯，竟因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爆发了“千日战争”，不得不中途辍学。他先到卡塔赫纳，后经朋友介绍来到巴兰基利亚一家报社任编辑。虽然他住的房间四壁空空，只有一张写字桌和一张单人床，却不忘文学创作，积累了厚厚一本创作素材，为写中篇小说《枯枝败叶》打下了基础。

春风送暖，他又回到阔别几年的首都波哥大，被《旁观者报》聘为编辑。但好景不长，他因写报告文学《一个遇难者的故事》触怒了当局。

《旁观者报》为保护他，将他派到罗马、巴黎当记者。旋即《旁观者报》被查封，他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成了一个文学流亡者。在食不果腹的困境里，他博览欧美文学名著，汲取精华，以自己收不到薪水的亲身体会，写出了他的得意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1956年，他离开巴黎回到波哥大，与等他4年之久的姑娘梅塞德斯结婚。1957年他离开内战阴影笼罩的祖国，担任《旁观者报》驻委内瑞拉记者。1959年，他以记者身份访问革命刚刚胜利的古巴，受到热情欢迎；同年被古巴官方通讯社拉美社聘为驻波哥大特派记者，1960年改任该通讯社驻纽约分社副社长兼驻联合国分社记者。

作为记者，他在与美国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对美国的强权政治与侵略本性有了深刻认识，他结合拉美经济的发展与专制主义的矛盾等活生生的现实，以充满魔幻色彩的拉美大陆为背景，在神秘的美洲文化及非洲与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博采欧美文学之长，打破拉美传统小说的种种模式，与一批杰出的拉美作家一道，创造出当代拉美的“文学爆发”与魔幻现实主义，使拉美文学走到世界的前面。他的力作《百年孤独》与《家长的没落》就是当代拉美小说的代表之作。

他对哥伦比亚著名记者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说：“对于《百年孤独》我完全有把握，它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它最像我童年时代所具有的诗的概念，然而又最像我未曾见过却是从我的思想里取出来的那样的国家。”他还说，他的写作“热情来自哥伦比亚现实神奇而美好的特点”。中国读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陌生，他也了解中国。当他担任拉美社记者时，曾多次前往新华社驻古巴分社，阅读新华社编发的西班牙文电讯稿。1990年10月15日，他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从日本东京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国贸大厦。

马尔克斯

第一章 童年·家教·家族

传记作家们都这样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不应该从他的出生写起，而应该从1908年10月19日那天写起。因为那一天，居住在拉瓜希拉州巴兰卡斯的尼科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上校，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梅达多·帕切科。这一事件迫使尼科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大迁移，直到1910年，他才来到马格达莱纳省的阿拉卡塔卡。这便决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个人和文学命运。

当时的阿拉卡塔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的地方。尼科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在这里定居下来，建起了自己的房屋。他的宝贝女儿掌上明珠路易莎·圣地亚加，出落得婷婷玉立，越来越漂亮。于是，他认真地研究了周围的环境和女儿的条件后，就决定让女儿和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结婚。这样才生育了20世纪哥伦比亚最重要的人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于1928年3月6日出生于阿拉卡塔卡，即如今闻名于世的马孔多，《百年孤独》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蒙老师，即他的第一位教师是罗莎·埃伦娜女士。是这位慈祥的女教师教他读书识字，也是她为他的诗歌启蒙。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曾经说过，这位老师教给他的那些诗歌将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双重助产士”是胡安娜·德弗雷伊特斯。因为是她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生，让他顺利地来到人间；又是她鼓励他长大后要成为一名作家。她曾给幼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朗读过几十本发生在加拉加斯的故事，还告诉过他，当时的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永远是个“坏蛋”。

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是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他俩是“胎儿期”的朋友，两家是邻居，他们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还经常往来。当他们该上幼稚园和小学时，两人还是在一块儿。美好的童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那里充满和谐与温暖，他被外祖父母、阿姨、表姐及友人的爱抚和关怀的气氛包围着，他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

外祖母的文史知识相当丰富，经常跟他讲些生动而离奇的故事，培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像力。实际上，这位作家是由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抚养大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对他的成长和文学创作起过颇大的作用。他说，是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养育了他。当他出生以后，他的妈妈和当报务员的爸爸把他留在外祖父母家里，一道外出工作了。他在那里，一直长到8岁，到他的外祖父去世为止。因此，对他走向文学之路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外祖父和外祖母。

外祖父家有幽静而宽敞的住宅，室内的家具和陈设都带有点儿魔术师惯用的道具的特点，充满一种魔幻色彩。每当夜晚来临以后，房间内就成了一个奇怪的世界。那里的祭坛供着众多神像，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使人觉得它们都活了起来。而他那慈祥的外祖母又每每在

夜间给他讲述可怕的故事，一种恐怖的感觉给他留下极为难忘的深刻印象。而外祖母讲述故事使用的句子既生动又简练，仿佛碑文似的，十分巧妙。

由于外祖母讲故事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之深，使他成为大作家以后还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外祖母确实说出如碑文那么简练的句子，我得出的结论是，人物应该这样讲话，我笔下的人物注定这样讲话。在我写作之前，我外祖母的话就使我很着迷。她说的事又是不寻常的，并用一种我现在回忆起来仿佛是古语那样的词语。在那个时候，即60多年以前，当时还使用古语。后来，我对她说的那些话进行过考察，结果发现，那些话的含义和当时听到时我所想像的有点儿不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对他非常疼爱，那慈祥的形象给他的童年留下最珍贵、最令人怀念的记忆。加西亚·马尔克斯8岁的时候，外祖父去世了。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使他好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兴味索然。外祖父是上世纪末期内战中的一名上校，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他的突出特点是勇敢和果断。

外祖父是家长，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家里的上校。他是这个充满女人之家的惟一男人。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外祖父家里后，是第二个男人。外祖父既慈祥，又有权威，尽管好像大家都不太理他。

当然，在一个满是女人的世界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众人绕着转的太阳。外祖母的名字叫特兰基利娜。她既德高望重，又最爱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得出结论：从那时起，我形成的印象是，女人的权利实际上是转动世界的权利，这好像在我的书里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这样认为的，直到一位文学批评家在分析他的书时得出上述结论为止。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批评家分析他的女性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女人是世界的中心，她们保持着人类的连续性，而男人则在做着历史的疯狂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批评家的这一结论给予了肯定。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受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影响颇深，他在那个温暖的家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初岁月。外祖母给他讲的那些生动可爱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了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外祖母讲故事时使用的语言甚至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人物的道白。

童年生活环境的奇特，亲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现实生活思维的形成，发生了颇大的作用。在他的思维领域，虚构与真实之间、幻想与感知之间，并不是对立的，似乎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这一点在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中随处可见。

随着岁月的流逝，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渐渐不再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姓名，而喜欢叫他卡博或者卡维托。这一称谓便成了他的著名绰号。如今这个绰号也出现在报端，因为人们都喜欢这样爱称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是镇上的报务员，他会弹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同时他的文学造诣也不浅，会写些不发表的诗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在家里既慈祥又很有权威，因为她有12个子女，使她成为权威的中心。可以这样说，她创造出一种行星的体系：她的12个子女遍布本国和世界各地。她是一位很称职的女家长，她的子

女都处在围绕着她转的轨道上。

卡博的母亲身体健康，这位 90 岁高龄的老人，不仅养育了这位伟大的作家，而且还是他写作最好的老师之一，因为卡博写作的某些素材是他母亲提供的；同时他的父亲也对他的写作有所帮助。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他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上，就有他父母的影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系图告诉人们，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和路易莎共有 12 个子女，或者说，他们是阿拉卡塔卡的 12 个孩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居仅留下尼古拉斯·阿里亚斯，他是继续忠于阿拉卡塔卡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惟一亲属。作为卡博的表兄，他始终维护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旦有人提出“卡维托对于看着出生并赋予他灵感的村庄缺少管理”时，他就出面解释，摆脱僵局。

对于前去参观的吉卜赛人、市长和艺术家们提出的质疑，尼古拉斯总是保留同样的答复：

“耶稣对耶稣诞生情景模型是怎么对待的？把它放在水里？把它放到街上？谁没听说过议论耶稣诞生情景模型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们怀着梦想从故土阿拉卡塔卡来到巴兰基亚，又像那一次从阿波利纳尔·莫斯科特来到马孔多一样，他们怀着梦想来到苏克雷。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带着 7 个孩子到那里的。在那里，孩子的数目变成 11 个，实际上是 12 个。接着，慢慢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寻找自己的发芽生根之地。

海梅起到了两代人之间的桥梁作用。作为行走在最不安全地区的向导，这位住在圣玛尔塔的土木工程师，深入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姐妹们最隐秘的历史里。

路易斯·恩里克是家中的老二。人们从他的身上能隐约地看到一种放荡不羁与冒险的精神。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摄影占据了她的岁月，他企图摄取他看到的所有人的魂魄。他的大部分时光是钻进暗房，在“人物”和“风景”中度过的，他发现那里充满生活。而吉他占据了她的另一半时间，他弹奏的是那些感人的昔日之歌。到目前为止，谁也不可否认，他的和声使人着迷。

光阴荏苒，路易斯·恩里克的思想感情人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他的室内充满了书籍，他竟成了一位电脑体系专家。海梅说：“他如今住在巴兰基亚，他的时间都用在电脑上，还给他 18 岁的女儿指出摄影的秘密。”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妹艾达·罗莎希望成为传教士，家庭慢慢看着她如何接近上帝，一天，她终于进了修道院，仅仅带个手提箱。她迈着坚定的步子，腋下夹着一部《圣经》，连头也不回地向麦德林走去。她用去 25 年时间，才渐渐认识到她的才能是在另一方面：教育。这时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活泼愉快的姑娘了，生活使她变了。她不吭不响地定居在巴兰基亚，尽管她从未结过婚，可人们都喊她“草帽大妈”，因为她活着是为了教育侄儿们。

利贾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另一个妹妹。当卡博任《旁观者报》驻外记者，在欧洲继续企图打开文学世界之门的时候，在他另一边的利贾却随着时光的流逝，成了家庭的档案员。她让钢琴的音韵悄悄消逝，整

个下午坐着不动，决意整理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们的历史。她边作记录边寻找照片，从各个方面积累资料，一直工作到感觉疲惫不堪和犯起了愁病，才终于绘制出一幅家系图来。

尽管从她十分幼小时人们就对她说，道路就是一部天主教的教义，可利贾却决心从摩门教的一边打开缺口。母亲也曾劝她小心谨慎，以免出事，可她只是微微一笑，仍坚持己见。据说，在她一生中只有一次爱情。她和安赫拉·比卡里奥结婚数年又分居了，但当报道他死的消息后，她仍继续想着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十分不同。虽然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之间的联系点是音乐，但各自的爱好使他们的性格各异。

当海梅钻研工程学时，其弟古斯塔沃却在电台上寻找机遇。多年以来，卡塔赫纳米拉马尔广播电台是古斯塔沃的躲避所。他幻想到一个遥远的娱乐中心去，在那里度过美好的年华。然而，一天，现实把他从音乐之网拖了出来，让他去当地地形测绘员，走遍了当地的山山水水。尽管阳光灼热到他的骨头缝里，可他的第一批文学作品竟问世了，写作成了他的另一种爱好。

古斯塔沃童年最新鲜的回忆，也许是他用难以怀疑的幸福塑造了几尊小小的雕塑艺术品。有人说，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们当中最慷慨的人。他现在定居在委内瑞拉，正领导着一个纺织厂。

生活使埃尔南多转了很多圈子。在他的计划里，没有当消防队员的打算，而是从事漫画创作，讲述故事，或仅仅将自己的才智献给生活，但他不得不一天又一天的穿上消防队员的服装。从第一天起，他就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每一场熄灭的大火里。他的最大幻想是成为一个创造伟大奇迹的英雄，所以他总希望大规模的火灾到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埃尔南多只能看着这种可能性如何远去，卡塔赫纳港口从未发生过令人悲伤的不幸。

阿尔弗雷多是家庭的幸运儿。他外表上最像加夫列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对待事物。自幼年起，他就拿兄弟们如何摆脱困境来取乐，他们都不需要他最低限度的帮助，因此听到他说得意话时并不稀奇，因为他毕业于生活的大学。

玛格丽塔也许是最具加西亚·马尔克斯们的人格素质者。她自小时候起，就扮演着妈妈的角色。她关注着兄弟们担忧的每件事，又是和卡博的成长有关的人物之一，因而特别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关心。她和母亲住在卡塔赫纳，曾在卡塔赫纳司库办公室工作过。

埃米仿佛是以蕾维卡到布恩迪亚家里一样的方式来到这个家庭的。一天下午。当加·马尔克斯们正在打点家什，准备去卡塔赫纳时，路易莎决定，带那个女孩——不是她的女儿——跟他们一道旅行，因为她丈夫的骨肉不能散落。自那时起，埃米便成了家庭中的成员。

丽塔是家中最沉默寡言的人。她和妈妈一样不做无根据的评论。她在卡塔赫纳阿古斯丁学校工作过。但现在她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关心她的五个子女和其中的两个孙子上。

埃利西奥和老埃利西奥的性格十分不同。他是一位作家、新闻记者和一个健谈者。他对新闻很感兴趣。他怀着这种兴趣，从精神分析的角

度来看待人。他是在首都圣菲波哥大的大街上成长起来的。他现在哥伦比亚有名的杂志《万花筒》工作，负责有关政治报道、新闻和通讯方面的编辑。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长兄，由兄弟姊妹 12 人为骨干组成的这个大家庭，正像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成长壮大。而他们的故居阿拉卡塔卡将继续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如今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居住在卡塔赫纳。卡城是加勒比海上的一颗明珠，由诸岛组成。它不但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设施，而且有殖民地时期的城堡和欧式建筑物。卡塔赫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它风光秀丽，气候宜人，被誉为哥伦比亚的窗口，不到卡塔赫纳就不算真正到了哥伦比亚。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间回首往事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他除受到外祖父母的影响外，加勒比地区对他的影响也颇大，因为他的家乡北邻加勒比海的偏僻热带小城阿拉卡塔卡。由于波涛万顷、浩瀚无垠大海的恩赐，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他正是沐浴着加勒比海的阳光雨露和风暴长大的。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受到这个地区的文化的熏陶，而且还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

特定的地域和历史条件造成了阿拉卡塔卡奇特的文化结构。这里先是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掠夺和压榨，后是长时间的内战与党派之争，接着是美国香蕉公司由盛而衰。这些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里都有体现。

在谈到生态环境的影响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说：“当我来到加勒比地区时，我的生物体便开始以一种最好的方式活动，仿佛我又一次把它置于它的生态环境中。当我把它从它的生态环境中拉出去，去地处海拔两千多米的圣菲波哥大或墨西哥城，或去欧洲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我回到卡塔赫纳后，一切又使我正常了，我便开始良好地思索。我没有写过一本它的根不是扎在加勒比地区的书。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不会看别的世界。我的任何经验，我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如若不跟加勒比地区和我的加勒比出生地联系起来，我就不理解。因为这里是我起步的世界，是我活动的世界，是我理解的惟一世界。”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诸多著作中，不难看出，他笔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生长在加勒比海地区。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熟悉加勒比海中的每一个岛屿，也对加勒比地区的各种人物了如指掌，把他们写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也因为他是在阿拉卡塔卡这个拉美缩影的世界里泡大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在巴黎、罗马和瑞士生活过许多年，这对他的写作爱好，或者说对他成为一位著名作家，有何益处呢？

对于这个问题还请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来回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说：我认为，如果当时我不曾生活在欧洲的话，那么，我的拉美观念，尤其是我的加勒比观念，将是另外一种。是欧洲首先告诉我，我是拉丁美洲人，因为当时去欧洲之前，我只认识哥伦比亚。那时我二十四五岁，我仅仅了解哥伦比亚。当时我没有去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旅行的可能，所以我既没有拉美地区上、感情上的概念，也没

有拉美文化上的概念。但是，我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认识了阿根廷人、认识了墨西哥人、危地马拉人、玻利维亚人、巴西人，因此我才意识到，我属于这个世界，我不仅是哥伦比亚人，而且是拉丁美洲人。

根扎在拉丁美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从哥伦比亚他的祖国发现他与欧洲人的区别的，因为他是哥伦比亚人。他所认为的区别，不是因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好或者坏，而是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认为，文化上是不相容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能合为一体的。拉丁美洲能够一体化，但是，拉丁美洲不能和德国一体化，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以此引发出一个十分健康的观点，这个观点有助于使我发现我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违背这个世界的因素。因此，我很感谢欧洲，它教给我有关拉丁美洲，有关哥伦比亚，具体地说有助于我了解加勒比的一切。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愧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即加勒比的现实，当然也高于现实生活。他说：我生长在加勒比。我逐国逐岛了解它……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未能做到任何比现实更为惊人的事，我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借助于诗把现实改变一下位置，但我的任何一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根扎在加勒比，他不愧是一位最虔诚地反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现实的最好的作家。

第二章 追求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外祖父母的无微不至地关怀教育和影响下，自幼酷爱文学。两位慈爱的老人先教他绘画，再教他读书。他7岁的时候就读了《一千零一夜》，还读了很多童话故事，如格林的童话等。文学作品犹如阳光雨露，自幼时起就滋润他的心田。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刚刚8岁的时候，他尊敬的外祖父告别了人间，这给他的心灵留下一道深深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随后不久，他的父母就把他接回身边，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养育他8年的外祖父可爱的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36年回到父母身边，生活环境改变了，不仅家境不富裕，而且还有弟弟和妹妹多人，父母难以有时间和精力来细心照管他这个长子，这使他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不久以后，他被送到巴兰基亚港口城市读小学，一直远离父母和亲人。1940年完成小学学业。

12岁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送到西帕吉拉国立中学念书，成为一名领助学金的学生。这所中学位于冰冷的草原上，周围是辽阔的原野，无边的碧草，给年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禁增添了几分乡愁和对家人的思念，同时他也想到父母在他身上寄托的希望，使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学校离家很远，他每年有两次机会，乘着马格达莱纳河里的船，望着岸上的无限风光，由学校返回家乡，探望亲人们。

就是在西帕吉拉这所寄宿学校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和12个少年文学爱好者组织起一个文学中心，他们一共13人，所以就给它命名为“十三人文学中心”。

这13个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经常聚在一起，开怀畅谈。他们的议题，除共同喜爱的文学外，主要是筹划出一份杂志。杂志的名字就叫《地平线》，众人公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才华，所以就一致推举他担任主编。

学生办杂志首先是经费来源问题，然后是印刷困难。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又拿到首都波哥大去印刷。他们的心血开出了艳丽的花朵，首期《地平线》出版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学友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庆幸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然而，正当他们高兴的时候，杂志却被当时的总统阿方索·洛佩斯发现了。他看了杂志后，把那篇具有正义感的文章视为眼中钉，立即下令将《地平线》全部没收并且烧掉。长时间的努力被付之一炬。这毫无疑问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中生命最短暂的杂志。

挫折遏止不住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文学的酷爱。当他的大多数同窗都专心致志地准备功课，和物理、化学及数学打交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躲在学校里的小图书馆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从某种渠道进来的新书。他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开始练习写作诗歌和故事的。

在中学里，加西亚·马尔克斯迷上了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努涅斯·德阿尔塞的诗，后来在学校图书馆里又发现了法国早慧又早夭的天才诗人、不愧为象征主义运动典范的兰波和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的诗。不久，又沉醉于以诗人豪尔赫·罗哈斯为首的当时鲜为人知

的哥伦比亚“石天派”诗歌。

早在三四十年代在哥伦比亚文坛上崛起的青年文学小组“石天派”，其成员受到拉美第一位职业诗人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西班牙抒情大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内斯和智利诗人聂鲁达等的影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大胆的背叛，提出在惟有“石头与天空”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诗歌天地。多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石天派”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的帮助，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起过影响如今健在的“石天派”成员豪尔赫·罗哈斯是哥伦比亚当代最重要的大诗人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十分喜爱诗歌，他最初的文学修养是从诗歌开始的。如果说他中学时期开始读小说，那么他在小时候就开始读诗歌，到中学的时候，他便爱上了诗歌，读了很多国内外的诗歌。当他成名之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对文学的赞赏和迷惑是由诗歌开始的，我是个诗歌的伟大读者。我认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从写小说的修辞方法来看，那是一种纯诗化的语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不可能去关心语言和语言的含义，也不去关心语言的美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诗歌的特别爱好一直持续到他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以后。当时他对诗歌情有独钟的程度几乎达到狂放的地步，这可从他后来写的一部书《番石榴飘香》中一目了然。他说：“星期天，在无轨电车里度过令人忧伤的下午……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仁人君子，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

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先导，诗是他的语言大师，诗和他的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始终不忘那些优美动人的诗歌。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44年底结束了在西帕吉拉寄宿中学的学业。回首几年的中学生活，他颇有感触：尽管这所屹立在荒原上的学校夏日炎炎，蚊蝇肆意欺人；冬天，寒气刺骨，但是，自然环境再恶劣也挡不住他那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在学校小小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宝库。他不仅谦虚好学，而且善于团结学友，在毕业典礼上众人一致推他代表大家发表演说，他口若悬河，大谈崇高的友谊。他说：“通过一系列牢不可破的纽带，把我们这些今天将走向生活的青年人联系在一起，就是友谊。”

同学间的美好情谊伴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学友离开了中学，走向新的生活。

1947年，即他18岁那年他进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自由党。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保守党与自由党争夺权力，导致全国大战。1949年，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被杀害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中途辍学，迁居到卡塔赫纳。他在当地的大学继续学习法律的同时，开始为《宇宙报》撰写新闻报道。自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从事漫长的新闻事业。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呆了一年时间后，又来到巴兰基利亚。在这个他完成小学学业的海港城市一住就是几年。他勤勤恳恳为《先驱报》写文章，干的也是新闻事业。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巴兰基利亚市回到阔别几年的首都波哥大，被《旁观者报》聘任为专职记者。当时在《旁观者报》担当社长和总编辑职务的分别是吉列尔莫·卡诺和何塞·萨尔加。那时他们都还不满30岁。

《旁观者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事新闻事业的最好园地，也使他成为著名作家开辟了道路，所以他对在《旁观者报》工作的情景始终记忆犹新。难怪40年后，他坐下来写回忆录时，仍把那一段作为回忆录的主要部分，并要单出一部书，给这部书命名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深深的怀旧的心绪回顾当时在《旁观者报》工作时的情景，他说：我们在编辑部里侃谈的时候，实际上正不知不觉地在准备着第二天的报纸。过去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消息都是热的、及时的，能写出一条两小时前发生的消息，虽然在印刷方面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在我的青年时代，记者对发生的事从不发表看法，编辑部也不发表评述，只公布事实，读者了解的是发生的事情。现在将消息和评述混为一谈，这就需要一种程度极高的专业知识了。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上述的感触后说：“多亏了新闻工作，我才学会脚踏实地！”

他对哥伦比亚一批学新闻的学生谈了他的上述看法。他还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是要求采访我，而从来写一篇通讯……通讯是美国记者发明的一种体裁，我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体裁。叙述发生的事情，以便让读者了解，使发生的事活起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顿了一下，又接着谈下去。他说：“我所喜爱的我写的一部书，其实它是一篇大的通讯，即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我当时在波哥大的一家报纸工作，报社让我负责接待一个在船遇难后在海里幸存10天的人。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复述他的历险的情形。到了第三天，他慢慢记起来自己的职业。开始的时候，他跟我叙述当时的情形，或他认为的英勇行为的那些细节，接着他意识到，我感兴趣的是他在木筏上生活的小细节。这个故事每天都在报上发表，到了第六天，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不能不问我，这是小说还是真实故事。我当时回答他说，是小说，也是真实的故事。”

他接着说：“我们叙述到最后时，不再谈其他的事。我在向读者叙述在木筏上发生的事，企图把故事置于那个遇难者的死上。这是一篇通讯，当以书的形式出版时，的确没看到它像一部新闻书，但它的确是我所认为的一部书。我极高兴它是这样一部书，并且是我偏爱的一部书。”

由记者成为文学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新闻工作仍然十分关心。他于1994年提出，自己今后的任务是报道拉美的未来新闻。他决定创办一所新闻实习学校，或曰新闻作坊，以便为21世纪的新闻指出新的方向，培养出一批优秀记者，适应下一个世纪的需要。

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4年10月和阿根廷记者兼作家托马斯召集哥伦比亚新闻界的要人，在卡塔赫纳关起门来，聚精会神地研讨了哥伦比亚及拉丁美洲的新闻问题，决定开办一所新闻实习学校，轮流培养哥伦比亚的记者，或者培养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人才，使他们的新闻业务更上一层楼。

这所新型的新闻学校不进行考试，不发文凭，也不授予学位。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样做，对每个记者都是最好不过的，看谁适应这样做谁就最有前途。学校并不企图传授给记者什么秘诀，因为并没有成为优秀记者的秘诀。这所学校主要是交流经验，请有建树的记者去授课，以便向他们学习。

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的任务是起协调作用，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参加报道研究，比如拟定报道题目，把它写在黑板上，先分小组讨论，再集中起来，让大家各抒己见，从而提出一篇文章应该如何删节，怎样补充材料，达到尽善尽美。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具体设想是，为了便于真正地进行实践与知识交流，每个学习讨论小组以20人为宜。课程有摄影课、写作课、在电台和电视台的实际操作、掌握图像等。也为新闻界的经理人员提供方便，给他们授课，帮助他们理解新闻业务和记者。

学校的学员由各个新闻单位推荐，并给他们提供3项助学金。授课的地点将轮流在卡塔赫纳、巴兰基利亚和圣菲波哥大进行。授课时间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每期为一周或几周不等。

办学资金的来源，开始阶段由加西亚·马尔克斯资助，以后将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10多位记者朋友经过认真的研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如何用好的经验赶走潮流。所谓潮流是指当时新闻界存在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新闻的技术问题，新闻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前进，新闻记者的能力却不能同时跟上去，因此新闻界被迫从属于这种发狂的进程。技术的进步明显地超过了记者，而记者的能力不足，又没有时间顾及所有新闻渠道，致使新闻产品出现缺陷，缺少道德观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的经验证明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当今的新闻界正在对技术进行大力投资，而在人力上却投资少，技术使人惶惑不安。

今天的新闻与他当初在《旁观者报》当记者时的新闻不同。他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帮人，我们对问题相互切磋，开会讨论，那是一种连续的进程。我们那个记者时代与现在这个记者时代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即过去不能在社论和报道里发表见解，现在可以，这就需要时间。说真的，我认为，技术和时间的压力已成了报纸灵活性的敌人。”

在谈到如何看待新闻的道德观时，他认为道德观问题主要在于记者的道义，也有记者修养上的毛病。新闻实习学校要力图做到用真正具体的经验讨论分析这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看看应采取什么行动。

新闻实习学校的基本目的是为哥伦比亚记者提供最好的工具，掌握报道技巧，产生一种新的新闻。这种新的新闻，利用新的技术工具，在拉丁美洲恢复其最好的新闻传统。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与会的新闻界朋友分析指出：新闻界承认技术凌驾于记者的任务之上，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因为这可以决定，未来将需要更多的空间，以便深化报道，给予通讯和几乎消失的像时事这样的新闻以容量。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没有任何魔方，新闻的主要任务是交流经

验，使现有的经验更臻于完善。他希望每个记者都设法用他的职业和天赋成为一个幸存者或者胜利者。

他还说：“我认为，对现在的记者来说，最坏的弊端之一是，他们没有时间读书，连报纸也不看。记者工作需要时间，尽管对个别人可另当别论，一定的时间会使工作的效果更好……记者的产生像诗人、画家或音乐家的产生一样。”

为了办好新闻实习学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10多位新闻界朋友，就“新闻的教训”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卡塔赫纳《宇宙报》副社长门多萨·迪亚戈还对有趣的发言作了记录。

没有一种特定的方法，能用来辨认新闻在一件事上可供利用的材料。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围坐在摆满盖着蓝瓶盖水瓶的桌旁的记者说：“你感兴趣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也是感兴趣的。”

“在他那篇关于加拉加斯缺水的报道中出现的人物名字，是取自他住的楼房的看守。”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那么说，用桃汁代水修面不是真的啦？”一位与会者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那是一种隐喻。”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一腔甚至要把自己的白上衣胀破的热情对他说。

这不是对新闻报道中有关虚构与严格现实关系的正式讨论，但它的作用却更大。

作为记者，你对记述的一件事可作取舍，对事件的要素可以进行忠实的再创作；你或者抓住事件的实质，利用一个隐喻，使事件既有核心，又更加紧凑。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一个记者能够描写一起惨案的绝望情形，又不历数伤亡数字、损失的大小或为战胜惨案将采取的对策。一个记者，可以觉察出这场悲剧的真实程度，通过隐喻，使它在读者心里活起来。这样可能更加感人，又未捏造事实。读者能知道悲剧是真实的，感到震惊。这种写法胜于那种利用空洞的数字，没有悲痛灵性的叙述。

“我确信，新闻是文学的一种，”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但在记者和表达职能之间有差距，所以我们投入很多时间来学习日益尖端的电脑。”

经过这次讨论，才一致确认，如果新闻界的主人们，既能在记者的才能上进行投资，又能在技术成就上投资，新闻事业就将焕发出青春朝气。

对马尔克斯来说，采访已成为一种讨厌的方式，他已成了向他过分热情提问的受害者，他向记者发起猛攻。

“我认为，一次好的采访，不应该提出3个以上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采访者以为，错过向面前的被采访者提出所有可提的问题，那将是一种浪费。于是，他们就问些蠢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说。

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是：希望达到越短越有实质的采访，记者就必须对面前的人物做好准备。

采访记者总是不时地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又写了什么书，其中哪本书是最重要的。

但另一个极端是，聪明的记者，对每个问题都加评述的记者，不给被采访者留有余地，那就只好极其简单地回答他。

把问题和答案事先想好的采访，是种少费事的捷径，也是懒人的武器。

有时，在一连串不停地提问后面隐藏着圈套。当一个记者往往正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论新闻实习学校时，下一个问题就怀着企图让他发表关于国家公共秩序的看法，又佯装着仍在谈论同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时会反击他。

当问题出格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会真的对他们说，这与他们正在谈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于是，立即中断谈话。

记者的这种手法是孩子气的，任何聪明的被采访者，不管他如何心不在焉，也不会上当。

还有种被一致认为是可恶的手法：当被采访者不注意时，他录音，采用某篇文章中有关的评论，看未经允许的纸片，偷走文件。

道德观已成为令人担心的大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解决问题只有一个途径：立即根除这种不良现象，将道德观变成工作的强制因素。

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但也不能屏弃作为新闻体裁的采访，而是重新估价它，使它更具有生气，以便恢复它的真正实质，使它在烘托气氛和描写人物方面再呈现出一次高潮。

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照片和标题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他确信形象有作为消息和消息要素自身的价值。记者经过深思熟虑，拍摄的人物、会议和事件是为了配合文章，不是用作见证物，或自身的故事因素。

“必须在报纸的版面上放进较大的照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众人说。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记者没有一种拓宽消息的视觉观，不用形象思考自己的工作。只有少数记者明白，他们希望借助照片支持什么，达到配合故事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要求摄影记者得到真正的消息。

标题也是一样，没有一个好的标题，就没有完整的消息。应该寻找有创造性的精当的标题，但是，若找不到这样的标题，最好选择意思明显的标题。

从40年前到今天，从今天再回到40年前，新闻犹如一条无形的绸带，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脑海里盘旋。

1955年，波哥大《旁观者报》委任他为欧洲常驻记者，他定居于罗马。曾先后到过法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并在伦敦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195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挚友门多萨的帮助下，得以随哥伦比亚民乐团访问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后来他将访问时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为《缺幕后的九十天》。

1959年，当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帝、反独裁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聘为古巴新政府的拉美社驻波哥大记者。1961

年，他作为古巴拉美社的记者去纽约工作，担任拉美社纽约分社副社长兼常驻联合国记者。当时由于古巴革命刚胜利不久，敌视古巴革命的古巴流亡者，常在纽约威胁加西亚·马尔克斯，使他尝够了烂柿子和臭鸡蛋味道；为了自身安全，他工作的时候总是备有一根随手可用的铁棍。但是，当他正为拉美社孜孜不倦工作时，拉美社社长何塞·里卡多·玛塞蒂被撤职了，他因此愤然辞职。这一年的6月，他带着妻儿取道美国南方，到了墨西哥。当时他全身带的款项仅有一百美元，只好在墨西哥住了下来。漫长的记者生涯告一段落。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1年至1967年居住在墨西哥期间，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他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文学创作成了他的首要任务，新闻退居了二线。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愧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有成就的记者。他曾为《宇宙报》、《先驱报》和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大报之一《旁观者报》采写新闻，报道国内外的消息；他为古巴国家通讯社拉美社忠心耿耿，忘我工作。他赞扬新闻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而这本巨著的最重要最光辉的一页就是他从事多年的念念不忘的新闻。因为他这位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是由新闻起家，是由记者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辉煌壮丽的文学殿堂的。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站在如今这座高高的文学殿堂朝下张望，他望见自己的文学足迹是从新闻开始的，具体来说，他最初的创作欲望是由《旁观者报》的一条广告引发的。一天，正在波哥大国立大学阅览室里翻阅报纸的时候，他无意中读到一条广告消息：《旁观者报》准备为青年作者开辟文学创作之页，欢迎投稿。

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完这条消息，喜不自禁。从小就受到文学修养颇高的外祖母的影响，由小学到中学和大学酷爱诗歌和小说的他，早就试着写诗作文，创作小说，正愁没有发表的阵地。如今有了施展文学才华的园地，何不投它几篇。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试着写了一篇题目是《第三次辞职》的短篇小说，寄投出去。小说很快在《旁观者报》刊登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小说，当时是1947年，他刚满19岁。这激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热情，他一发不可收，一连发表十四个短篇小说。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1954年是决定他人生道路的最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他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经过严肃的思索，决定要从事一项更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于是，他不顾家人的竭力反对，放弃了继续学习法律，成为名律师的初衷，毅然应聘去《旁观者报》担任采访记者。在报社里，他白天忙着为报纸写消息，作文章，夜晚来到自己的小天地，孜孜不倦地敲着打字机，进行自己偏爱的文学创作。他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特别严格，打出的每一行文字都要求精益求精，宁愿少些，但要好些，这是他的创作规范。这种不成文的创作规范，他一直坚持到今天。

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难忘记的是，《旁观者报》文学副刊主编萨拉梅亚·博尔达是哥伦比亚先锋派文学的创始人，正是这位声望颇高的作家引导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从此，他在新闻的夹缝里开始了文学生涯。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愧是个善于深入生活、勤于写作的出色记者。他曾写过许多生动而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上面提到的《一个

遇难者的故事》就是突出的一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的作品写完之后，我再也不去看它，但应该说《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是我本人满意的作品之一，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译成中文，我感到高兴，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喜欢它。”

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2月，15年后的1970年2月，当出版商要求把它印成书籍出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正文的前面写了篇题为《写本故事的故事》的说明，对这部长篇通讯报道的内容、背景和因此招来的祸患作了介绍。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是位20岁的青年海员。当1955年2月哥伦比亚海军卡尔答斯号驱逐舰在加勒比海遇到风暴，他是落水的8位船员之一。他这位遇难者在海上坐在一条木筏上，在大海里随波逐流，10天后在哥伦比亚北部荒凉的海滩上出现时已经奄奄一息。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采访他的任务后，和他进行了详细交谈。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一起呆了20天，每天交谈6小时。在交谈中，我一边作笔记，一边不时提出一些让他上套的问题来捕捉他叙述中的矛盾。终于，我们将他10天海上生活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情节紧凑、内容翔实的故事。……作为作者，我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读者相信这篇报道。为此，我们商定，故事讲述用第一人称，并且署上他的名字。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无可指责。就这样，我的名字第一次和这个故事连在一起了。”

但是，当贝拉斯科谈到军舰上装有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走私货后，触及了当时的独裁当局的神经，他们发表了一项庄严的声明，否认驱逐舰上装的是走私物品。紧接着便采取一系列疯狂的报复手段，包括企图加害加西亚·马尔克斯。《旁观者报》为了保护他，派他任驻欧洲记者。

两个星期过后，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的独裁当局下令查封了《旁观者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时，我开始在巴黎过流亡生活，缕缕乡愁使我觉得自己也像一只在大海上随波漂流的木筏。”

由于揭露哥伦比亚海军卡尔答斯号军舰走私活动而激怒统治当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迫流亡巴黎，在那里整整过了两年乞丐似的生活。

在巴黎流亡中，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种种写作的动机，试图去认识现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现实。于是，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我的流放并不是一个艰苦的煎熬。流放使我理解了其他的国家，而这对我的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得意之作、他写了9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正是他在巴黎过着乞丐似的生活时酝酿、构思、写成的。这部自1961年发表以来，引起拉美文学界关注并译成数种文字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内战时期立过战功的老上校的事。他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总是等待着附有支票的来信，但总是不见音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的处境正与这位退伍上校一样，因为派他驻欧的《旁观者报》被本国独裁政府查封，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他在巴黎收不到报社的汇款，生活无着，处境狼狈不堪。他在写作时再也没有笑的心思，即使偶有笑容，也是像上校那样强装笑颜，以此来抵御饥寒交迫的威胁和应付频频追收

房租的房东。读者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尽管作者在许多场合使用了幽默、诙谐的笔触，但心情是十分忧郁而沉重的。正是上校这种面带笑容迎接死亡的个性，使这部作品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完全是按他的写作计划写的，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后来出版的《百年孤独》，因此他说：“是我最好的小说。”

旅欧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巴黎一家破旧旅馆的满是蜘蛛网的小阁楼里，阅读了许多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宝库，扩大了视野，由拉美走向了世界，又从世界的角度加深了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认识。

这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虽已名震本国文坛，但在世界文坛上仍属无名小辈。经受磨难奋斗不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应古巴拉美社的聘请，担任该社记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新闻是我的生命。”这的确是这位大作家的的心声。他在1967年发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前，一直以新闻为己任，为本国报纸和外国新闻社当记者，写新闻。也许正是多年的记者生活，使他观察问题透彻，能一针见血，抓住问题的本质；也许正是记者更能深入生活，摸到社会的脉搏，诊断下药，使他对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有深刻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也许正是记者的职业需为民请命，打天下不平，他对美国的霸权政治，以强凌弱，看得一清二楚，他才在《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等著作中，将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与拉美国家的反动寡头狼狈为奸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第三章 《百年孤独》 石破天惊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要用世界上的全部成就充实自己，效法前贤。学习写作总归要以前贤为楷模……”

“很难探究我完全接受的是谁的影响……不过毫无疑义，确有一位作家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是弗朗茨·卡夫卡。”

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过程中，曾吸取过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和海明威等欧美现代派文学大师的某些哲理性观点和表现技巧。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西帕西拉中学读书时就发现了卡夫卡，并开始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他的大多数同学专心致志地准备功课时，他便躲在小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博览从各种渠道进来的文学名著。

事隔多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门多萨和他谈创作时，他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长期写作过程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门多萨肯定地说：“首先，应该是我的外祖母。”

“那么是她使你看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吗？”门多萨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不是她，而是卡夫卡，他的德文小说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描写故事情节。当我十七岁第一次读到《变形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里·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时变成了一个偌大的甲虫，于是想到：‘我以前不知道可以这样写。如果能这样写的话，我还是喜欢写作的。’”

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是表现主义在小说创造方面的代表。他的著名小说《变形记》、《诉讼》、《城堡》等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表现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表现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象征性，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这种感染力很强的象征性的艺术表现，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英国的乔伊斯是世界文坛上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出生在爱尔兰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最初使用意识流方式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深刻地反映了这位作家对爱尔兰社会的不满，其中着重宣扬了圣洁的“孤独”。而在写作时，经常采用内心独白、倒叙以及时空颠倒等手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不少小说里，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里，都能看到其鲜明的影响。

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福克纳的世界、福克纳生活的地区和他接触的文化领域有许多与我是息息相通的，至少与我喜欢叙述的天地有联系。有人忘记了福克纳实际上是墨西哥湾的作家，我则是加勒比海的作家。他给予我的是关于美的学问。依我看，这门学问就是研究演唱的声音，他教会了我应该用什么声音来演唱这个世界。在给福克纳授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正是我在解释他的世界以便学会自己来解释我的世界之时。可能会在我的早期作品中看出我是受了他的影响。

评论家认为，福克纳在创作上着重表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人与命运的关系及人性的内在矛盾这类抽象问题。这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喜欢自

我矛盾的个性的发展及对形成关于人的自身矛盾的理性认识都产生了影响。

此外，福克纳在用意识流方法进行创作时，尝试过“多角度描写”以及时序颠倒、象征隐喻等手法。福克纳的小说作品，从形式上看，似乎有点儿杂乱无章，但只要去仔细地研究其整个内容，就会有一种丰富的艺术感受。而这两个方面，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些著作中都是有痕迹的。

甚至在写作时间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在学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上午我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晚上饮几杯酒，并且同亲朋好友聊聊天。我要和外界保持接触，以便了解情况。我所说的和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福克纳说，一个作家写作的最优美的地方是娱乐场所，上午宁静无声，入夜热闹非常。”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在他创作的初期，由于需要而借鉴了福克纳的东西。但是，他的目的决不是仅仅模仿福克纳，而是去避免福克纳那种已经左右了他的影响。这是评论家所认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克纳的“背叛”。因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就不再看他的书了，因为他明白了，福克纳的很多事他已经不感兴趣。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我的作品来源于形象》一文中说：“一个人的写作能力是通过向其他作家学习而得来的。我常讲，一个人是在看书、向书本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写作的。谁也没有专门教一个人写作。而是一些作家教了这个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除福克纳之外就是格雷厄姆·格林。他说，格林教会了他应该用什么声音来歌颂加勒比，尽管格林不是拉丁美洲作家而是外来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格林“来到我们这里，把我们这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并教会我们怎样去解释热带地区，如何认识加勒比。”

美国作家格雷厄姆教给了他不少东西，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谈过这一点。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说：“格林教给我怎样探索热带的奥秘。一个人很难选取最本质的东西对其十分熟悉的环境作出富有诗意的概括，因为他知道的东西是那么多以至无从下手，要说的话是那么多最后不知从何说起。这是我在描写热带风光上存在的问题。……有些人只是罗列现象，而罗列得越多，他们的视野就越显得狭窄。我们知道，有些人在雕琢词句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格雷厄姆非常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文学问题：选用一些互不相干的、然而在客观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用这种方法，热带的奥秘就成了腐烂的番石榴的芳香。”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格雷厄姆·格林不但在文学方面有联系，而且私交上也过从甚密。当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接到的首批贺电之一就是格林的电报。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为格林打抱不平，他问瑞典科学院为什么没授给格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他是世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第134页。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第165页。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第136页。

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们的回答是，他们不认为格林是位严肃的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们说：虽然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地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雷厄姆·格林的书，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当格雷厄姆·格林以 86 岁高龄走完人生的壮丽历程时，他把 21 部小说、7 部故事、5 部剧本、5 部电影脚本、1 部诗歌和 17 部散文留在了人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沉痛的心情回顾了他与格林的交往。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曾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过《一起结束的事件》。这是他的不太知名的小说之一。我曾从这部书中借用过一只船。在这部书中有一种对船的描写，而这只船和马格达莱纳河里的船一模一样。这是大主教的船，我曾把它用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书里。我曾对他说，‘我偷了你一只船’。格林也曾读过这部小说，但他没有发觉。”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从技术观点来看，我的小说《恶时辰》的结构几乎是对格林著作的模仿。格林的书，我比较喜欢的是《权力与光荣》、《一起结束的事件》、《阴谋的背后》……说真的，我喜欢他所有的书，但我最喜欢的是《人的要素》，它是本很接近于完美无缺的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如果有人要我对全部世界文学加以选择，我会选中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我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已经完成的长篇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就阅读所及，我实际上喜欢所有的俄国长篇小说作家。我认为，对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俄罗斯长篇小说作家是优中之优。

在谈到文学巨匠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时，人们绝不会忘记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之为文学大师之一的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在巴黎流亡时远远望见过海明威，却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过：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总是萦绕我的一生。

这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指 1957 年春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当海明威偕同妻子漫步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时，他在街对面一下子认出了他，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钦慕的心情，把两手握成杯形，站在人行道上大声喊道：“艺——术——大——师！”海明威明白是在喊他，便转过身来，举起手，用西班牙语高声叫道：“再见了，朋友！”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见到海明威的惟一时刻，但却读了他发表的每一部作品，而且不是当作一般读物来读，是当作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仔细研读。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这样说：“海明威是一位与他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

像勤劳的孜孜不倦的蜜蜂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里，汲取了无限丰富的养分，以最大的决心与毅力辛苦耕耘，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创作出更新更美的著作。他站在巨人的肩上，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小说世界。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如何酝酿、构思和

创作小说的呢？尤其是他那部宏篇巨制的《百年孤独》，世人不知他费了多少心血。

加西亚·马尔克斯毫不隐讳地说，要效法前贤，以前人的知识来丰富自己。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他从青少年，也许从幼年时，就以博大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古今文学大师学习，取其作品之精华，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典范！

他身体瘦弱，褐色的脸庞，黑黑的卷发，留着一绺小胡子，见人怯生生的，沉默寡言，手里经常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又不时地在上面记着点东西。这个笔记本又名“笔记簿”，是他的一笔颇丰的财富，因此也不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位年轻人就是青年时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这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哥伦比亚海港城市巴兰基利亚一家报社工作。他一边孜孜不倦地为报纸撰稿，一边正在写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家》，他的好友称之为“笔记簿”。它足有一千多页。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的积累、知识的宝库、创作的源泉。所以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它。

别看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却具有非凡的创作能力。当时，他白天忙于采写新闻，编排稿件，努力办报，晚上又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他写呀写，不停地写他的《家》。

他的亲密朋友，当时和他一道在巴兰基利亚办报的赫尔曼，后来这样说：我认为那是《百年孤独》的雏形。在那个时候，他还写不出像《百年孤独》那样的一部巨著。马尔克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这一点。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影响和写作》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十七岁的我曾经想写，但是幸好我很快就发觉，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所讲的东西。”“我还需要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语调。由于这种语调本身的魅力，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会变得逼真，并且不破坏故事的统一。语言也是一个大难题，因为真实的事物并非仅仅由于它是真实事物而像是真实的，还要凭借表现它的形式。”

由此可见，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创作《百年孤独》这部巨著还力不从心，他还要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于是，他暂停下来，改写别的。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获哥伦比亚全国文艺家协会奖。获奖对他这个尚不知名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意外的喜悦，也为他的创作带来更大的动力。

在那夜阑人静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孤灯只影，如饥似渴，伏案疾书，将美国的香蕉公司描绘得如同人类的渣滓。小说名为《枯枝败叶》，描述了主人公上校和他的女儿与外孙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们的无可奈何的冷漠心情。

《枯枝败叶》是《百年孤独》的前奏和习作。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处女作。但是写出来后，却一直搁置了整整5个年头，直到1955年才出版，而且颇费周折。

当时正流亡在欧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把《枯枝败叶》这部中篇小说的原稿，从巴黎寄给国内的朋友赫尔曼。赫尔曼经过一番努力，在乌

拉圭找到一家出版商，但印数很少。此后那家出版商却破产了，他的财产和那本小说一同被没收了。

195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的得意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原稿，从巴黎寄给赫尔曼，他认为那是一本极好的书，但是，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还是个穷记者，没有名气，所以没有人愿意出版这部杰出的中篇小说。后来，赫尔曼把原稿寄给了正在出版一本文化杂志的豪尔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得以在杂志上第一次发表，并在文学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巨大震动。但是，杂志的发行量不大。1961年，赫尔曼终于使《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麦德林出了单行本。

与此同时，秘鲁的一位小说家兼出版商，将《枯枝败叶》收入他编的一本选集里，选集在哥伦比亚发行了25万册，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真正出了名。

196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了两本书，即《恶时辰》和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而《恶时辰》获得全国小说奖，奖金为四万比索，还有一本称马尔克斯为“小说之王”的证书。

短短数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连出版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及《恶时辰》四部著作之后，才在那遍布荆棘的文学园地里踏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他在本国和拉丁美洲有了名气，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和表现方式上悟出了真谛。直到这时，他才敢于写他构思和准备了10多年的《百年孤独》。

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生活了20年、写了4本习作性的书才发现，解决办法还得到问题产生的根子上去找：必须像我外祖母讲故事那样老实地讲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去写，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东西，无论它是没有根据的还是可怕的东西，因为在文学中没有什么比信念本身更具有说服力。”他还说：“有一个人值得我深表谢意，他对我说，《百年孤独》的伟大功劳不在于写了它，而在于敢写它。”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6年至1967年潜心创作《百年孤独》的时候正留居墨西哥。当时穷困潦倒的他生活靠典当、借债和朋友资助，尽管如此，由于创作热情的驱使，他仍一往无前。经过几年的探求，他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一天，“他带着妻子梅塞德斯和两个孩子驱车到墨西哥海滨城市阿加布尔科去旅行。途中忽然灵感骤至：我应该像我外祖母讲故事一样叙述这部历史——抓住和重复一个充满了预兆、民间疗法、迷信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富我们拉丁美洲特色的世界，将这一切极其自然地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动声色、沉着冷静、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仿佛是刚亲眼看到似的……于是，他立即调转车头，并对大惑不解的妻子说：‘我渴望已久的《百年孤独》到出生的时候了，你得给我半年时间……’。”

《百年孤独》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作者构思16年，而写作花了整整540个日日夜夜。在这18个月期间，他含辛茹苦地坐在打字机前不停地

《我承认，我历经沧桑》，第184页。

《世界文学名著诞生记》，156页。

打字，那种艰辛鲜为人知。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略知一二。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篇为阿尔瓦罗·穆蒂斯祝寿的长篇著名演说里说，从他写作《百年孤独》起，就得到了穆蒂斯的支持。在长达18个月期间，穆蒂斯几乎每天晚上都去他家，让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述已成的章节，以便接受他的反应。

当《百年孤独》的第一遍初稿结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把它送到穆蒂斯家里。第二天，穆蒂斯就在电话上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您使我像一条狗一样跟它的朋友在一起。”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自那时起，穆蒂斯便成了《百年孤独》原稿的第一读者，他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阿根廷著名的“南美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了《百年孤独》，但仅印八千册，在半个月之内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像抢热香肠似的”抢购一空；第二版出版社印了一万册，可墨西哥就要订购两万册。出版社竟一时找不到纸张赶紧重印了。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犹如红杏出墙，成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杰出代表，并跨出洲域，从拉美文坛走上了世界文学的广阔天地。

《百年孤独》这部把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布恩迪亚一家的经历和马孔多的变化，反映拉美各国独立后长期的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巨著，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因此引起世界文坛的高度重视，立即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了世界文学最伟大的名著之一。

魔幻现实主义是目前拉丁美洲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个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将欧美现代派作家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及本国先锋派小说的创始人博尔达等人的影响与传统的东方神话及印第安古老传说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手法，才创作出诸如《百年孤独》这样不朽的饮誉世界的著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把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史写得如同一部神话故事一般。这是一种给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的外衣，但又不损害现实本相的表现手法。《百年孤独》中时而死人复活，活人升天，鬼魂与活人对话，时而地毯腾空，天降花雨。这些光怪陆离的构思，使这部作品的情节有如一架万花筒，似真似假，扑朔迷离。

加西亚·马尔克斯奇特的童年，在他纯洁的心田里播下了魔幻的种子。而在他的天赋中又有一突出的性格特点，即非常喜欢自我矛盾。他曾说：“我每分钟都自相矛盾，特别是当我处理文学创作题材时，更是如此。”如果不是自我矛盾，又自我克服，他就不可能产生文学创作的灵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都是现实与梦幻的结合，真实与虚构的融会。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特征。按照这种创作方法产生的文学作品，即把现实主义的场面及情节和完全出于幻想虚构的情境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感觉。

那么，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在拉丁美洲如此枝繁叶茂？因为它适应和植根于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这样说过：“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为此，我总是愿

意举美国探险家 F·W·厄普·德·格拉夫的例子。上世纪初，他在亚马孙河流域作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他见过一条沸水滚滚的河流，鸡蛋放进去 5 分钟就能煮熟；他还经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不能大声说话，不然就会降下一场倾盆大雨。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极风把一个马戏团全部刮上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捞上来许多死狮和长颈鹿。”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人们，在他的作品中所描述的一切都是以拉丁美洲的奇特事实为基础的。

同时，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也是奇特的。早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在欧亚大陆进行，这给拉丁美洲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各国独裁统治者以可乘之机。他们对人民大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残酷地压迫、剥削和野蛮镇压，因此便涌现出一批进步作家，愿为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鸣不平。但是，他们对于独裁者的高压手段采取一种讽刺办法，表现在他们揭露独裁者的作品中，就采用了魔幻主义的写作艺术手法。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这批进步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百年孤独》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现实，具有反帝、反殖、反封的特点和浓郁的民族色彩，起到了文学反映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作用。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和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分不开的。瑞典文学院在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时这样说：“1982 年的文学奖不能不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这位作家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中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那里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也有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它反映了拉美大陆的生活和冲突。”

当代拉美文坛上出类拔萃的作家之一，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时，精辟地指出：“他对西班牙语的贡献超过了塞万提斯，因为他不仅使我们的语言得以复活，也使我们的神话复活了。”

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巨大的创作成就，西方评论界称他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当之无愧。

《百年孤独》于 1967 年出版，1982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使它的作者自此闻名遐迩，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者花去 18 年心血，用现实和神话编织的《百年孤独》，近 30 万字，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曲折。它通过布恩迪亚家族 7 代人的经历，反映了哥伦比亚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书中涉及到移民问题、党阀斗争、军事独裁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等等。可以说，它不仅是哥伦比亚，也是拉美近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创作《百年孤独》的念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同历史专业打了几年的交道后，在一次从墨西哥城到阿加布尔科乘汽车旅行中产生的。这也许可以说，是他那创作灵感的魔力诱发出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的。

《百年孤独》1967 年第一次在阿根廷出版时，立即在拉美引起一次不小的“文学地震”，评论家说“它完全可以和西班牙古典文学名著《堂吉诃德》媲美”。不仅在国内获得多项文学奖，而且使加西亚·马尔

克斯步入优秀作家的行列。

这部巨著写的是马孔多小镇的兴衰。仿佛一个忙乱的蚁穴，人们整日劳劳碌碌，最终还摆脱不了必然毁灭的命运。小说的主人公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从他开始一直写了多达 7 代人的布恩迪亚家族，写出了各代人的共性及各自的特点。最后一代是一个长猪尾巴的婴儿，而且刚生下来就被一群蚂蚁啃得只剩下一张皮；马孔多也被旋风卷走了。

从小说的写作方法来看，是将历史事实置于神话史诗般的气氛之中，以那妙不可言的构思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界限打破，有时候甚至时序颠倒，人鬼不分，通过魔幻境界，把拉美严酷的现实生活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如写阿基拉尔的鬼魂日夜纠缠布恩迪亚一家；描写俏姑娘乘床单飞天；滂沱大雨一连下了 4 年之久，令人难以置信，等等。使人读后，有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感觉。

在 1982 年金秋时节，当人们得知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他在墨西哥城的住宅立刻被很多民众包围了。众人高举鲜花，向他欢呼，因此他不得不躲在墨西哥城的一家旅馆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对新闻媒介说：“我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满意。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就要比过去更有名了；名气往往把一个人的私生活剥夺掉，而私生活却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

这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客居墨西哥，过着流放生活。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政治上的流亡者，只是一个文学上的流亡者。因为自从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把他作为驻外记者派到欧洲去后，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国，说他害怕会受到哥伦比亚政府保安人员骚扰。在哥伦比亚有人威胁要干掉他，所以墨西哥政府决定给予他特别的保护，给他派 6 名保镖，他们不离他的左右。

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便决定于 1983 年回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成了世界文坛上最知名的大作家之一，而且哥伦比亚有了正在改变的新政府，使得他能够回国。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继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之后，第四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拉丁美洲文学家；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自 1901 年颁奖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是年，他仅 46 岁。哥伦比亚政府于 1982 年 12 月为本国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行了纪念邮票。

自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名扬天下，尽管他怕名气剥夺了他的私生活。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旋即被译成几十种异国文字，成为经久不衰的世界畅销书；并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及一批出类拔萃的拉美小说家引进世界文学的光辉殿堂，让世人通过一批优秀的拉美新小说而进一步认识拉丁美洲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及其古老而现代的文化。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自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一个不出名的年轻作家而跻身于世界文学家的行列，并使《百年孤独》等一批优秀拉美小说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世人对拉美文学有了较多的认识和研究，并竞相翻译出版。

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愿意再接受其他文学奖，这并非他自视清高，而是乐于让人，将得奖的机会让给其他作家，尤其是那些年轻新秀。比如，1994 年，当被称为西班牙语系诺贝尔文学

奖的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公开声明，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勾去。结果 1994 年度的塞万提斯文学奖授给了巴尔加斯·略萨。略萨是拉丁美洲结构主义文学的代表，也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之一。由于特殊的原因，目前他具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当时正住在英国的略萨，得知获奖消息后，感到十分欣慰，也对他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钦佩。

当有人问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有何实惠时，他颇为风趣地说，最大的实惠就是不排队。因为人们一看见是他的时候，就主动地把他让到前面去。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知名度很高，总统是他的好朋友，哥伦比亚的重要场所往往会看到他的光临。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传媒的注意。早在 1994 年，哥伦比亚国家电台曾播发一则消息，说在哥伦比亚有 70 多辆公车“失踪”，其中有一辆是配给这位著名作家的。这则消息不能不引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重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立刻作了反映。他说：“我惟一的装甲车是我自己的财产。是我买的，而且是自己花钱在西班牙安装的铁甲。”为了证实上述说法，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部汽车入关的合法证件及纳税等复印文件，一并出示给国家电台，以便证明自己从来没用过国家提供的公车。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认真地回顾说，早在一些年前，他刚从墨西哥回国的時候，安全局负责人米格尔·马尔克斯和总统加维利亚都对他说，政府不大可能顾及到他的安全问题。于是，卡洛斯·阿迪拉就慷慨地把自己的装甲车与私人卫队借给了他，他用了两年。两年后，他从西班牙运回了自己的装甲车，就把阿迪拉先生的装甲车与私人卫队还给了他，并对阿迪拉先生表示感谢。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可能有人两年以来，未经允许一直使用一辆哥伦比亚政府配给他、但他从来没用过的官方装甲车。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国家电台说：“我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来没有用过安全局提供给我的任何车辆。”

种种事实证明，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一身正气，不谋私利的正直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更加严于律己，成了楷模。人们不会忘记，他曾把自己获得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奖金捐赠给委内瑞拉的一个左派组织；他还出资筹办“新闻实习作坊”，为哥伦比亚和拉美培养跨世纪的新闻工作者……

第四章 攀登

20多年前，马孔多曾是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香蕉产区最重要的庄园之一，生产的优质香蕉，经果品联合公司，从这个绿色地区，远销到美国、英国和德国。

“马孔多”名字的来历，据说应该归功于这个地区有大量的树木；由于马格达莱纳的树木如此丰富，致使一些异国人士曾经认为，可用马孔多的木浆为原料，建起一个造纸厂。

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在阿拉卡塔卡和住在这个重要地区之外的那些年，都无数次地听说这个重要庄园的名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这位重要作家用马孔多这个名字给他的小说《百年孤独》里的那个神秘的村镇命名的。

其实，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一次会见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记者时，曾对上述说法作过认可。

但是，不少人竟轻率地把那个庄园视为阿拉卡塔卡，这与这些无足轻重的评论家们对哥伦比亚的地理学和社会学都无知的关系很大，因为他们竟然既不用打字机，也不离开配备精良的图书馆，便可以用书的表象将纸上的起义队伍平息下去。

谁也不怀疑，在阿拉卡塔卡来过吉卜赛人，他们曾在那里搭起帆布篷，据说，他们还与动物杂居一起。男人制作铜锅铜盆，女人用纸牌或硬币给人算命。

据说，阿拉卡塔卡还是当时马格达莱纳省盛产农产品的地方。在希腊人的俱乐部里还可以喝上进口来的威士忌酒，谁也不喝无冰的威士忌酒。

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来说，由于出现一种所谓词首字母省略的文学现象，使词汇失去了某些基本音，所以多年以来，将阿拉卡塔卡叫做“卡塔卡”，而将其相应的形象词叫做“卡塔卡人”。一首民谣可以概括出这种文学现象：

“我去卡塔卡，
我再也不回啦；
卡梅拉的爱情
将把我爱煞。”

阿拉卡塔卡人杰地灵，这是当地人和外来者公认的。正如卡塔赫纳诗人路易斯·洛佩斯所说，阿拉卡塔卡和卡塔卡人令人赏心悦目得像“一个麝香葡萄酒杯一样”。

这位诗人还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阿拉卡塔卡火车站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由于我父亲与那个地方的人做生意，我曾在那里生活了28年，那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部分。

一位杰出的法国科学家，他叫埃利塞奥·雷克鲁斯，他喜欢这个美丽的地方，他愿意永远在阿拉卡塔卡生活下去。

阿拉卡塔卡由于诞生了哥伦比亚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使它成为了一个格外特别的美好地方，但这并没有使它

失却朴素的光辉；它戴上一顶光荣的桂冠，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是按照航海罗盘上的另一个方位来到世界的。

从阿拉卡塔卡到马孔多，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你发生了变化！

“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记起他爹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马孔多是个只有20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用泥土和竹修建的房子都建在河岸上，清澈的河水流过满是光滑洁白、大如史前巨卵石的河床。当时，这片世界还清新得好些东西都没有名字，要列举时得用指头指指点点。每年三月，一些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便来到村边搭上帐篷，他们吹起笛子打着小鼓，当众宣布他们新的发明创造。他们首先带来的是磁铁。”

有一次，吉卜赛人来到马孔多，宣布一项最新发现：一列满载着火与冰的火车。这也许可以给事物重新起名了。比如，火车这个词，在遗忘的黑暗隧道里将不会消失了。

不久前，15名法国记者随法国表演冰车的艺术家们，不远万里来到马孔多，给这个平静小镇带来了欢乐。

法国电视二站的一位记者，曾于1992年在卡塔赫纳采访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现得很激动，因为这位记者乘坐抵达哥伦比亚的那艘轮船，像《百年孤独》的人物，也叫梅尔基亚德斯，有名的吉卜赛人。

法国的另一名记者说：“我对来阿拉卡塔卡（马孔多）特别感兴趣的是，要看看4个世纪过后吉卜赛人重返阿拉卡塔卡的情形，看一下他们的技术成果，以及新一代吉卜赛人给这里的新居民带来的新发明。”

法国“冰车”表演来到阿拉卡塔卡，使这个村镇又想起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来，他曾经有一次想发明记忆机。由于操着异国语言的人和充满魔法的“冰车”表演的到来，下午，人们就排起长长的队伍等着观看魔术。男人和女人都穿上最好的服装，从自己家里来到大街小巷，而活蹦乱跳的孩子们更不愿意失去观看表演的良机。

人们从附近的丰塔松、谢纳加，直至“冰车”表演下一站的博斯科尼亚，都来到阿拉卡塔卡，他们都想看一下传奇式的火车。

对于法国艺术家来说，这是雪人车厢的首次表演，人们都对此寄予极大的期望，尤其是火车的路线是在阿拉卡塔卡范围内，这更具有一种特别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冰车”表演是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受到启发的，因为说的是梅尔基亚德斯和吉卜赛人返回阿拉卡塔卡。

从一大早开始，人们就搭起售饭棚子，或推着冰棍小车，或出售衬衫，还有不少商品叫卖点……火车站远远不够人们纳凉用，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爬上了树梢。

法国民间乐队先开始演奏，接着当地的一些乐团也奏起乐来。在大雪人占据的车厢对面，放着大堆大堆的冰块，而光芒四射的房子及纹身室正接待着很多来访者。这时整个阿拉卡塔卡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当飞龙舞动时，雪人也张开大口，喷射出光彩夺目的光颜！

持着火炬的人从这里跑到那边，在观众惊恐的叫喊声中，罗伯托飞龙又从口中喷出一串串火焰，同时，雪人吐出雪片。在火与冰表演时还

奏着音乐。人们都说，这一天是阿拉卡塔卡从来没有过的最奇妙的一天。

阿拉卡塔卡，这个村镇将不会忘记，多亏了这个机智的车辆，人们才有奔向梦想车票的那一天。

正像《百年孤独》里的那一页一样，吉卜赛人返回的那一天，被欢乐与兴奋陶醉的人们都忘了他们曾为之高兴的公司的失败、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与世长辞。

当村民们摸着大的冰块时，有人曾经惊叫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明！”

如今，吉卜赛人又返回了马孔多，他们将给这个村镇带来更多的发明和欢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百年孤独》中早有预见。今天的马孔多已跟着《百年孤独》走向世界。

《百年孤独》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颇受世人重视；但乍读起来却让人犹如步入一座迷宫，走进去出不来。

《百年孤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于1967年第一次在阿根廷出版。写的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岸边的哥伦比亚村庄，这个坐落在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附近的村子名叫马孔多，被一条流水清澈的小河沐浴着，距离波涛万顷的加勒比海只有短短几小时的路程。

《百年孤独》的故事情节是通过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的历史形成的，所有的人都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向人们陈述了个人的孤独、惊人的发明、自相残杀的战争、婚姻、冒险、倾盆大雨、灾难、冰雹、失眠、干旱和黄蝴蝶，等等。

马孔多创始人何塞·阿卡迪亚·布恩迪亚之妻乌苏拉·伊瓜兰，作为一位明智的母亲和统治者几乎贯穿小说的全过程。她运用最基本最原始的逻辑，解决人世间的所有问题。

这部小说是由不同人物构成的——何塞·阿卡迪亚、丽贝卡、奥雷良诺上校、雷梅苔丝、阿玛兰塔、皮拉·特内拉、赫里内尔多·马尔克斯上校、费尔南多·德尔卡皮奥、圣索菲娅·德拉皮达、奥雷良诺·何塞、美人儿雷梅苔丝、阿玛兰塔·乌苏拉、加斯东及最后一个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等。这些人物中的中心人物是奥雷良诺上校，他是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读者怎么也不会忘记，他面对行刑队时的那段童年回忆：他爹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正如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所说，《百年孤独》与《堂吉珂德》一样，是一部由构成整个世界的各种故事组成的历史。它不向现实让步，不向激烈斗争的良心让步，不向变幻的时代和语言让步。有位评论家说过，这部书拿在手里可以一口气从头读到尾。

《百年孤独》是语言的真正汇聚：马孔多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被无拘无束地自由地讲了出来，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母讲故事那样自然地、在介乎于“真实”或官方现实与虚构现实之间，不停顿地讲了出来。

沉醉在小说里的读者会用与作者同样的逻辑，一步一步地向前，看到内战悲剧或香蕉种植工人遭到大屠杀；看到神父喝了一杯咖啡后会升腾，美人儿雷梅苔丝乘坐白色床单躯体和灵魂升天……

布恩迪亚家族经过了历代繁衍，故事一次比一次更奇异。小说的中轴线被魔法师梅尔基亚德斯牵引着，他的羊皮纸手稿历述了马孔多由开始到被一阵飓风一扫而光的最后结局。羊皮手稿由最后一个阿雷亚诺破

译。本来他一直看不懂这篇羊皮手稿，那是因为还不到时候，等他与其姨妈阿玛兰塔·乌苏拉乱伦，生下一个带猪尾巴的孩子后，这个家庭气数已尽，他便轻易地破译了手稿中的最后密码：“家庭中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在被蚂蚁吃掉。”

到此为止，这部充满神话传说与隐喻、运用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有节奏的语言讲述的令人着迷的故事结束了。

然而，现代文学的内行们不难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这里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偏爱的作家——博尔赫斯、鲁尔福作品的成段的故意模仿；还有阿莱霍·卡彭铁尔、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笔下人物的影子。

有人说，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是一部高于学说或“主义”的小说；还有人说，这部书融合了西班牙与拉美文学从骑士小说到“真奇”小说之精华。这些说法都是颇有根据的。

第五章 文缘

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她像一位俊美出奇的少女，首都圣菲波哥大有“南美雅典”之称。她出产的绿宝石居世界首位，她有60年的选美历史……当然影响她的形象的是贩毒，尽管臭名昭著的大毒梟埃斯科瓦尔已被击毙。

每年定期在四大城市举办国际诗歌节，让世界各国的诗人在此沐浴诗风诗雨；哥伦比亚有世界最著名的雕塑家博特罗，他的人物塑像屹立在巴黎、纽约、巴塞罗纳的街头；她更有世界级文学大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的骄傲，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百年孤独》于1967年出版，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从此，他世界闻名。

即使在普通人中间，一提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必先谈到他的《百年孤独》。这和中国一样，中国的许多读者也把《百年孤独》与作者等同起来。

据悉，中国有两三家较重要的出版社，已决定买断加西亚·马尔克斯全部著作的版权，准备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的选集，而《百年孤独》理所当然是这套选集的开卷本。

中国读者都很清楚，在中国灿烂的文化历史上，只有古诗、古文和古典小说才一版再版，屡出不厌；而舶来的光辉篇章，或诗或文，久盛不衰的文学名著，在我国再版的也有。但是像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竞相翻译，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迄今还不多见。那么，为何惟有《百年孤独》如此被人青睐？

首先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极其鲜明，那就是反帝、反殖、反封。作者从他最喜爱的着墨最多的英雄人物奥雷良诺上校口中说出了代表人民大众的话：“我要把我的孩子们武装起来，消灭这帮臭狗屎美国佬！”

其次作者用的是魔幻手法，同时又不失其艺术形象，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使他们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比如美人儿雷梅苔丝升天就很神奇：只见她抓住床单的一头，饱含怜悯地微微一笑。一阵风把床单卷动，在空中飘展开来……美人儿雷梅苔丝向人们挥手告别。床单光闪闪地摆动着，载着姑娘升腾……连飞得最高的鸟儿也追不上她。

雷梅苔丝是个美得出奇又头脑最清醒的人，她单纯得用手抓饭，又每天赤条条地在浴室里呆两个小时。究竟怎样使她升天，却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大伤脑筋。有一天正苦苦思索的他看见一个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往绳子上晾床单，因为风大，却怎么也晾不成，最后床单竟被风刮跑了。这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启发，回到打字机边，就让美人儿雷梅苔丝乘着白色床单升天了。

《百年孤独》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书中着力展现了拉美现实的“神奇”。他不仅大胆运用奇特想像、极度夸张等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且径直把魔幻作为内容，大量化用印第安传统、东方神话、希伯来神话和《圣经》典故等古代艺术材料，将马孔多神奇的自然和马孔多人神奇的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大雨可以连下4年11个月零2天；婴孩在母腹中就会啼哭，呱呱坠地就睁着眼

睛；小孩的摇篮不胫而走；神父喝了一杯咖啡立即离地 12 厘米；死者不堪忍受冥界的寂寞而重返人间……最为神奇的是，这里的居民对于这神奇的一切，都确信无疑，而且真诚地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本来就应该如此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到何塞·阿卡迪奥死时，向他的母亲乌苏拉报信的情形更为奇特。何塞·阿卡迪奥打猎归来，在饭厅跟妻子打了招呼，来到卧室将门一关，只听一声手枪响，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来，流到街上，流过土耳其人大街，向右一弯再向左一转，绕个直角流到他的故居门前，从关着的大门下流进去，贴着墙壁穿过客厅、起居室，在饭厅里转个大弯避开餐桌……最后流到了厨房里。当时，其母乌苏拉发现血后，“哎哟”一声便寻着鲜血流过的地方，一直寻到何塞·阿卡迪奥的卧室里。只见他正趴在地板上，从他右耳流出来的血已经凝固了。

《百年孤独》之所以主题如此鲜明，人物神奇，情节生动感人，语言丰富多彩，是因为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使出了全身解数”，在打字机旁度过整整 540 个日日夜夜。他的辛苦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百年孤独》取得未曾料到的巨大成功。

1958 年，他的得意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杂志上发表，为他后来创作《百年孤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退伍上校盼望有人给他寄来津贴的心情正是作者本人当时处境的写照，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任驻外记者的《旁观者报》被本国独裁政府封闭，他被断绝了生活来源，处境狼狈不堪。那位上校呢，穷得揭不开锅，用小刀把最后几片混有铁锈的咖啡刮下来，自己不舍得喝，把它让给自己患哮喘病的妻子。此时外面细雨蒙蒙，响着出殡的丧钟。他要去送葬，可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

然而，正是这位上校在哥伦比亚内战中，“奋不顾身地拯救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革命上校”。他和贫病交加的妻子对现实不满，称“这个世界被腐蚀了”；他散发秘密传单，宣传国内武装斗争情况。他的儿子因散发传单被警察活活打死。为了生存，上校和他的妻子变卖了屋里仅有的一切，但仍不得一饱，甚至和家中那只斗鸡分享别人送来的几粒玉米。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能够得到退休补助金上，这个期望是他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

作者认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完全是按他的写作计划写的，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百年孤独》，因此他说“是我最好的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奋笔疾书，写出一系列短、中、长篇小说。1972 年发表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这是一部分量比较重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叙述一个残酷的祖母为了金钱，竟然把仅仅 14 岁的孙儿埃伦蒂拉逼为娼妓，加以摧残。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至上的严酷现实进行了揭露和鞭挞。

1971 年，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曾被评为讲西班牙语国家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荣获西班牙语三大文学奖之一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

《家长的没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70 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部写于 1975 年的巨著，描述了一个共和国总统。他为非作歹，镇压反对者，清除政敌，手段极其险恶，统治也十分残酷；在生活方面，这位总统极端腐化堕落，情妇无数，生子五千；然而最后终于激起人民的反抗，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这部小说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到了 80 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结束了因抗议智利政变而自 1975 年举行的“文学罢工”，于 1981 年 4 月出版了一部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小说的故事讲的是：出身名门的巴亚多·罗曼，为了寻找一个心爱的姑娘为妻，他来到一个小镇上，爱上一名叫安赫拉·维卡略的姑娘，并且不惜重金置办婚事。但结婚的当天夜里，他发现姑娘不是处女，就立即送回娘家，其母把她痛打一顿，她的孪生哥哥逼问她是谁破坏了她的贞节。姑娘就归罪于圣地亚哥·纳赛尔。于是，这两个孪生弟兄操起杀猪刀去找纳赛尔，他们声称要杀他。警察向镇长报告他们杀人的企图后，镇长不以为然；又有 3 个人把此消息告诉镇长，他以为孪生兄弟只是拿大话吓唬人，就把他的屠刀没收了，以为他们再没有东西杀人了。可是他们又找来两把屠刀，找到纳赛尔就砍，有 7 处致命伤；纳赛尔不仅死了，而且又被解剖一番，真是碎尸万段。

然而，关于安赫拉·维卡略失去贞操，小说是这样写的：“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被逼无奈，所以说出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

这部纪实小说揭露了陈规陋习对人的毒害之深（仅根据无端的猜测就杀死一个无辜）。这就小说在西班牙语国家引起轰动，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出版。

1982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后来，由于哥伦比亚发生地震，他回到祖国。1985 年，他发表了长篇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描写了男女主人公长达 60 年的爱情故事。

这部小说是通过 3 个主要人物的爱情纠葛贯穿起来的。青年弗洛伦蒂诺对弗尔明娜一见钟情，弗尔明娜也爱他。但是当她的感情成熟后又回绝了他。后来她嫁给了出身望族的乌尔比医生，并同他生活了 50 年。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完美的一对，但实际上并无爱情可言，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不融洽。乌尔比医生从来也不爱她，和她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家庭的稳固。她追求的爱情成了泡影。当乌尔比猝死后，曾苦苦追求而未达目的的弗洛伦蒂诺来向她表明：他始终不渝地爱着她，然而她再次拒绝了。因为弗洛伦蒂诺已经变了，不再是年轻时的他了。当年求爱失败后，他曾一反常态，寻花问柳，勾引女人。弗尔明娜在寡居的几年之中，对他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新的感情后，才投入他的怀抱。当时霍乱流行，他们坐船航行在河上，相爱如初，让载着恋人的船只继续自己的航程。

作者本人说，这部书和目前世界上流行的爱情小说非常不同。他把他的《百年孤独》比作哥伦比亚北部海岸的乐曲“巴列纳托曲”，而把《霍乱时期的爱情》比作“波利乐舞曲”。这部小说不是一部以自杀、

悲伤或不顺心的爱情而告终的可怕悲剧，而是一部以幸福而结束的喜剧。

加西亚·马尔克斯 80 年代最后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是《迷宫中的将军》。1989 年在哥伦比亚出版的这部小说，写的是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主要内容是这位伟人在临死前 30 天，沿着马格达莱纳河回忆他那壮丽的一生，同时也思考他最后失败的原因。玻利瓦尔原以为他会被议会选为总统，但事与愿违，由于内部不团结，结果他落选了。这时，有不少人鼓励他东山再起，可是他被病魔缠身，常常发烧，力不从心，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哥伦比亚著名评论家安东尼奥·卡瓦耶鲁认为，《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完美的爱情专著。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认为，他尤其热衷于爱情：“它是我的书的原动力，我的惟一题材，我的惟一意识……我回想起来，当我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辛格说，在我的作品里缺少爱情，这是使我最不安的批评性评论之一。他辞世了，我未能请求他给予解释。但我相信，爱情是我所有书里值得思考的惟一问题。”

看来，辛格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的这一评论对他起到了鞭策作用。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仅仅 3 年后，他就创作了一部被称为爱情专著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第一版就出书 120 万册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拉美文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加上连篇的评论，足以说明这部小说是好书。

1985 年发表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描绘的是一幅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加勒比地区上层阶级生活与习惯的风俗画。从这幅画上可以看出“恋人的秘密”，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战争、霍乱流行和对大自然的肆意破坏等社会现象。

小说以 3 个人物构成的恋爱关系为线索铺展开来。故事发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小镇上。这里住着这样的一家人：父亲洛伦索·达萨是个西班牙移民，膝下有位性格倔强又特别漂亮的女儿费尔米纳·达萨。但是这位小姐在很小的时候慈母就离开了人间，她是在姑姑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抚养下长大的。在这家人的平静幸福的生活中闯进一个报务员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发狂般地爱上了这位美丽的正在求学的姑娘，给她一连写了几十封情书，而且每天都在福音公园的树下窥视小姐的一举一动。

当姑娘读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给她的温情脉脉、海誓山盟的情书后，被一种纯情所打动，也对阿里萨产生了感情。但是，她的这一举动被其严父知道后，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加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出身卑贱，且是个私生子，就断然拒绝他们来往。姑娘对父亲的武断十分不满，大闹了一场。

为了缓和父女之间的矛盾，也使女儿忘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洛伦索·达萨让女儿备好行装，与他一同远离家乡，去她的舅舅家里长住。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与此同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给姑娘的书信也到了，因为作为报务员的他利用职业的方便，可以

随时了解费尔米纳·达萨的动向。

费尔米纳·达萨在舅舅家里一住就是3年。她出落得越发美丽动人了，被当地人评为“花冠仙后”。当她以18岁的芳龄返回自己的故乡时，她的思想和感情都稍稍成熟了些。当对她朝思暮想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向她提起恋情时，她就一口回绝了他，因为她认为他们之间的一切仅是一种梦想而已。

费尔米纳·达萨回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就嫁给了出身名门的胡韦纳尔·乌尔维诺医生。他在加勒比地区曾想方设法为阻止霍乱的蔓延而尽过力，是当地的名医。他和费尔米纳·达萨生儿育女，共同生活了50个春秋，可是他给她的并不是爱情。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中意的就只是她的丽质和性格，他要她维持他的形象；而她也只是个尽妻子义务的女人。虽然他们在人们心中仿佛是完美的一对，但思想感情没有真正融洽过。年轻时没有炽热的爱情与幸福，年老时只是相依为命，尽管在临死时，乌尔维诺对妻子费尔米纳·达萨说：“上帝知道我多么爱你！”

胡韦纳尔·乌尔维诺医生由于登梯上树抓鹦鹉，梯歪猝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迫不及待地向费尔米纳·达萨表明心迹，又一次遭到拒绝，他悲痛欲绝。他，年轻的时候，对费尔米纳·达萨的爱情是纯真的，遭到她的拒绝，受到了打击后仍对她思念着；当他在旅行中被人强暴地夺去童贞后，尽管心里仍然爱着费尔米纳·达萨，但是他出身贫寒，生活困苦，心理受到扭曲，便开始寻花问柳，甚至与寡妇同居，妄图以其他女人代替费尔米纳·达萨。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未娶。在费尔米纳·达萨寡居后，他多方帮助她，终于打动了她的心。他再次向她求婚时，虽然她的女儿反对，他人不理解，但她最后还是投入了他的怀抱。这对老恋人在玛格达莱达河上的轮船里成了秦晋之好。他们坐在航行于波涛起伏的江流的轮船上品味他们的新生。爱情战胜了年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受阻爱情之花终于开放了。

这部小说使用明快清晰的语言，写出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爱情故事，并突破了以悲剧或不顺心的爱情告终的老一套写法，写成了一部圆满结局的喜剧。使人读后耳目一新，回味无穷。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在书中，他颇为怀念地叙述了他父亲向他母亲求爱的经过和他自己的水上旅行，因为他从12岁起，就常乘船去上学。这些都成了他写作的重要素材。这本书本来可以写得更长些，但受到篇幅限制；关于两个人的相爱生活，可写的实在太多了，真是其乐无穷。他甚至这样说：“我希望我的一生都能像写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在1994年接受经常采访当代大作家的墨西哥记者西尔韦亚·莱穆斯的采访时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费尔米纳·达萨的家就位于卡塔赫纳洛斯·埃文赫里奥斯广场，现名费尔南多·马德里广场。这是费尔米纳·达萨生活的真实的家。他曾想把这座房屋买下来，但是不可能，因为费尔米纳·达萨居住过，所以变得很昂贵，主要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抬高了它的身价。这正与墨西哥城的洛马街19号那座房子一样，由于《百年孤独》是在那里写出来的，所以当加西亚·马尔克

斯回头想把它买下来时，它变得特别贵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西尔韦亚·莱穆斯说，费尔米纳·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胡韦纳尔·乌尔维诺这 3 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及其行动中的很多方面都是来自于真人真事。比如，费尔米纳·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间的爱情，及头些年达萨那不幸的爱情都是“我父母爱情的一分钟一分钟的逐字逐句的抄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这句话作了这番解释，他说他在卡塔赫纳写这部小说时，上午在家里写，下午出去找他小说情节设置的地方。他陪同父母外出找这些地方时，让他们分别给他讲他们的爱情故事，因为每人都有自己回忆过去的方式，若在一块回忆就会出现矛盾。于是，他听爸爸讲后，再听妈妈讲，最后写出整个故事来。

作者的爸爸是镇上的报务员，妈妈当时是镇上漂亮的姑娘。他的外祖父母都不是富人，但是殷实之家。他妈妈为姑娘时是外祖父母的掌上明珠，是他们的独生女儿。而表兄带费尔米纳·达萨外出旅行，她通过电报员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联系，也是很确切的，这个地方和书上写的完全符合。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不管怎么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之中有很多他父母的影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当过报务员，会拉小提琴，还写或多或少的秘密情诗并发疯般恋爱着——和他爸爸相似；费尔米纳·达萨身上具有一种坚强的个性，尤其是具有那种几乎无意识的权力——有他母亲的影子。

在谈到如何想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书名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他的书里，书名总是最后才出来。他说，海明威说过，他为一部书甚至可以找出 80 个可能的书名，而最后选择一个最合适的。选择书名就像选择人物一样，一本书的主要人物就是这本书的本身。如果你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书名，那这部书对你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如果你开始寻找到 80 个书名，其中可能有两个使你觉得同样喜爱的，你将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百年孤独》一直写到倒数第二行还没有书名，这一行这样说：“……因为注定要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机会在大地上重新出现了。”于是他一跳，指着“百年孤独”几个字，说：“这就是书名。”

《霍乱时期的爱情》快结尾时还没有书名，这时很需要有个书名。而书写到这时，霍乱的症状与爱情的状况是相同的。作者想到这里时，正在修面，“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个书名向他走来了。他把它写下来，并跑去对他的妻子梅塞德斯说：“我有了书名。”这个书名看来不是作者杜撰的，而是作者发现了它。一旦有了书名，这部书便大功告成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爱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他感到吃惊的是，人们老是将爱情与年龄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爱情应属于各种年龄的人，在一个镇上的老人当中，热情奔放者可能很多。老年人的爱情受阻是个社会问题，又完全是个文化问题，因为人们认为在某种年龄段时还产生爱情是耻辱的。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当他发表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后，他收到了多少迟到的老年情侣写来的信。他将这些来信收集了起来，他说：“这是我的生活的故事。”

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是玛格达莱纳河上的轮船。这些船只曾像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一样兴旺发达。这些船曾经从

巴兰基利亚港口一直航行到哥伦比亚内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内地寄宿中学上学时，均是乘船来去。他从12岁至20岁这一期间，每年至少4次乘船。这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一种很美好的记忆，然而由于人为地大肆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使水土流失，河流淤塞和污染，现在这些船只已经不复存在，仅仅留在了记忆里。

第六章 反响

据哥伦比亚《旁观者报》和《时代报》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图书博览会上介绍了他的《爱情与魔鬼》。

《旁观者报》1993年11月30日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瓜达拉哈拉国际图书博览会朗读了他的未出版的小说中的40页，这40页就是他的小说《爱情与魔鬼》的第三章。

卡博在一个拥有15000听众的大厅里朗读时解释说，《爱情与魔鬼》共分五章，第一章大约50页，书中描述了一个加勒比城市17世纪与18世纪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经他提炼的事实，就像真的一样。

《时代报》以《爱情，卡博的魔鬼之一》的标题报道说，在这次博览会上，卡博一页又一页地朗读他的最新小说《爱情与魔鬼》的第三章，据卡博说，他将不出版这部小说，除非在哥伦比亚解决盗版问题。

卡博对众人说，他已经朗读过三次了，上一次是在上周。因此，他将朗读的还可能是暂时的一章，因为他不断地修改润色。

卡博说：“《爱情与魔鬼》我一共修改过11遍，其中在原稿上改过8遍，在清样上改了3遍。”

经过多次修改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1994年的元月份，将《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抄件寄给他的文学著作代理人、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卡门·巴尔塞斯女士。

但是，从来也没有一部书像这本小说令加西亚·马尔克斯担惊受怕的。这是因为这部书和他所写的书完全不相同，尽管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确信，他会成功的。

在《爱情与魔鬼》由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出版家正式出版之前，哥伦比亚《旁观者报》先行发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朗读过的这部小说的第三章。笔者曾在哥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大将这一章试译了出来，这里不妨抄录如下。

第二天，卡耶塔诺·德劳拉来到圣克拉拉修道院。虽然天气炎热，但他仍然身穿粗毛料袍，手里提着圣水桶，还拿着一盒赦罪圣油，这些都是他用来打魔鬼仗的第一套武器。女修道院院长至今还没有见过他，可是，关于他的才华的传闻早已打破了修道院的宁静。清晨6点钟，当院长在会见修女的房间里接见德劳拉时，他那年轻人的风度，殉道者的苍白，金属嗓子，还有他那缕白发，顿时引起院长的兴趣来。然而，他的任何美德都不足以使这位女院长忘记，他是主教的作战人士。但是对德劳拉来说，惟一引起他注意的是那群公鸡的吵闹声。

“它们只不过才六只，可叫起来就像一百只，”女修道院院长说，“另外，还有一头猪会说话，一只母羊一胎下了三只小羊羔。”她还热情地补充说：“自从您的主教赐给我们这有毒的礼物以后，一切便是这样。”

使德劳拉感到惊奇的是，那个花园里的花儿仿佛在违背自然规律而开放。当他穿越花园时，他便意识到，那些花朵的大小和颜色都显得不真实，某种花香让人窒息。可是，对于这位女修道院院长来说，这些日常现象仅仅使她觉得有点儿超越自然而已。但她的每句话都使德劳拉觉得，她要比自己利害得多。于是，他就急忙磨快自己的武器。

“我们并没有说，那女孩已经被俘获，”他说，“这样设想的话，要有缘由。”

“我们看到的是，她自言自语。”女修道院院长说。

“请您注意，”德劳拉说，“我们往往把不理解的东西归咎于魔鬼，并没有想到这些可能是我们对上帝尚不理解的东西。”

“圣托马斯说过，我们遵循他的教导。”女修道院院长说，“对于魔鬼们不一定要相信，尽管他们有时也讲真话。”

二层上开始安静下来。这一层，一边是整天用挂锁紧锁的空着的单人牢房，另一边是一排面对着波光粼粼的海洋敞开的窗户。那些见习修女们并不像玩忽职守，她们实际上都专注着正向牢房走廊走去的女修道院院长和她的来访者。

谢尔瓦·玛丽亚的单人牢房在走廊的尽头处，当院长和德劳拉到那儿之前，他们要从马蒂纳·拉沃尔德的单人牢房前经过。这个老修女，因用肢解刀杀死了她的两个同伴，所以被判终身监禁。可是她从来没交待过犯罪的原因。她在那个小小牢房里已经蹲了11年，人们对她那些失败的遁词比对她的罪行更熟悉。她从来不同意活着被监禁与过着幽居生活的修女一个样。她常常自告奋勇，在埋葬活人的修道院里，继续执行对于佣人的刑罚。她怀着一种像对自己的信仰一样的献身的欲望，这种不可遏止的欲望就是成为自由人，虽然她还可能再去杀人。

德劳拉没能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便很幼稚地把头从小窗口的铁栅栏中伸进牢房，正仰卧着的马蒂纳觉察出有人看她，就把眼睛转向门口。德劳拉立即觉得他的咒语权受到了侵犯。镇静的女修道院院长却避开了窗口。

“请您小心点，”女修道院院长对德劳拉说，“这个小怪物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这么厉害吗？”德劳拉问道。

“是这么厉害。”女修道院院长回答，“要是她依我的话，她早就自由了。她是引起修道院如此混乱的原因所在。”

当女看守打开牢门时，从谢尔瓦·玛丽亚的单人牢房里散发出一股腐烂气味。她正朝天平躺在没有床垫的石头床上，手和脚全用皮带绑着，仿佛死人一般。但是，她的眼里还放射着大海般的光芒。德劳拉一看见她就觉得她极像他梦见的那个女孩。于是，一种恐惧感袭来，使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闭起两眼，用希望的全部负荷祈祷起来。祈祷完毕，便想起了魔鬼。

“虽然她没被任何魔鬼所俘获，”他说，“但是，这个可怜的幼女却处在一种最慈悲的生活环境里。”

女修道院院长反驳道：“我们不配这种荣誉。”为了使单人牢房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但是谢尔瓦·玛丽亚自己弄脏了牢房。

“我们的战斗不是对付她，而是对付使她居住在这儿的魔鬼。”德劳拉说。

为了避开地板上的脏物，德劳拉踮着脚尖走进来，他还用圣水喷洒器给房间里喷洒了圣水。女修道院院长生怕圣水会留在墙上，造成污渍。

“血！”他叫喊道。

德劳拉较理智地指责了女修道院院长。并非因为水是红的，就一定血，要是血的话，并非总是魔鬼的东西。“比较合理的是想一想，它是一种奇迹，而这种奇迹的权力仅属于上帝。”德劳拉说。晒干以后，它凝固的污垢不是红色而是深绿色。女修道院院长听后脸红了。不仅修女们，她那个时代的所有女人，不管接受何类学院式的教育，这都是禁区。但是，这位女修道院院长，从很年轻时起，就在自己那个有杰出神学家与大异教徒的家庭里，学会了一套经院剑术。

“至少，”她反驳道，“我们不否认魔鬼们有改变血的颜色简单能力。”

“怀疑时代是再无用不过了。”德劳拉动气地反驳道，并正视着女修道院院长

说：“请您去读读圣奥古斯丁。”

“我有这部书，并已熟读过它。”女修道院院长说。

“那就再读一遍。”德劳拉说。

在接近谢尔瓦·玛丽亚之前，德劳拉用十分柔和的语气要求女看守离开牢房，接着，他并非以同样的柔声对女修道院院长说：“请您也出去。”

“服从您。”女修道院院长说。

“主教是最高领导人。”他说。

“您没必要提醒我这个，”女修道院院长以平静的嘲讽口吻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们都是上帝的主人。”

德劳拉享受着女修道院院长最后这句话的快慰，坐在床边上，拿出医生的严肃劲头给女孩检查。女孩继续发抖。

当德劳拉就近给她检查时，发现谢尔瓦·玛丽亚身上有搔伤和瘀痕，被皮带擦伤的肉是活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踝部的那块伤，由于庸医们的草率，伤口已化脓，而且烫人。

德劳拉在给女孩检查时，向她解释说，不是为了折磨她才把她带到那里，而且怀疑有个魔鬼，为盗走她的灵魂，已经钻进她的体内。现在要确定一下这是否是真的，所以需要她的帮助。但是，德劳拉未能知道，女孩是否听到了他的话，是否理解他这是一种内心的哀求。

检查完后，德劳拉让修女给他拿一盒治疗药，但是，他不让药剂修女进去。他把香膏涂在女孩的伤口上，然后又轻轻地吹吹，来减轻活肉的灼痛。他对女孩那种忍受疼痛的倔强劲感到惊讶。女孩谢尔瓦·玛丽亚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对他的说教不感兴趣，也没任何怨言。

这是让德劳拉痛心的开始，这种难受的心情一直伴随着他来到图书馆的滞流处。图书馆是主教之家的最大活动场所。然而，图书馆却没有一扇窗户，墙壁被桃花心木的玻璃橱柜遮挡着，柜里存放很多书，摆得有条不紊。房子中间放着一张柜台。存着操作等高仪的证书，以及有关航海术的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它是连续不断的地图绘制人员，随着世界不断扩大用手工逐渐增补和修改而制成的。房间最深处放着一张粗鄙的工作台，台上放着墨水、小刀、几只用来写字的美洲火鸡羽毛笔、一叠书信，还有一个插着枯萎康乃馨的花瓶。这一切都隐没在昏暗之中，弥漫着沉静的纸张味，给人一种清新静谧的美感。

在沙发尽头仅有的空地上，放着一个用木条门紧闭的书架。根据神圣宗教法院的裁决，这个书架成了禁书的监狱，因为那些书籍涉及的是“亵渎、虚构的材料和伪造的故事”。谁都不得接近，只有卡耶塔诺·德劳拉例外，当他为了探索没落文字的深渊而接近它时，也须经大主教特许。

德劳拉自认识谢尔瓦·玛丽亚以后，他的那个多年的滞流处竟成了他的地狱。他再不和朋友、牧师及非教徒们聚合，组织经院或舞会、文学竞赛和音乐晚会，让他们和他一道分享纯粹理想的快乐。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探索魔鬼的奸诈上，边读书边思考，因此5天5夜没回修道院。星期一，当主教看到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来时，问他感觉如何。

“扎了一双神圣精神的翅膀。”德劳拉回答。

谢尔瓦·玛丽亚穿上平常的教士服后，产生了一股打柴人的勇气，对付沮丧的心也硬了。她需要这些。女看守嘴里嘟哝一下，回答了谢尔瓦·玛丽亚的问好，她皱着眉头接待女看守。地上洒满残渣剩饭，粪便秽物横流，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在靠近圣灯的供桌上，当日的午饭还原封未动。德劳拉端起菜饭，给女孩喂一勺带着

凝固奶油的黑菜豆，女孩回避了他的勺子。他连喂几次，女孩的反应都是一个样。于是，德劳拉便自吃一勺菜豆，品尝一下味道，可他没有咀嚼就以反胃的真实怪态咽了下去。

“你有道理。”他对女孩说，“是难吃极了。”

可是，女孩一点也没注意德劳拉。当德劳拉给她治疗发炎的踝部时，她的皮肤痉挛，两眼湿润。德劳拉认为她被战胜了。他用优秀牧师的窃窃私语给她缓解疼痛，最后便敢于给她解开皮带，让她那受伤的身体放松一下。女孩弯曲几下手指头，觉得那些指头还是她的，又伸伸被皮带捆绑麻木的脚。于是，第一次看看德劳拉，打量他一番之后，就用一种捕捉动物似的准确一跳扑到他的身上。女看守帮助治服了她，又用皮带把她捆绑起来。在离开之前，德劳拉从兜里取出一串檀香木念珠，挂在谢尔瓦·玛丽亚那串项链的上面。

当看到德劳拉带着那种让人一看就同情的被抓伤的脸和被咬伤的手回来时，主教感到十分吃惊，而德劳拉的反应更使他吃惊，因为德劳拉将他的伤势当作他作战的胜利品拿来显示，还嘲笑狂犬病的危险。尽管如此，主教的医生还是给他作了严肃的治疗，因为害怕下周一的日食消息会成为严重的灾难的预兆。

相反，杀过人的修女马蒂娜·拉沃尔德在谢尔瓦·玛丽亚身上没有发现最低限度的反抗迹象。她偶然从小窗口向单人牢房探一下头，发现谢尔瓦的脚和手都被绑在床上。这时谢尔瓦警惕起来，两眼一直盯视和戒备到马蒂娜对她微笑。于是，她也微笑一下，并无条件投降了。仿佛是多明加·德阿德文托的灵魂充满了整个小牢房。

马蒂娜告诉谢尔瓦她是谁，为什么要在那里度过余生。当她问谢尔瓦·玛丽亚被关的原因时，谢尔瓦只能告诉她，她所知道的是为她驱邪。她说：“我身上有一个魔鬼。”

马蒂娜让谢尔瓦平静下来，心里想，她是在撒谎，或者别人对她撒谎。马蒂娜为谢尔瓦表演了刺绣艺术。谢尔瓦要求马蒂娜将她松开，好像她一样来刺绣。马蒂娜就把那把跟其他缝纫工具放在一个衣兜的剪刀取出来让谢尔瓦看了一下，并说：

“你想让我把你放开？”马蒂娜对谢尔瓦说，“可我得警告你，要是你企图对我使坏，看我怎样杀了你。”

谢尔瓦·玛丽亚不怀疑她的决定。她给谢尔瓦松了绑，这便于她重温功课，重弹她学过的古琵琶。那声音很悦耳。离开之前，马蒂娜保证实现诺言，她们下周一一块去看日食。

星期五天亮时，燕子离开窝儿在天空里自由飞翔，然后，又像一层令人恶心的天蓝色雪花落在街上的房顶。谢尔瓦从来没见过燕子在劲飞中拉屎，也不知道它们的粪便臭气妨碍人生活。

在修道院里，当然谁都不怀疑，谢尔瓦·玛丽亚享有改变移居法的充分权利。星期天做完弥撒后，德劳拉提着一小篮甜食穿过花园，他看到与众远离的谢尔瓦·玛丽亚还带着挂在脖子上的那串念珠，但是，仍没回答德劳拉的问好，甚至不屑一顾。德劳拉坐在她的身边，从篮子里取出一块奶酪愉快地咀嚼起来，并满口奶酪地说：“味道儿很好。”

他把另一半奶酪递到谢尔瓦·玛丽亚的嘴边。谢尔瓦并没有回避，也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将脸转向墙去，而是示意德劳拉，女看守在窥视着他们。德劳拉对门做了个有力的手势。

“您离开那里！”他命令道。

女看守走后，谢尔瓦·玛丽亚拿起那半块奶酪，赶走了她的饥饿，但她吐了

一口，说：“燕子粪便味。”然而，她的脾气变了。当她发现德劳拉的手用绷带包扎着时，才头一次注意到他。她用一种难以伪装的天真问他的手怎么啦。

“一条带着一米多长尾巴的小疯母狗咬了我一下。”德劳拉说。

谢尔瓦·玛丽亚想看看他的伤口，德劳拉便解开了绷带。她小心翼翼地用食指触一下那肿块紫红色的晕处，红肿块仿佛一个火炭，她第一次笑了。

“我比瘟疫还坏。”她说。

德劳拉回答她时，没用耶稣的教义，而用了加西拉索的诗句：

“你满可以对能忍者这般作。”

德劳拉不知怎么开始萌生出一股很强的情欲。女看守离开时曾从女修道院院长那方面想起来，已经禁止从街上带食物进来，因为这样做会有给犯人弄来带毒食物的危险。这类事曾在被围困期间发生过。德劳拉还骗女看守，他说他经过主教批准，带来了饭篮子。他还正式提出抗议，抗议在一个以烹调技术出名的修道院曾给犯人劣质食物吃。

晚饭时，德劳拉精神抖擞地为主教朗诵；晚祷时，他像往常一样陪伴着主教；祈祷时，他闭起两眼，是为了更好地思念谢尔瓦·玛丽亚。他比通常更早地回到图书馆。他想念她，越想念，那种欲望就越往上涌。于是，他大声地重复朗诵起加西拉索的十四行爱情诗来，他感到害怕：怀疑在每首诗里都含有一

种他所寄托的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与他的生活有关。

难于入睡的他，黎明时分，趴在写字台上，将脸靠在一本没有读的书上。他在梦中听到附近神殿里传出三首早祷的夜曲。“愿上帝搭救你，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他在睡梦中说。他自己的声音将他惊醒，看见谢尔瓦·玛丽亚穿着囚服，着火的头发披在肩头，从柜台上的花盆里拔出那枝枯萎的康乃馨，插上一枝鲜艳的栀子花。德劳拉用热情的声音援引加西拉索的诗句，对她说：“我为您生，我为您才有生命；我要为您死，我死是为了您。”谢尔瓦·玛丽亚仅微微一笑，并没看他。他闭上双目，以便确认这不是幻觉的欺骗。当他睁开眼时，谢尔瓦消失了。然而，图书馆里却充满了栀子花的香气。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爱情与魔鬼》，写的是一个单纯、美丽、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自1994年4月出版以后，成了经久不衰的世界性畅销小说之一。

这部用简明的故事，诗一般的语言写就的小说，以一条疯狗咬伤3个黑奴和一位贵族小姐为开头，由一个预兆的梦做结尾。全书共计198页，一气呵成，妙趣横生。

小说的主人公是仅仅12岁的贵族小姐谢尔瓦·玛丽亚，她是侯爵的独生女儿。当这位小姐与3个黑奴走进市场的入口处时，被一条疯狗咬伤了她的踝部。近4个月过去了。她仍没有任何发疯的征兆，这就使卡塔赫纳主教得出一个严酷的结论：谢尔瓦·玛丽亚被魔鬼俘获了。自此引出一系列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除谢尔瓦·玛丽亚外，还有为她驱魔的牧师卡耶塔诺·德劳拉。在驱邪的日日夜夜，德劳拉竟然爱上了这位比他年龄小24岁的贵族小姐。由于德劳拉胆怯无能，及人们的愚昧无知，致使谢尔瓦·玛丽亚惨死。

小说中的第一个魔鬼——时间。

从故事的开头到最后结束，不多不少正好经过143天。加西亚·马

尔克斯还明确指出具体的日期是自 12 月 7 日到来年的 4 月 29 日。同时，在故事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各月、每日以及宗教节日都留下了它们的轨迹……于是，小说便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每个最耐人寻味的魔鬼而开始了。

在寻找魔鬼之前，有必要谈谈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情节。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是第二次把他的小说故事放在卡塔赫纳，第一次让故事发生在卡塔赫纳的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而在此之前，他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大西洋沿岸，但那只是象征性的地点，比如人们所熟悉的马孔多，那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可以引申为阿拉卡塔卡或拉瓜希拉半岛上的一个村庄。而《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卡塔赫纳，它涉及到一些具体地点，人们可以辨认出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包括它的魔力和主要掌故。而令人奇怪的巧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写的关于爱的小说都发生在卡塔赫纳：难道这是一个抚慰疯狂、不幸与放荡爱情的城市吗？看来至少在过去的时代是这样，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 18 世纪的殖民时代。

小说中的第二个魔鬼——人物。

贵族小姐谢尔瓦·玛丽亚被一条疯狗咬伤后，由于家庭的环境所致，使她成了一位奇怪的小姐。这就引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个魔鬼。

加西亚·马尔克斯喜欢杜撰奇怪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大多数而论，他们是被神化的或在心理上奇特的。他们的表现往往超常，能成为十分出色的人物。他们会在自然界、动物和人的身上制造出令人不可理解的现象，他们自身也会遭殃。

具有上述性格的人物之一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谢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由于她与家中的奴隶接触密切，她懂得多种语言、非洲的魔法、宗教和习惯。为了“保持贞节”，她从来没理过发，因此她蓄着满头金光闪闪的极美的头发，她的头发拖到地上，仿佛婚纱的长摆。她总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出现，所以她的母亲就在她的手腕上系个铃铛，当她走近时好听见她的到来。谢尔瓦·玛丽亚怪诞的言行很多，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谢尔瓦·玛丽亚表现异常，或者说她被恶鬼缠身，最后让信仰占了上风。她被关进了宗教法庭监狱。然而，谢尔瓦·玛丽亚既没有卑躬也没有着魔，享受着她和牧师卡耶塔诺的爱情。靠神圣精神生活的卡耶塔诺爱书籍好读书，他在一个神魂颠倒的夜晚，一口气给谢尔瓦·玛丽亚背诵了 40 首加西拉索的十四行爱情诗。

谢尔瓦和卡耶塔诺这两个人物曾引出几个典型的魔鬼。比如厄运及出现的先兆，由自然法则和可怕的心理应验的事实等。

第三个魔鬼——小纸鸽子。

卡萨杜埃罗侯爵是谢尔瓦·玛丽亚小姐的父亲，他是一个没落贵族的例子。他的故事为这部小说又引出几个魔鬼。

这位侯爵有一个被他爱的白痴情人，名叫杜尔塞·奥利维亚，她可以让小纸鸽子哭泣，仿佛在其他时候黄蝴蝶哭泣一样。最后她变成一个渴望爱情的幽灵，在侯爵的庭堂里跑来跑去。

另一位主要人物是主教托里维奥·德卡塞雷斯——比尔图德斯，他是个 76 岁的老人，负责宣讲新世界的福音，高坐教堂，进行审查和镇压。

还有一个令人相当讨厌的女人：贝纳达·卡夫雷拉，她是侯爵的第二个老婆，谢尔瓦·玛丽亚的妈妈。但此人是个机会主义者、妓女、自私自利的残忍者。最初她只想吃千层饼，后来又沉溺于可可和发酵后的甜蜂蜜。内纳达像其他人物一样，都是些从着魔状态下解脱出来的失魂落魄者，痛苦地忍受着他们的遭遇和生活。

专家认为，《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描写了一种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局限在一种历史的也是具体的框框里。这是殖民地时代没落阶级的一景，这一景由大的政权阶层所代表，组成这个阶层的贵族、教会、知识界和政府都完全没落了。逃脱这种没落的只有下层阶级，即奴隶们。他们正常生活，坚信自己的信仰，相互团结友爱，并拥有不使他们没落的悠久文化。因此在奴隶当中受到教育的谢尔瓦·玛丽亚自己救了自己。在强烈的压抑之下却成了自由人，并能面对暴力采取抵抗的原则。相反，她爱的人卡耶塔诺没有能够自救，也没有得到爱情的恩赐，因为他胆怯，并受到那个世界宗教和文化法律的限制。不仅是卡耶塔诺，而且小说中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消失了，死亡了，变成了幽灵。谢尔瓦·玛丽亚却获得了自由，她虽死犹生。

1994年4月间，哥伦比亚《旁观者报》驻马德里记者罗莎·莫拉女士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赴西班牙，将出席在塞维利亚举行的4月图书博览会后，立即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了电话采访。众所周知，这位哥伦比亚作家不喜欢谈他的小说，也不爱重读他的小说，但是这一次例外，因为是电话上的急促交谈，所以他就只好破一次例。

罗莎·莫拉问：您愿谈谈《爱情与魔鬼》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答：我从来没有谈过我的小说，但是这一部例外。我对我的任何一部书也不像对这部小说感到如此无把握。这有点儿异常，过去一点也不是这样。我甚至知道，一种非法抄本，即和最后版本完全不同的初稿正在流传。一家报纸已发表了摘要，这并不是我的不安所在，最使我感到不快的是这种做法恶劣。

问：您在写这部小说时，感到无把握的原因何在？

答：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出现某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即是在这部小说的许多地方是它驾驭着我，不是我驾驭着它。这就是使我感到最无把握之处。后来我冷静了一下。我可信赖的真正朋友，他们做出很大的牺牲，读完初稿，并对我说了真话，才把我的心绪抚平了。他们说，他们很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写的最好的书之一。有人甚至说，它是比《百年孤独》还好的一部小说，我觉得这是真话。现在我对《爱情与魔鬼》感到满意。

问：写这部小说您花了很大气力吗？

答：我做了11遍各种修改，并对整个校样改了6次。

问：您想像胡安·马尔塞那样将一部小说永远没完的修改吗？

答：由于害怕，我不重读我的书，因为我一开始读，就取出圆珠笔开始修改起来，并且没完没了。我曾给自己制定一个准则，一本书出了第一版之后永远不再修改，所以我在出书前要进行大量的修饰润色。至于《爱情与魔鬼》，由于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卡塔赫纳，所以我不希望它出时代错误，也不愿意它出任何类型的错误。

问：您的记忆力进步啦？

答：不，记忆力停滞了。我在两部书中间写我的回忆录，现在我已经进入另一部书。

问：我们能谈谈这部新的小说吗？

答：它将是一部报告文学。我相当怀念新闻事业！前不久，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发生了面包中毒事件，人们开始病了……我曾想去那里写一篇报告文学，当时我已定了题目《中毒的面包》。但我随即想到，如果我这样做，我不又成了个通讯记者吗？而记者们将可能更关心我怎么写的一篇有关面包的报告文学。于是我就让它跑掉了，但是，现在我确信我将能够做到。

问：如果您如此怀念新闻事业，您为什么不再写一些像发表在《国家报》上的系列文章？

答：为了使胳膊不凉下来，然后接着再写书，最近3年，我在写两部书的中间也写文章。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出版。

问：您从塞维利亚将去巴塞罗那，是去住1天吗？

答：不是1天，而是1个月。您已经知道我在巴塞罗那有家。

问：您的家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在皇家广场吗？

答：不，不在皇家广场。人们对此谈论很多，并到处宣传说，马拉加利市长可能把位于皇家广场的整套房子送给我。但因为正在修复，所以他们从来也没对我说一点具体内容。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爱情与魔鬼》自1994年4月在安第斯集团诸国出版后，在拉丁美洲、美国和欧洲国家引起一场文学轰动，成了长时间的畅销小说。

第一次仅印20万册的《爱情与魔鬼》很快抢购一空。以哥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大为例，1994年4月的第一次印的刚刚上市，就不得不在5月份再次印刷。

在西班牙，据西班牙文学杂志《ABC》每周所作的调查表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小说曾连续35个周位居西班牙全国畅销书的榜首。而当时正在西班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希望西班牙人再用许多周来读这部书。”这家文学杂志还对15位评论家进行调查，其中10人认为《爱情与魔鬼》是1994年质量最高的书。

1995年春天，法国翻译家莫尔旺翻译出版了《爱情与魔鬼》，封面为红底黄字。法国最有影响的《世界报》在其头版上，除发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和小说的简介之外，还登出了这家报纸的撰稿人福热尔走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记。法国人认为，福热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谈话是难得而有价值的。

福热尔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旨在畅述纯洁有缘的爱情，鞭挞无聊的爱情。从这一点来看，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被译成法文的第十三部小说，像其他小说一样，值得给予充分肯定。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小说在法国出版像在整个欧洲一样，立即受到评家的关注。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说，他重视爱情题材，这是他的书的原动力。他说：“爱情是我所有书里值得思考的惟一问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爱情与魔鬼》里为描写爱情下了功夫。最后一章多次写到男女主人公的真挚情感。卡耶塔诺对谢尔瓦·玛丽亚说，

他没有一刻不想念她，甚至连吃饭和喝水时都有她的味道。而谢尔瓦·玛丽亚为了他们的爱情，她宁愿冒死和卡耶塔诺私奔，跑到一个欢迎她的满是奴隶的小村庄。当她的想法被胆小怕事的卡耶塔诺否定后，她就以用火烧掉她住的牢房相威胁。教会当局就用驱邪来折磨她，使她痛苦难忍。最难以忍受的是失去了爱情，她进行绝食斗争，但是他们仍不放过她。当女看守进来准备给她进行第六次驱邪时，发现她为爱情死在床上，两眼光芒四射，皮肤是新长出来的。满把的头发在剃光的头骨上仿佛水泡眼般往外冒。

《爱情与魔鬼》的语言是极丰富极优美的，所以哥伦比亚国家电台台长胡安·侯赛因认为是个语言博览会。他说，他的一位当播音员的同事对他说，这部书可以用来高声朗诵。他又说，这部书仿佛是古典音乐中的春天的音乐，是对语言的一种贡献，是诗化的语言。

侯赛因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扬起风帆，创造自己的语言。”他首先博览语言，然后为它寻找一种讲坛、一种适当的用场、一种充当河滩容纳语言洪流的故事……

总之，《爱情与魔鬼》是一部充满魔幻的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的开场白里这样说：1949年10月20日，他在报社工作的一天晚上，编辑部主任要他去看一下正挖地建造五星级旅馆的情况，他发现挖出一根头发伸出墓穴，越挖这头发就越长，最后挖出一个女孩的头盖骨和一个石碑。碑文上只写着一个没有姓的名字——谢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她的头发被拉在地上，一量正好是22米零11厘米。据挖地的工程师说，人死后的头发每月长1厘米，22米，大约已经是死了200多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说：相反，我并不认为此事仅如此平庸无奇，因为外婆在我童年时曾给我讲过一个12岁小侯爵的传说，新娘的金发仿佛结婚礼服的长摆。她被一条疯狗咬后患狂犬病死了。在加勒比海海域的村子里，由于她的许多奇事，她受人崇拜。这个墓可能是她的，也是我这本书的来源。

评论家说，由于使用最富魅力的语言和魔幻的故事，才写出如此的爱情，爱得言行失检、具有野性而贪婪……所以说，《爱情与魔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理智的书。

第七章 “魔幻”的魅力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好的本世纪拉丁美洲成熟小说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把我们引到一个神奇与真实相汇聚的独特地方。他由记者成为作家，他遍游欧洲、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他潜心研读了欧美文学大师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的经典著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华，于是就将一种广阔的文化与文学知识活泼、新奇地结合在一起，从青年时代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是用美洲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总结几十年来先锋派小说之长，并用神话、寓言和讥讽加以丰富的结晶。今天称之为真正的新奇风格。在想像化的马孔多世界及其历史变化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出一种不仅属于拉丁美洲，而且居于人类自身历史的隐喻。马孔多的地理、人和景物都寓于一种无限的空间和惟一的时间中，使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不仅打破了人鬼的界限，主客观的时序，而且还采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同时将印第安人的传说、神话和信仰与阿拉伯文学及圣经的典故结合在一起，使《百年孤独》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经典。

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于1955年问世以来，孤独、讥讽和对美洲历史及权力的思虑，就经常反映在他的著作里。其中包括《格朗德大妈的葬礼》（1962）、《恶时辰》（1966）、《百年孤独》（1967）、《一个遇难者的故事》（1970）、《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1972）、《蓝色鱼的眼睛》（1974）、《家长的没落》（1975）、《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迷宫中的将军》（1989）和《爱情与魔鬼》（1994）等。这些著作标志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丰富多产的历程；当1982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时，这一创作历程达到了顶峰。

纵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部小说，均以充满魔幻神奇的拉美大陆为背景，创造出当代拉美的“文学爆炸”，表现拉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带着斑斓的美洲色彩，使拉美文学走到了世界文学的最前列，令世界文坛为之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除《百年孤独》外，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较有影响的还有《家长的没落》。作者以抽象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勾勒出独裁寡头尼卡诺的神奇形象：他这个出生在修道院门板上、长着两只畸形脚和一个无花果大的睾丸的私生子，竟然成为一个热带共和国的总统！他对内横施暴政，屠杀无辜，而对一个外国强国却顶礼膜拜，把包括海洋在内的一切都出卖给它。他大肆杀人的结果，引起一场瘟疫，吓得外国占领军慌忙撤走，走时连草原也卷起来带上。最后只剩下一片荒石，这个暴君走投无路，趴在地上死了。但是死后直至尸首腐烂，人们还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因为他曾借替身假死过一次，对为他的死庆幸者大加报复……这些荒唐的事再荒唐不过了，又加上作者运用夸张和寓意的描写，使故事笼罩着浓厚的象征与荒诞的色彩。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等魔幻现实主义巨著来看，其情节离奇，内容怪诞，手法奇异，给人一种真假难辨，虚实难分，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感觉。这种用来表现现实的特殊艺术手法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这一创作手法的形成是拉丁美洲几代有作为的作家辛勤耕耘的结晶。其中有三名魔幻现实主义先驱：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和乌斯拉尔·彼特里。然而魔幻现实主义的中流砥柱乃是墨西哥已故作家胡安·鲁尔福和拉美以至世界最有名气的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在 1925 年发表的关于绘画的专著，即《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

第一个把这个术语引进拉丁美洲的是委内瑞拉著名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他在 1948 年撰写的专著《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中指出：“在故事情节中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神秘的看法……在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之前，姑且可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1946 年，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发表了他富于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代表作《总统先生》；紧接着，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的长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问世。

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于 1955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这部作品结构新颖，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成功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反映了当地印第安和混血居民的传统意识。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石。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从《佩德罗·帕拉莫》这部经典中汲取过营养。他说：“我有一次曾经说过，是阿尔瓦罗把第一册《佩德罗·帕拉莫》带给我的，他并且对我说：‘书里有您可学的东西。……我从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中，不仅学会以别的方式写作，而且学会准备一个不同的故事，以便不重复我正在写的东西。’”

自《佩德罗·帕拉莫》发表后，时光又过了整整 11 年，即 1967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问世，立即引起欧美两大洲的轰动，成为 60 年代欧美各国掀起的“拉丁美洲小说热”中的畅销书。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之作，当时一版再版，竟达到每周再版一次的世界纪录。

引起世界性轰动的《百年孤独》把加西亚·马尔克斯推上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摘下了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瑞典文学学院的拉尔斯·吉连斯顿在《授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一名作家，以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获得了不寻常的成功。这本书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售出了数百万册。它现时仍在被重印，被有增无减的新读者阅读着。”

自《百年孤独》问世迄今整整 30 个年头过去了，但是，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佳作仍吸引着不少读者在研读着它，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两点，一是像拉丁美洲的其他大多数重要作家一样，在政治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站在穷人与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经济剥削；二是在创作艺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围绕虚构的城镇马孔多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把读者引到了这个神奇与真实相汇聚的独特地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完成历史赋予作家的神圣

使命——文学创作。他就是要用自己手中这支笔，以神奇的魔幻艺术手法，把拉丁美洲活生生的现实公诸于世，创作一部部“醒世恒言”般的作品，让世界人民了解拉丁美洲这块既古老又崭新的大陆。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说：我甚至这样认为，正是拉丁美洲这些非同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文学的表现形式，博得了瑞典文学院的重视。

这位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在《再议文学与现实》的一篇文章中也写道：一位在本世纪初跑遍亚马孙河上游的荷兰探险家厄普·德·格拉夫说道，他见过一条沸水河，鸡蛋放进去5分钟就能煮熟。他还路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不能大声说话，不然就会引起一场倾盆大雨。我在哥伦比亚濒临加勒比海的某地，看见一个人朝着一头耳朵上长满蛆虫的母牛念动咒语，只见随着他口中念念有词，咒死的蛆虫纷纷落地……仅墨西哥这一个国家，也许就得写下浩繁的卷帙才能说明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

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是残酷无情的。70年代合法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在陷入火海的总统官邸，孤身和一支军队奋战后死去。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五次战争，十七次政变，无数的黎民百姓不是逃离家园，就是死于战乱。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万分气愤地写道：在拉丁美洲“一夜之间强盗变成了国王，逃犯变成了将军，妓女变成了总督”。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在如此的拉丁美洲现实中，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著作的。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往已久，在欧洲期间就过从甚密。当聂鲁达任智利驻法大使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1971），加西亚·马尔克斯闻讯后，从西班牙巴塞罗那赶到聂鲁达寓所，向他表示祝贺。

马尔克斯是198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巴勃罗·聂鲁达读到他的《百年孤独》时，不禁失声叹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堪称“当代的塞万提斯。”

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我曾历尽沧桑》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他拉美作家有一段赞赏的文字，他说：“近几年来，小说在我们这些国家占据了新的位置。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巴尔加斯·略萨、萨瓦托、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还有智利的多诺索，他们的名字到处都可以听到读到。……

“我几乎认识所有这些人，他们正直大方。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其中一些人必须移居到国外去寻找一个安静的世界，……他们的书是我们美洲现实生活和梦想中最有质量的。”

巴勃罗·聂鲁达在赞赏这些拉丁美洲作家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难怪评论家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带头人，他的影响超越了国界与洲界。

阿根廷最有名望、最受赞赏的短篇小说家、当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拉美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

一。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系统谈话是他去世多年后，由采访他的哥伦比亚记者古斯塔沃·里维罗斯·迪亚斯发表在1993年4月11日的哥伦比亚报《共和国报》上的。

在这篇采访记中，这位阿根廷作家着重跟记者谈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及他的《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

“让我们哥伦比亚人感到吃惊的是，您竟同意这次专访。我们可以说，这次专访像一种复活。”里维罗斯对博尔赫斯说。

“为什么这次专访让你们吃惊？”博尔赫斯问里维罗斯。

“因为您早晚都会知道，我们将向您问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您对他的看法如何？”

“好，至少他的《百年孤独》的头50页是令人难忘的。”

“但是，许多人认为，《百年孤独》是不可逾越的。更有甚者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完了，或者永远不再写作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已进入文学史册。人们认为，您讨厌偶然的東西，并妒嫉在整个小说创作过程中保持着很高的质量。”

“好。问题是这部小说既是现实的又是魔幻的。但是，我爱思索，而这部书的结尾，作为整个家庭业绩的结束，是浩劫、死亡，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别的办法，他是很可怜的。”

“有时我读到，由于是您而不是读者写了一部文稿，您向读者请求原谅。”

“是这样。文学涉及到每个人。如果说一部文稿，我说的是‘真正的’文稿，读者认为他本人可能曾经写过，而又是我写的，所以我作衷心的感谢。”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义向您表示道歉，因为他而不是您写出了《百年孤独》。”

“是公正的不？我接受道歉。”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拉丁美洲人在欧洲所遇到一些事情而写出一些短篇小说。书名为《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您读过吗？”

“我读过前6篇。都是好的小说。是好的。”

“有些人认为，您不可能领会这些小说。您受教于瑞士。从来没有语言障碍。您不具有这种在旧世界使我们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令人愤怒的拉丁美洲主义。牛津、索邦可能是您的家。”

“我不相信莎士比亚轻视莎士比亚，也就是说，他讨厌他自己的某些书。但是对我们来说觉得所有的书都是极美好的。的确，有某些乏味的，但是大声讲它便是一种咒骂。在对待加西亚·马尔克斯上，你们哥伦比亚人也碰到这种情况，他是你们的莎士比亚，而你们所有的作家都害怕像他那样，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耻辱。批评家们在使哥伦比亚大作家的作品声誉扫地上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引起了共鸣。至于《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对我们所有拉美人来说是发生在欧洲的少见的事，而对于所有欧洲人来说是在拉美的少见的事。”……

“博尔赫斯，不谈人啦，请您谈谈虚构。”

“您认为我是真的？您认为翁贝托·埃科是真的？我在很久以前杀了博尔赫斯（请记住，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溜走了），我使翁贝托·埃科、我的最新角色或曰化身（像您认为的那样）出生了。他的诡计是有趣的：

他写了一部为把自己装进去的作品，这像瞎豪尔赫（也是我）、永恒炼丹术修道院院长的刺客一样。这与您的同胞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良诺在实验室里把金鱼无休止地做做毁毁是同样的，像您这样不真实一样，亲爱的记者。”

拉丁美洲结构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百年孤独》在拉丁美洲引起了一场文学震动。评论界及读者一致公认它是一部经典著作。”

巴尔加斯·略萨还对《百年孤独》作了进一步评论，他说：“马孔多的历史浓缩了人类的历史，它所经历的各个时期，大致跟任何一个社会所经历的时期相对应，说得确切一些，就是跟任何一个不发达社会的各个时期相对应，虽然它更适用于拉丁美洲的社会。这个过程（在小说中）现在得到了总结：这百余年的生活再现了所有文明的种种变化（诞生、发展、高潮、衰落、死亡）；更确切地说，则是再现了大部分第三世界、大部分新殖民地国家所经历的（或正在经历的）各个阶段。”他这段话说得颇中肯。

乌拉圭最著名的小说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好友，他颇有兴趣地回顾了他们之间的一则趣闻。有一天，他在巴塞罗那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胡利奥·科塔萨尔写作时不修改。“他作笔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奥内蒂说。“我去对科塔萨尔说……”奥内蒂说。“不必啦！本年底我将去巴黎，我本人亲自对科塔萨尔说。”听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罢，奥内蒂哈哈大笑。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奥内蒂不无自豪地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蒂利亚语的一种光荣。他的诺贝尔奖是所有获奖者中最值得的一个。”

南非小说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内丁·戈迪默女士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称赞他的小说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被誉为文学大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历过一段曲折的文学创作道路。由于他出生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边一个贫穷偏僻的村镇，他由农村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与他们并驾齐驱，这本身就是困难的。他由一名普普通通的地方报社的记者进入作家的队伍，又遇到被人冷眼相看的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权势就是一切的严酷现实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出版比较困难，即便出版，也不会受到社会和读者重视。况且，加西亚·马尔克斯又因派他为驻欧记者的哥伦比亚《旁观者报》被当局查封，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他作为一个文学流亡者，身在异国他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写出的每个字和每句话都是血汗的结晶。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6年7月写过一篇题为《一位作家的不幸》的文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3部小说，即《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一部小说集和许多文章；他已经结婚，和妻子梅塞德斯生下他们的两个儿子；他当时客居墨西哥，经济上十分窘迫。他虽然以新闻为业，但是他知道自己首先是一位作家。他刚完成《百年孤独》这部小说的初稿，也许他没有想像到，一年之后

自己会成为一位“成功的作家”。

正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处在成功的前夕，他才能真正体会到写作的艰辛。作家生活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往往会弄得伤痕累累，精疲力竭，苦不堪言。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在30年前的1966年，即不惑之年将至的时候，惊呼“作家不幸”，是合乎情理的。

让我们读读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会知道他对作家、书商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多么精辟。他说：“写书是一种自杀性的职业。就其直接收益而言，任何职业也不需要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劳动，这么多贡献。我不认为，许多读者读完一本书后会问：这部200页的书花了作家多少小时的艰苦劳动？作者为他的劳动得到多少报酬？作者仅得到购书者付给书店款项的百分之十。如果读者掏20比索买一本书，只有两个比索归作者所有，其余部分先被冒印刷风险的出版商、后被发行者和书商拿走。如果再考虑到优秀作家常常是写得少而抽烟多时，这就更不合理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写一部200页的书，至少需花两年时间，要抽掉两万九千支香烟。这就是说，好好计算一下，仅仅在抽烟上花的钱就超过了一本书的所得。因此，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所有出版商、发行者和书商都是富人，而所有作家都是穷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上述一席话也正是他本人当时实际的写照：他当时尽管已经出版3部中篇小说，而且他写的短篇小说《周末后的一天》在本国获奖；他于196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恶时辰》获埃索奖；同时还发表《伊莎贝尔在马孔多的观雨独白》、《格朗德大妈的葬礼》等短篇小说，并且是哥伦比亚报纸的专栏作家，还从事电影文学创作等。他如此辛勤耕耘，著作颇丰，在国内外已小有名气，那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一贫如洗，过着仿佛贫民一般的客居他乡的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寻找像他这样的作家贫困的根源时，还将不发达国家的作家与发达国家的作家作比较。他说：在书籍交易不激烈的不发达国家，问题也比较尖锐。

加西亚·马尔克斯主张言论自由，作家应有一种宽松的写作环境。他说：“在我看来，我宁愿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写作，这不仅因为我正遭受一种可怕迫害，而且因为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就完全忘记写完以后跟谁达成出版协议。”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许多作家都怀念古代的麦塞纳斯，这位富裕大度的先生坚持让艺术家们随心所欲地工作。尽管麦塞纳斯们以另一种面目存在着，有一些大的金融财团有时为了少支付赋税，有时为了抹掉舆论给他们造成的贪得无厌的形象，使良心得到安慰而拿出数目可观的钱来资助艺术家们的劳动，但这种次数并不多见。作家们，都是乐意做那种愿意做的事的人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在一种尚不充分成熟的制度下，为追求永恒真理而写作这种职业是危险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作家的种种不幸作了认真地阐述与回顾，结论主要是问一问作家们为什么要写作。

对于这个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作家，简单

麦塞纳斯是古罗马奥古斯都大帝的朋友，曾利用这种关系保护过许多文学艺术家。

地说就像自己是犹太人或黑人，成就是鼓舞，读者的恩惠是激励。但是，这些都是额外的收获，因为一位好的作家，尽管他衣衫褴褛，他的书售不出去，但他仍将千方百计地继续写作。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已风靡全球，也许他是两三个最重要西班牙语作家之一，是继塞万提斯之后的文学大师，是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是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位伟大作家是从平凡中过来的。当他刚踏上创作征途时，干完报业的工作后虽然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但他还要写上一些。有时一口气完成一篇短篇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的征途上，永远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奋战的。他说，这正如一个个遇难者在大海上挣扎一样，这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职业。

第八章 心迹

1994年元月，哥伦比亚一家报纸发表了西尔韦亚·莱穆斯采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篇重要采访记。多年以来，会见不同作家与国际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成了西尔韦亚·莱穆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他在加勒比海上的要塞城市卡塔赫纳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部分记要。其中谈到《霍乱时期的爱情》，谈到这位伟大作家的家谱等。下面是这次采访的一个侧面。

莱：你母亲是位女家长？

马：是的，她是一位女家长，并且还继续是，她已经88岁。

莱：她继续对你有种强大影响吗？

马：是的。她创造出一个行星体系：她的12个儿女分布在各处，但是，我们都以某种形式呆在围绕着她转的轨道上。

莱：你以为母亲的形象比父亲更高大？

马：请注意，这些都是分析，在分析中我从来没参与进去。我们小说家以直观写作更甚于心灵，而一种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开始思考风格时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仿佛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种人，变成了一位科学创造者，而不是变成一个作家。我朝着直观对我说的地方走，然后发现读者的分析与我曾设想的没有任何关系时，我觉得很高兴。

莱：在胡韦纳尔和费尔米纳这方面你说过，费尔米纳是控制儿女者。当他们还都是孩子时，胡韦纳尔很少参与他们的生活。你现在忘啦？

马：我没忘。这里有种情况：当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时，我不再想任何别的事，我对它完全入了迷。我只等着下一天到来，以便继续写。这时候，我有另一部向朋友们讲述的小说，因为这帮助我去思考。这不是我正在写的同一部小说。我将内容透露出去，以便看看朋友们怎样反应，并了解这些材料对我有用或者没用。其实，我不透露我正在写的内容。但是，当我认为我已经写完，那一切相反，我要看看他人是怎么看法。我有一批朋友，我把原稿提供给他们。这时候，当他们说“现在请您说出一切您要说的”或者永远沉默时，我仿佛是在受审判。在此阶段因为没有一种确切的评价，就倾听一切，我十分谦恭地听，宽宏大量地听。但是当我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已经汲取了他们给我提出的所有意见时，我就完全不再想有关这部书的任何内容，也不再去回忆它。

莱：它成了个已经走了的孩子。

马：问题是，可能有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我感到不安的东西，所以当我完成一部小说后，我永远不再去读它，因为我有一握自来水笔就要改书的习惯。不应该这样。书成型后，它已经不属于一个人了。

莱：你是碑文式句子的主人。有人读过它认为，这些句子不费你的力气……

马：有批评家说，我的句子是碑文式的……这是因为受过外祖母的巨大影响。当你问我是否母亲有巨大的权威时，我应该说我的情况不是这样，但这是由于一种很特别的原因：外祖父母养育了我。他们让我母亲在一个遥远的村庄几乎是偷偷地结婚；当他们知道我母亲快有儿子时，就派人去找她。他们为自己对她的态度感到后悔，把她接回他的

家里。我出生在他们家里。生下我后，母亲和父亲又走了。我父亲是奥亚查的报务员，我留在外祖父母家中，一直长到 8 岁。对我真正有影响的是外祖母，她会讲出我曾经觉得仿佛古语的碑文式句子。这使我形成一种概念，人应这样讲话，我的人物必定这样讲话。不是我这样讲话，是我作品中的人物。

现在，这些句子并非是我创造的，都是从俗语中演变而来的，是我听到的句子。这些句子是收集来的，有写作中的例子，在写《这个镇子没小偷》的故事中就有个例子。我记得，当时在加拉加斯，我在午休时写作，梅塞德斯正在睡午觉。我写到一个女人的插曲：这个突然醒来但尚处在蒙眬状态的女人，她说了一句与主题一点也不相干的话，而我还没找到这句话；但我突然看见梅塞德斯正在那儿睡觉，我就走到她身边，她突然惊讶地说：“哎！我梦见诺拉正在做奶油洋娃娃。”我完全把这句话抄了下来，这确实正是我需要的句子。

莱：一个极美的句子。

马：那么，这使你看到必然的一点：在我的小说里把现实与虚构分开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其他作家的书，因为一个作家只能谈他自己的书，别人的经验对另一个人总是很神秘的。现实与虚构尽管也是不可以混合的，但不可分。我曾说过这好比水和油一样。你把油放在水里，或将水倒入油里，当你搅拌时，就出现一种新的混合物，一种正在运动的与原状完全不同的物体，但当静下来后，水和油又分开了。对一部小说来说，作家是在搅拌，使其在书的整个生命中都继续运动。

莱：最终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自己活着。

马：这可以想像到。但比一切更重要的是，书中的人物应该活在读者的心目中和记忆里。如果达不到的话，这部书就没有作用。

莱：我曾经跟你说过，当我们读你的书时，你那碑文式的句子使我们感到激动。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你说得那么确实，你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了费尔米纳·达萨 51 年零 9 个月又 5 天。”这是确实的，这在时间上总给人一种确切感。

马：请注意，如果你说过去了 200 头大象，这难于让人相信你。如果你说过去了 232 头大象，人家开始怀疑了。如果你说过去了 232 还外加 7 头大象，并且又是极肯定地说，人家就相信你的数字了。写小说的最大问题是可信性。一个作家拥有一切权利，只要能够使人相信。这的确对作家帮助大。如果我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了 50 年，这像说等 1000 年一样：一种纯近似的数字。如果我说等了 50 年零 8 天又 6 小时，人家就相信了。我为此而说得这样确切，还有语音上的考虑。我决心使一句话或一个章节可以用来听，准备我自己大声朗读。我执意让这些话语在读者当中的回响像在我耳边回响一样。那么，我高声朗读是要知道语音效果是否好。如果我发现数字 50 年零 8 天语音不和谐，我可以将 8 改为 7，将 5 改为 3。

莱：但这倾向于诗歌了。

马：我最初的修养是诗歌。

莱：你可能曾是诗人？

马：我不是诗人。我开始时读过很多诗。我在中学时已经开始读小说。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对文学的惊奇和着迷都始于诗歌，我是一位诗

歌的伟大读者。我认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是从写小说的修辞手段来看是一种对语言的诗化；如若不是，一个作家就不可能关心语言、语言的含义和语言的美。

莱：名望给了你什么？你喜欢出名吗？

马：名望是一种极妙的东西，之所以极妙不仅因为它提供各种满足，即胜利的个人满足，有大量朋友的个人满足，并有使个人出名的很多机会。名望还提供了为国家、为朋友、为其大陆及一切更好服务的可能性，有名望比没名望服务得更好。但是，名望也带来一种无穷的不幸，它使几乎一切其他长处都失去了，因为名望一天 24 小时都持续着。如果名望能有可以按的钮该多好，并可以说：“现在要，现在不要，现在要一点，现在再多一点”，可以像操纵收音机那样，那该多么美妙。但是，由于控制不住的不幸事件发生，一切优势便将残酷地丧失殆尽。

莱：在一定时候，名望代替一切，像幽灵一般出现在你面前。

马：是，它是一种幽灵。朋友们对我说：“这是名望的价格。”而我说：“那我不支付。”

莱：你不曾为得到诺贝尔奖而工作，自发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来，你就应得到它。诺贝尔奖对你意味着什么？

马：诺贝尔奖同一颗稀有的星星一样诞生：实际上已成为诺贝尔的称号，等于玩语言游戏。它可以改变有关者的待遇。政府也变得热情了，把得主置于不同的位置。但是，一旦享受到诺贝尔奖，惟一好处就是不排队。你在任何地方都不用排队，人们会放你过去。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9 点差一刻的时候，哥伦比亚最大的电台之一蜗牛电台的节目播放了胡安·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对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录音。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是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两大记者之一，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密友。这位蜗牛电台的负责人曾因“人物采访节目”办得出色而荣获西班牙颁发的国际新闻奖。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消息已在报端披露，当时笔者得以录了下来；事后笔者专程前往蜗牛电台总部询问，阿里斯门迪的秘书小姐答复，采访录音是否见报，得与阿里斯门迪先生磋商后决定。

这次采访是在文学大师的家庭图书馆里进行的。自墨西哥回国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住在卡塔赫纳。采访是从大师的新作《爱情与魔鬼》这部历史小说谈起来的。

这部小说所写故事发生的时间是 18 世纪，地点在卡塔赫纳。开头说的是，一条疯狗跑进一家商店，咬伤了两个仆人和一位名叫谢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洛斯·安赫莱斯的贵族小姐；这条狗正是当局紧张地追捕的那条疯狗，也正是这条疯狗使长发拖地的 12 岁的谢尔瓦·玛丽亚致死……

采访是在一种亲切的对话中进行的，有时还不断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师，你写历史小说的热情来自何处？”阿里斯门迪问大师。

“热情来自哥伦比亚现实神奇而美好的特点，它驱使我想去研究哥伦比亚的现实。经过研究，发现神奇之处比哥伦比亚的现实还多，因此

我就触及了历史……”

“您所说的历史是实际的，还是虚伪的历史？”“不是虚假的历史，而是一种学术历史，是一种从科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来看的历史。他们所写的这种历史，不是历史像国家那样，而是国家像他们写的历史那样……这个国家很久以前轮廓就不明确。我们生活与工作就是按他们写的历史进行的。如果说他们写的历史是虚假的，那也是合乎逻辑的……”

阿里斯门迪在跟大师谈到《爱情与魔鬼》时，大师说在这部最新小说付印前，他曾经虔诚地给《马德里日报》寄去一篇通讯，说他在小说付印前感到惊恐，甚至比《百年孤独》付印前的惊恐还要大。阿里斯门迪追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因是什么？”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里斯门迪这样说：“对于《百年孤独》我完全有把握，它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它最像我童年时代所具有的诗的概念，然而它又最像未曾见过却是从我的思想里取出来的那样的国家。这正是我所说的惧怕的缘故。这种惧怕不仅存在于印发之前，而且存在于把原稿交给朋友们以及我在宣布定稿之前。我不喜欢惧怕，但奇怪的是我战胜不了它，而朋友们可以战胜它。朋友们决定发表，我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想法不是作家们的想法，作家们只想自己所想，而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提出的批评是在小说发表之前，我说作为批评是有道理的，是适宜的……”

接着，阿里斯门迪询问大师，他的书，他的小说出版后，他是否还详详细细地再阅读过？

作为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坦率地说，他没有全文读过，但他说有一次例外。

他说：我有一次乘火车旅行，从巴塞罗那去日内瓦，路途10多小时，就我一个人。我读完了所有的东西，做完要做的一切事（睡觉、吃饭），还余好几个小时。这时我身边惟一带的是一本《百年孤独》，它是日内瓦的朋友原来送给我的，于是我就开始读了。我读了几段后，就拿出笔来，尽量的改了起来；但是我意识到，一部小说的这种工作是在出版以前做，那时去做想做的一切，有的是机会。还有，如果想修改的话，就在发表之前交给朋友们，请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而发表之后，就不应该再去触动它了。经验告诉我，我企图阅读我的书，而目的不在于改却改了，就改变了这本书，所以不应该再改，是因为这本书不是属于作者而是属于读者了。但是，那一次，当我把《百年孤独》读到四五十页时，就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了……

当谈到这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笑了，阿里斯门迪也笑了，两人都笑得十分开心。笑声刚落，阿里斯门迪又向大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您用什么标准选择您的朋友，把任何人都不能得到的修改您的作品的权力交给他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里斯门迪说：

我是从生活中选择这些朋友的。他们都是我通过实际生活认识的朋友。首先他们有一种好的文学修养；其次他们有很高的标准。但是比一切都重要的是真地、真地、真地向我说出他们想要说的话，哪怕这种话是极令人感到伤心的。我说过，穆蒂斯是我的第一个合作者。他不仅是在原稿上给我提意见，而且还在我写作中帮助我。他去图书馆帮助我查

找资料，我有问题时要问他。当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时，不向别人陈述，这是有益的。但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我就要请教阿尔瓦罗·穆蒂斯，请教其他许多朋友，或去问他们，或去拜访他们，以便纠正我小说中的错误。在这方面，第一个是请教阿尔瓦罗·穆蒂斯。当我写《百年孤独》时，他很热情地把内容告诉很多人，那些人又不断地把意见热情地告诉我，结果就比原来好多了。但是，有一次我碰到合作者阿尔瓦罗·穆蒂斯，他叫住我，并对我说：“您也不感到难为情，我就要死了！……您为什么让我把您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使我受不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他笑得很愉快，因为他遇到了对他很忠心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穆蒂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句话是心里高兴，因为为《百年孤独》到处去征求意见完全出自他的本意，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他去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虚心听取其他朋友提出的忠告，改正某些技术上的错误，或纠正其风格问题；有时还与朋友们共同研究问题，当然该坚持的他也坚持。

“一部小说是怎样诞生的？”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跟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谈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其作品的读者也很想知道他的小说是如何写出来的。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也并非易事，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了不少时间向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来阐明它。为了便于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以《爱情与魔鬼》、《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深入浅出地阐明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此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一部小说如何构思，或者说写这部小说的灵感由何而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个问题对每个作者来说都有每个作者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有从感觉也有从形象引起来的。”

“《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其写作灵感是由形象还是由概念引起的？”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写作《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灵感，是由一个长着长头发的女孩的形象引起的。“一天，我突然想，对于这样一个女孩我能写点什么呢？为什么要写？……当时我还有印象，这是突然冒出来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我的方法是把它放在记忆里，我不作记录，因为如果作记录的话，我就不知道是多么对它感兴趣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说：“我把形象放在脑海里，继续存在下去就是真正对我有用的形象。形象可以使我突然由《霍乱时期的爱情》联想到，那个长着长头发的女孩可能是属于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城市，即卡塔赫纳。当我写南美洲的将军时，在调查时想，玻利瓦尔逝世前去了卡塔赫纳，而卡塔赫纳当时是怎么个样子？我发现在那个时代的卡塔赫纳，狂犬病是非常普遍的。于是，就使我发现了这部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跟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讲的上述一席话，把《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写作灵感说清楚了。那么小说的场景为什么放在一家商场里，长头发女孩为什么会患狂犬病呢？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这样说：

“小说发生在一个商场里，是因为玻利瓦尔逝世后，他的尸首就放

在这家商场里。据说，玻利瓦尔是因患狂犬病而死的，因此使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长发女孩应因狂犬病而死。后来我直接去玻利瓦尔住过的房子，也就是卡萨杜埃罗住的房子。对我来说，这所房子就是我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住过的房子。在我当时住的时候，房子的主人是卡萨杜埃罗。而那个因狂犬病致死的长着长头发的女孩就可能是卡萨杜埃罗侯爵的女儿。”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口气谈了女孩为什么患狂犬病，以及她可能是卡萨杜埃罗侯爵女儿的原因及其他，把《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轮廓勾勒了出来。但是，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动笔写小说。当他写到 150 页时，他从头读一遍后，还不知道向何处发展……

就小说《爱情与魔鬼》写到 150 页不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写小说时，是否完全知道这部小说的发展和结局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可以预见到小说的结局的，尽管在写作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

当谈到《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次要人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说，次要人物的轮廓不像主要人物谢尔瓦·玛丽亚和卡萨杜埃罗侯爵的轮廓那样清晰，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多明加·德阿德文托，一个黑奴。她抚养了谢尔瓦·玛丽亚，她也是奴隶中的中心人物。她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兴趣的是，他觉得她像众多热情的加勒比文学中的黑奴，如出现在《生的权利》中的黑妈妈及其他小说中的黑奴一样。“因此，我使她不胖，也不是热情的，而是苗条和严厉的。”

《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卡耶塔诺·德劳拉和谢尔瓦·玛丽亚。当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德劳拉与这位 12 岁的女孩子的爱情时，阿里斯门迪说，一个 12 岁的小女孩是很妙的，她最后爱上德劳拉。“您碰到过类似的事吗？”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没碰到过类似的事。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的爱情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因为在一部现代小说里，不去谈论爱情，读者也会注意到他们疯狂般地恋爱着，正如他们跟我说的那样。我不想在书中说明，如果在书中说明了，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失败了。但我希望是读者自己发现的，读者自己理解的……直至这部书对真正的爱情会起作用。”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还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德劳拉为什么不愿意与女孩谢尔瓦·玛丽亚做爱，尽管这个女孩很爱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因为德劳拉是个伟大的天主教徒，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个好人，可以想像出他是 18 世纪的主教。“我是以读到的当时的书来塑造德劳拉这个人物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中，他还塑造一些光辉的人物，如阿夫雷努西奥，他是位医生。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情与魔鬼》是一部很严肃的书，“我喜爱它这样大小，我也明白它是我最好的书……这部书完全符合历史”。

在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关于书中的人名是从哪里来的，所有

的人名都是收集来的吗”这个问题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讲：“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读者经常提出的问题。胡安·鲁尔福说，他的人名都是取自公墓。”

“您的人名来自哪里？”阿里斯门迪又问。

“我在家里有整个海岸村庄的所有电话地址，我就是从电话簿上取的人名。但这里有一种细致的工作要做，这些名字必须与时代相符合，我相信这些名字符合于时代。”

在谈到小说《爱情与魔鬼》的语言时，他说，语言的创造要与书的环境相一致；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把读者带到18世纪去，语言必须与18世纪的环境相一致，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与人文情况。当然首先要注意人物的对话，因为在18世纪人说话的频率比现在快……

当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12岁的女孩而不使她更大一点时，他反问阿里斯门迪：“相反，为什么她不更小一点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解释道：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12岁还大了一点儿。于是，他找出了正确的成熟界限——18世纪为12岁。因为在18世纪有一种习惯，孩子们结婚都很早，比现在早得多。现在情况逐渐改变了。所以说在当时12岁已经到了结婚的界限，也是有说服力的。

12岁的谢尔瓦·玛丽亚以给她驱魔的名义被送到修道院里监禁起来，她经过了各种折磨，直到绝食，最后为爱情而死。

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谢尔瓦·玛丽亚在修道院里住了多长时间才死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不知道，他在写作时，并不确切地知道玛丽亚在修道院呆多长时间。但是他说可以阅读资料加以查明。他很小心，他把这个问题放了几个月。“现在我回忆起来，曾有某种类似现象：我了解玻利瓦尔的生活是从档案中得知的，也有一些是从我喜欢的书中知道的。我一贯对玻利瓦尔的个性感兴趣，当我决定写南美的将军时，我知道，如果不进行深入地调查，就不可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对玻利瓦尔的调查是通过他的信件进行的，因为他的信件从某方面来说，比他所有的演说都重要；我通过他的信件研究他的个性。我写那部书时，可以和任何学术单位研究，与任何玻利瓦尔主义者平等地讨论，所以我就写完了书。今天我完全不用记任何资料，我用电脑工作，更方便了，我理解得更好了。我可以从电脑的硬盘里得到所需的材料，因此就解决了写《爱情与魔鬼》时遇到的问题。现在，我想做点其他事，我在写回忆录……”

当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现在想写点什么时，大师向他发表了长篇谈话，主要介绍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的内容，而尤其令人感兴趣的的就是大师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

大师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说：

我正在写的这部回忆录，仿佛《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本很大的书，持续很长时间，费了我很多劲，我写得很慢。我发现，有些时间，没有关键的事可写后，再去写，心就冷了。因此在两本书之间，应该有点东西保持手热。很久以来，我一直这样做，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时就给报纸的专栏写文章，在很多报纸上发

表，我的手是热的。有时候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当《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完后，我的手冷了。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在两本书的中间写回忆录呢？我就开始写，但是，某些时候我发现，我将写下去，直到留下一块白纸，以便让某人写它的整个结尾。但又觉得这是长的，令人乏味的。我记叙一切，我有权叙述荒唐的记忆，比记忆更多的是谈朋友，谈我认识的人士，但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谈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时，达里奥·阿利斯门迪插话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已经做好写回忆录的一切准备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不需要多的研究，没有大的障碍，也没有清规戒律，没有大的惊奇。我对生活已经有相当研究……现在是题目问题，内容当然有童年的一章，主要包括新闻、电影、爱情、朋友、广告，还有其他一些。我的想法是，当我写到大约 350 页时，尽管只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也将发表。我将着重谈新闻，因为新闻是我的生命，回忆的主角是我……”

在谈到他的书的出版情况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无感慨地说，他的书跟政治、国家方面没有大的关系，但同样书也沾满铜臭。“几乎我将会有密码书了，因为在我的书后都跟着一个出版者，他将得到使他有兴趣侦探的东西。此外，在我的书中没有一行不符合真实。”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达里奥·阿利斯门迪提出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即书中的哪些人物更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他幽默地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小部分。但我想，又没有一个像我们真正小说家的人物。我用心来工作，我想，惟一的真正的人类经验要是有的话，基础是用内心来表现形象的，人物就是这样的。”

费尔南多·博特略是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绘画和雕塑大师，他在制作一幅画作之前总是要绘草图的；就此问题，达里奥·阿利斯门迪询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一本书之前是否要作笔记、记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举《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回答达里奥·阿利斯门迪的问题。

他说：“我不作笔记。可我以前曾做笔记，是记在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上，但后来这个笔记本却找不到了。以后我就不再作笔记了，如果有感兴趣的资料就把它记在脑海里。如果作记录，就记录核对的要点。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件轶事，其实是一个章节……我说的是有关胡韦纳尔·乌尔比诺的一个秘密爱情故事，也就是这位医生和黑女人巴尔瓦拉·林切的爱情故事。巴尔瓦拉·林切是一个人物，仿佛《爱情与魔鬼》里的多明加·德阿德文托一样……”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巴尔瓦拉·林切这个人物联想到什么样的人是最美的女人。“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样的美女应该是黑女人，而巴尔瓦拉·林切就是。”他自己作了回答。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当巴尔瓦拉·林切结婚，去了她侄女的庄园，把胡韦纳尔·乌尔比诺留在城里，这位医生就由于爱情没有达到目的而发疯了。这是巴尔瓦拉·林切的爱情故事，本可以作为完整的一章……

现在一切都完了。这部如此复杂包括这么多内容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已出版十多年了，现在最好把这一章忘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他在写《百年孤独》时，就完全凭借记忆，没有资料。写出这部举世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当然花了作者很多心血，可见这位文学大师的记忆力是何等惊人。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作几部重要的小说时都听过哪些音乐，这些音乐对他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作了如下回答，他说：

“我在创作时发现，沿加勒比海的民间音乐是文学的源泉之一。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的第一个民间艺人来自外省。他来到阿拉卡塔卡后，便叙述他那个地区的消息。我记得他坐在地上，把拿的一种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乐器或其他什么东西。我就留在那里等着看看他要干什么。不一会，那个人开始讲一个历史故事。他还说自己怎么能讲，怎么能唱，通过讲与唱怎样知道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家和其他的人们。

“但是，当我写作时，特别是我正在写某一本书时，我只听一种音乐，或者某首乐曲，并非有意识这样做。我所喜欢的是，在这个时候音乐与我正在写的书有关系，这是合乎逻辑的。

“《家长的没落》是我所写的书之中最难写的一本，我每天都写还花了7年时间。当时我听了非常多的音乐。

“当时，我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仍然在听创作《家长的没落》时爱听的音乐。当这部书发表后，来了两位音乐方面的伟大研究者，两位女朋友。我并不认识她们，她们希望跟我谈一谈，我答应了。她们用乐谱证明，《家长的没落》朗读起来就是钢琴第三协奏曲作品本身。而我从来没有掌握钢琴第三协奏曲……然而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之一是，当我写《家长的没落》时，我经常听美妙的钢琴第三协奏曲。这是怎么回事？”

第九章 人师

当记者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个爱好是什么时，他说，除写作之外，第二个爱好就是电影。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旁观者报》派为欧洲常驻记者住在罗马时，除报道和写小说外，还喜欢写电影剧本，并曾想当一名电影导演。1961年，他由美国到墨西哥后，便从事电影编剧和小说创作等项活动。

然而，要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电影的爱好还得从他年轻时谈起。40多年以前，他正在《先驱报》当记者。一天，他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来到编辑部里，把他哄出门外，对他说，希望他陪她去阿拉卡塔卡把祖传的房子卖掉，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出生在那里。

他同意母亲的要求，稍加准备之后，就陪同母亲起程。到达阿拉卡塔卡后，他看到那座古朴的房子，便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见到那里的人立即想起那些同他一起生活的幼年朋友。当时还只是见习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触景生情，很想用笔把它们表现出来。在故乡只住了3天的他便清楚地知道，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只希望自己成个作家。他在故乡的炎热中发现了这一点。要不是路易莎·圣地亚加那天下午去《先驱报》编辑部把她的长子哄出来，在阿拉卡塔卡（即马孔多）住了3天的话就不会有《百年孤独》的出现！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中并非一切都是文学。比如，一天他决定，下午应属于他的朋友们，于是他拿出了他生活中的最好的一部分。在政府机关里，叫这部分为“某些职业”。

而这“某些职业”就是电影，对电影入迷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年轻时候起就喜欢看电影，当时他还是电影评论的新手。为了能够看上电影，他清晨4点钟睡觉，上午11点钟起床，下午两点钟去排队买电影票。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爱看电影，而且热心于电影事业。因此，他对古巴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电影电视学校如此尽力并非偶然。他对电影工作仿佛着魔似的，每年他都要花3周时间去学校讲课。他和拉美年轻的电影编剧、演员和未来的导演，一同研究创作宽银幕历史影片或者电视等，但是，那里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影片的制作，而是资金的筹措。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抽出时间去洽谈资金问题。有一次学员没有录像机，他就跟意大利人士商谈，解决了录像机问题。

古巴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电影电视学校距哈瓦那大约40公里，这所学校由加西亚·马尔克斯领导的新电影基金会资助。他在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给学生上课，每天上6小时课，每次共上10天课。当他去学校后，除教学生“怎样讲故事”，还抓紧时间学习，“直到精疲力竭”。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是1959年1月20日首次访问古巴的。当时我作为加拉加斯一家日报的记者赴古巴探讨‘真理’。古巴人总是处在特别时期，难道他们不记得猪湾事件或10月危机？”

加西亚·马尔克斯致力于电影事业，成绩卓著，受到国际影视界的好评。

1993年5月，由加西亚·马尔克斯领导的古巴第三世界学校的工作

得到第 46 届戛纳电影节的承认，获了奖。

1994 年 12 月 2—11 日 在古巴举办的哈瓦那拉美新电影国际电影节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哈瓦那的经常来访者之一应邀光临。

1994 年在哥伦比亚举办的第 34 届卡塔赫纳电影节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电影界的重要人士出席，并会见了古巴影视界的人士。

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有几部已被搬上银幕。如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曾由哥伦比亚和意大利的导演分别搬上银幕；《百年孤独》由英国罗伊德制片公司搬上银幕，片名是《俏姑娘》。

自 1967 年《百年孤独》这部世界经典名著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坐下来，与拉丁美洲最有名望的六位导演一道合写《困难的爱情》。开始时，他们计划写电视连续剧，但当他们将电视连续剧改编为电影时，不得不像吐口香糖那样将想法放弃。从这次冒险中只救出两部历史影片，但对哥伦比亚人幸运的是，其中之一是利桑德罗·杜克的《罗马奇迹》。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阿拉卡塔卡和塞维利亚为背景，坐下来改写电影剧本《玛丽娅》和《这个镇子没小偷》。在电影剧本方面拉丁美洲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古巴的埃利塞奥·阿尔韦托应邀参加工作。

此外，电影制片人企图掏数百万美元购买《百年孤独》的版权，加西亚·马尔克斯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他说：你们等到我死之后吧，到那时，版权将成为人类的遗产。加西亚·马尔克斯针对一个日本人想把《家长的没落》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时提出他的条件，他说：“我不搀和电影剧本。我要是搀和，我们永远也不同意。”

加西亚·马尔克斯参与编导的一部最新电视连续剧是《悲惨一代的编年史》。这部电视剧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记述了自 1780 到 1810 年一批哥伦比亚的热血青年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的故事。当其首映式于 1993 年 10 月 19 日晚在圣卡洛斯大厦举行时，当时的哥伦比亚在职总统及其政府要员都出席了。这部电视连续剧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这“悲惨的一代”为哥伦比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是位电影爱好者，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爱看电影，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创办电影学院培养拉美电影导演和演员。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电影视为他的爱好是有渊源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1982 年说过：“曾有一段时间我考虑过自己要当电影导演，甚至在我的生活中，学习的惟一专业就是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了电影导演，并学完了全部课程。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电影不仅依赖文学，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器材，可是这些电影器材又不那么依赖于文学。因而我发现，一个人要想单枪匹马地拍摄电影，那真是特别困难和极为复杂的。所以，我留在简便的、孤独的文学之中。”

由此可见，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电影有不解之缘。他把电影看作是

他除文学之外的第二爱好，这种爱好迄今一直保留着。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哥伦比亚年轻电影导演塞尔希奥·卡夫雷拉进行过悉心的辅导，曾经给予他的成名影片《蜗牛的战略》关键性的支持。实际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将《蜗牛的战略》这部著名影片从纸篓里救出来的。

《蜗牛的战略》是一部合唱诗般的影片。是用简单的素材，小歌剧的节奏，描绘出一种城市宏伟的射线图景，一种像社会一样没落的房屋租赁制和像玉米一样多的土著居民。导演塞尔希奥·卡夫雷拉把中国愚公移山的故事寓意于哥伦比亚最严重的暴力时期，并和首都圣菲波哥大的风俗传统糅合在一起，创作出这部各阶层民众都可以接受的影片。

新手塞尔希奥的这部片子起初大家都认为失败了。然而，当对宽银幕极感兴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凭着自己对电影的丰富经验和对年轻导演的爱惜之情，在看过电影脚本，又听了塞尔希奥对内容的详尽介绍之后，不但决定给塞尔希奥最后的推动，而且还要和塞尔希奥一道工作。

自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每天下午5点至7点，总是和塞尔希奥在一起，研究如何改进，怎样增删。终于使《蜗牛的战略》成功了。上演后，不仅创下哥伦比亚国产影片最高的票房纪录，而且还荣获5项国际奖。

1995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让塞尔希奥去卡塔赫纳，和他研究另一部名为《曲折爱情叙事曲》的影片。他们决定，使这部影片边拍边放，边听取意见边改进。

塞尔希奥成功了。当他的《鹰没有捉住苍蝇》这部影片在西班牙韦尔瓦国际电影节上获观众奖时，饮水思源，他没有忘记，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电影界的前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最困难的时刻所给予的悉心辅导。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和年轻导演西罗·杜兰一道研究电影脚本。西罗·杜兰要按照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拍片，但是对杜兰来说，影片故事情节并不是容易导演成功的。原因是，影片涉及到一对老虎和一个杀害母虎之夫的希腊猎人。故事情节复杂，人虎之间矛盾尖锐，很不好处理。当母虎得知自己的“丈夫”残遭毒手，自己成了“寡妇”以后，就怒气冲冲，一直将凶手追到纽约，又寸步不停地追，直到将猎人吞下肚为止。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指导下，西罗·杜兰周密策划，终于将这部片名《赤道雪》的影片导演得有声有色，不失为成功之作。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感到满意。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喜欢电影，而且还爱好戏剧；对电影导演和演员关怀备致，对戏剧演员也非常关心。他对戏剧演员劳拉·加西亚女士的耐心指导就是最好的例子。

1994年3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四届拉丁美洲戏剧节，其间，在麦德林的小剧院上演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戏。

这出戏的戏名为《抨击一个坐着男人的爱情》，表演者是劳拉·加西亚。故事发生在80年代，写的是一对结婚25年的加勒比夫妇之间爱与不爱的过程。但表演方式极其独特，从始至终只有妻子的独白。

这段一对资产阶级夫妇的故事是妻子在他们结婚刚好25年那一天讲

的。她在这一天决定她的生活将完全改变，因为他们夫妇的关系已经结束。这种被认为已经过去的关系包括：爱与不爱、忠诚与不忠诚、财富与幸福、安宁和最后代表幸福陷入深渊的地狱……

演员劳拉·加西亚这样解释：这是一种需要极大的精力和勇气的工作，可以说每天 24 小时都是自己独白。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建议我们上演这部作品时，一切便开始了。这部作品写于 1987 年，后来他进行了修改，1991 年又改动了几处。我们是一句一句地剪辑的。我们也必须熟悉他的其他作品。我们跟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讨论作品，他给我们某些指教，虽然他总是很尊重我们的工作；他给我们提供细节，我们保留我们的风格。

劳拉·加西亚说，剧本的原文有一种戏剧性很强的风格，有时仿佛格言似的，有时又是诗化的语言，它保留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句子结构和无误的风格……

关于剧中的“另一个”人物，即丈夫，却从未出现。他仿佛是围绕着所有独白转的一个幽灵。因此，女演员劳拉·加西亚必须抓住观众，使观众“看到”她企图再创造的形象；她介绍的不仅仅是人物——丈夫，而且还有在她长达 25 年的生活中走过去的所有人，因而人物的“对话”是女演员同观众的对话，而不是对她希望召回的幽灵。

劳拉·加西亚说，过了 25 年以后，女主人才发现幸福的婚姻；稳定的夫妻关系有助于建立一种亲密的至福境界，这种至福境界会给予夫妻荣誉和安全。而且幸福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仅持续一时，因为人们不知道当一切结束时就有幸福。当爱情持续着真理也持续着，因为至死的爱情是好爱情。

整个戏剧作品充满一种微妙的阴森的气氛，而人物被一种鬼火环绕着。

第十章 罢笔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典型的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的伟大作家。

1973年，他为抗议智利军人发动军事政变而举行了著名的“文学罢工”，震惊了文学界，声援了智利反对军人独裁的斗争。

出生在智利瓦尔帕莱索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阿连德，曾任智利社会党领袖，他领导的人民联盟于1970年9月在大选中获胜，他于11月就任总统。任内推行铜矿国有化，没收庄园进行土地改革，执行民族独立政策，使智利发生了颇大变化。

阿连德的行动触犯了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影响了国际垄断寡头的利益，因此以皮诺切特为首的一伙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于1973年9月发动流血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奋起抵抗，不怕牺牲，进行自卫。在军人的强大炮火包围总统府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英勇牺牲，以身殉职。

这起举世震惊的军事政变，不仅打死了总统阿连德，并使他的亲朋好友受到牵连；也使许多无辜者被关押、杀害，不少人流亡国外，痛苦不堪……

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阿连德总统的壮烈牺牲所感动，对皮诺切特的反动政变十分愤恨，发表了义正辞严的“文学罢工”声明，声称只要政变头目皮诺切特不倒台，他就不发表任何文学作品。他决心以此唤醒拉美各国起来与这种不义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尤其要以自己的声誉和影响来唤醒其作品的广大读者跟智利政变当局作斗争，使之孤立起来，最后倒台。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声明，他要从事政治采访，他将写出一部新的短篇小说集，拟在皮诺切特政权完蛋数日之后发表出来。

“文学罢工”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不仅声援了惨遭皮诺切特蹂躏的智利人民，而且使世界很多国家认清了政变军事当局的真面目，同时提高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界和世界人民中的威望。人们不禁想到，一位作家举行如此“文学罢工”，也许在世界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加西亚·马尔克斯196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举世皆知的《百年孤独》，1972年又荣获拉丁美洲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学奖——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后，由于举行“文学罢工”，很长时间没发表作品。

但是，在1981年他突然出版了《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取材新颖、结构严谨的小说的面世，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因为该小说的出版似乎违背了关于“文学罢工”期间皮诺切特不倒他不写小说的初衷，所以当他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美国新闻周刊特派员约瑟夫·哈姆斯对他进行独家采访时便问他：

“大概在6年前您说过，假如智利的军事独裁政府皮诺切特不下台的话，您将停止小说的写作。可是，去年您还是出版了一本新小说（按：指《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为什么您改变了主意？”

“我做这个承诺的时候，我相信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不会维持很久。可是这个独裁政权继续下去了，这使我想到了，我的决定对他有利，

而对我不利。所以，我决定写作。我继续写作，在政治上要比我停止写作更有价值。写作，是政治上我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哈姆斯说。

此外，还有分析家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出版了《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因为自《百年孤独》于1967年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20名候选人之一，1980年甚至还成为最后7名竞选者之一。但是，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文学罢工”，一直没有新作问世，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落选了。这时候认为该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位瑞典文学学院的评委只好在报上发表声明，他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最合适的候选人之一，只等他发表一部新的小说。

果然，《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于1981年出版，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并不意味着是一部趋时之作，而是一部经过30年反复思考，精心构思而写就的。它的影响之大绝不亚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为写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小说究竟花费了多少心血，还是以马尔克斯同他的好友、小说家门多萨的谈话来说明。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门多萨说：“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51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把它作为小说的素材，只是想写篇报道文章。但是，那时候新闻报道在哥伦比亚还是一种不甚发达的文体，而我又是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报纸可能对这类事不感兴趣。数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角度考虑那件事情。但是，一想到妈妈要看到那么多要好的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卷入到她儿子写的一部书里而会很难为情时我便迟疑不决了。不过，说心里话，只是在我考虑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时才对那件事产生了兴趣，动笔之意便油然而生。所谓问题的关键，即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便有人得以出来阻止他们动手，但是事与愿违。就是说，这是此悲剧的真正奇特之处，而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又是司空见惯的。后来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事情又拖了多年。实际上，小说描写的故事过了25年才算了结。当时丈夫带着曾被休弃的妻子回到了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结尾必须有对杀人情节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关键是引进一个人把故事串在一起——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出场了——使他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能自如推前和拉后。30年之后，我才发现许多作家经常忽视的一点，即文学的最佳模式是真实。”

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故事讲的是：名门出身的巴亚多·圣罗曼为了寻觅一位俏姑娘为妻，四处奔走。终于在一个小镇上爱上美丽的安赫拉·维卡略。姑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教女格外严格，从来也不离开她的左右，所以安赫拉·维卡略不仅貌美，而且品德高尚严守贞节。但是她却被新婚的丈夫巴亚多·圣罗曼退回到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147页。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第133页。

关于安赫拉·维卡略失去贞操，小说是这样写的：“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被逼无奈时，说出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的想法是，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对纳赛尔怎么样。

安赫拉的双胞胎哥哥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勃罗·维卡略却杀了无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使安赫拉·维卡略痛不欲生，觉得是她无奈的一句假话害了纳赛尔。而实际上安赫拉的双胞胎哥哥并非真想杀害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希望有人出面劝阻而顺坡下驴。但是当警方向镇长报告他们操起杀猪刀要杀纳赛尔时，镇长不以为然，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凶器；又有人把他们兄弟俩还要杀人的消息告诉镇长，他只以为这孪生兄弟是拿大话吓唬人而已。结果这孪生兄弟不但杀了纳赛尔，而且还把死者解剖一番，碎尸万段。

这部揭露陈规陋习对人毒害之深的纪实性小说，曾在西班牙语国家引起轰动。在哥伦比亚的影响迄今余波未息。

1994年7月，《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人物巴亚多·圣罗曼决定控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他的身份被暴露后，作为承保人，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小说出版10余年以来，不仅打动了许多读者，而且通过哥伦比亚导演豪尔赫·阿利和意大利导演弗朗塞斯科导演的两部影片，已经感动了影迷们。

现在，小说或影片中的人物巴亚多·圣罗曼的原型——米格尔·圣地亚哥·雷耶斯受到舆论的干扰，在巴兰基利亚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控告。这一控告是在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弟弟埃·马尔克斯在一家今天已经消失的杂志上撰文说明米·圣·雷耶斯是巴亚多·圣罗曼原型的12年之后；当时不算问题的问题，今天却提了出来。

小说中的原型米格尔·圣地亚哥·雷耶斯就是说他的妻子不贞将她送回父母家、让其权利受到尊重的巴亚多·圣罗曼。他自1954年以来就住在巴兰基利亚，他通过律师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控告时说，小说损害了他的形象，因为“当我去出售某种保险装置时，所有的人都乱叫我是巴亚多·圣罗曼，人们甚至不叫我的真实姓名，这有害于我的工作”。

早在1951年已经结婚的米格尔·圣地亚哥·雷耶斯说，他的前妻“玛加丽塔·萨莱斯没有再婚”。她就是被他认为不贞而被送回父母家的女人。他还说，记者们也曾不让玛加丽塔安静。但是，“她对我说，她没一点事。现在生活幸福。”

米格尔·圣地亚哥·雷耶斯说，他自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结了婚，有好多儿女。他说，“他共有13个子女，但是其中一个死于他的忠诚，他宁愿死也不出卖自己。”

米格尔·圣地亚哥·雷耶斯正是在子女的支持下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控告的，他说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场容易的战争，因为“我面对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又出现了，尽管这位作者未曾动过一个指头。

上述消息是哥伦比亚《新闻报》1994年12月8日报道的。同日，被指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还见诸报端。看来，这位大作家因《一

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书被指控，的确是真实的。他不愿因为这部书而引起不安的事还是发生了，这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料事如神。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也没想到他会遇上这样一个问题：盗版，却在他的祖国遇上了！

自他 1982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著作竞相出版，顿时洛阳纸贵。有合法出版的，更有非法出版的。自 1992 年 7 月以来，盗版现象愈演愈烈，难以制止。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令人应接不暇，一时成了哥伦比亚的新闻。细细研读，从中发现不少妙趣横生的内容：

哥伦比亚著名的《一周》杂志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的出版者何塞·维森特·卡塔拉因现在变成了一个故事的主角，他这个主角如此奇特，本可以让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出来。因为他已成了一个巨型线团的一头，拉着这个头儿，就可以把这个线团解开。而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被剽窃的过程，就像那个马孔多故事的开头一样。

哥伦比亚最重要的大报《时代报》，画有这样一幅漫画——“百年剽窃”，它的注脚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布斯蒂诺博士。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布斯蒂诺博士说：“他们利用我的诺贝尔文学奖！”博士问他：“现在，谁能保卫你？”博士手里握着一支扣着扳机的手枪，意思是说只有用武力啦。

拉丁美洲的盗版现象的确异常严重。多米尼加共和国名列前茅，哥伦比亚屈居第二，秘鲁第三。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写书是一种自杀的职业。”作者只能得到书的售价的十分之一。写一本 200 页的书，要花两年的时间，要抽 29200 支香烟；更为甚者，作者煞费苦心，拮据千根须的劳动果实，竟被不法出版者不费一枪一刀白白剽窃过去，赚了大钱，怎么不令作者生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被司法部门保护的非法和被追查的合法，已达到魔幻现实主义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断然决定，从哥伦比亚全国图书市场撤走 40 万本著作，引起出版业的颇大震动。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说：“我对自己正在做的一切感到痛心……撤走我的书仅仅为了唤起道义的关注。”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一决定的作出，经历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司法过程。

1992 年 7 月 29 日，黑绵羊出版社的老板何塞·维森特·卡塔拉因和经理卡洛斯·爱德华多·金特罗来到警察司法情报局揭发，他们在图书市场上发现不少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的赝品。如《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鲨鱼的故事》改写的影片，《百年孤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等均有盗版。连尚未投入书市的《20 个绝妙的故事》亦被盗版。据他们揭发，北美图书发行公司的费利克斯·布尔戈斯，正伙同安东尼奥·希拉尔多原封不动地翻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

根据他们的揭发，警察司法情报局便开始调查盗版案。先在波哥大，后去麦德林，调查出来的线索均和布尔戈斯等人有牵连。于是就把他们抓到首都波哥大，关押起来。

布尔戈斯原来是黑绵羊出版社的国际售书方面的负责人，1992 年 4

月，该出版社不再让他负责出售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作家的书，他就离开了黑绵羊出版社。这意味着他和何塞·维森特·卡塔拉因十分疏远了。

警察从布尔戈斯处搜查出 860 箱书，其中 3200 册是原版；在盖着黑绵羊出版社印章的 2820 册书里，有 2700 册是原版，120 册是盗版。后来从首都一家航空公司的仓库里搜查出 6500 册盗版书，其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占 1000 多部。在麦德林发现 2000 箱准备送往国外出售的书里，80 万册盗版书已包装上船。

然而，司法部门却认为，“所有书籍基本上都是原版的”。女法官帕特里西娅·萨拉萨尔作出裁决，把 80 万册书归还原主，释放布尔戈斯和希拉尔多。理由是，警察在波哥大和麦德林搜查盗版书籍时，出现一系列不正常行动，而他们的搜查仅仅得到一个负责恐怖活动的法官同意。不但抓了人，还没收了数百部文学作品和印刷机。

帕特里西娅女法官说，更为严重的是，卡塔拉因陪着警察进行搜查，还吊销了北美图书公司发行人的个人证件，而且警察司法情报局官员由波哥大去麦德林的差旅费还是卡塔拉因支付的。

鉴于上述事实，帕特里西娅指控卡塔拉因违法，留下黑绵羊出版社告发的悬案；同时，检察院决定，将从警察搜查和卡塔拉因违法上入手，调查此案。因此，卡塔拉因便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检察院说，卡塔拉因的问题并非上述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中的很多插图不翼而飞了，而且谁也不知道遗失多少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被剽窃走多少。这里并不排除那些插图是被“好人”从黑绵羊出版社盗走的，因为书库的锁被人破坏了。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及插图究竟是被谁盗走的，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检察院还认为，近年来，黑绵羊出版社遇到了经济困难，14 件信贷物品被查封，和卡门·巴尔塞尔文学社的关系“不好维持”。巴尔塞尔文学社一再抱怨黑绵羊出版社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运往国外出售，尽管订有不得在本土以外出售的合同。还抱怨该出版社拖欠支付 30 多万美元，而且这种拖欠不是以月计算，而是以年计算。

检察院说，黑绵羊出版社的老板卡塔拉因不暴露他与文学社的关系，却提出反盗版的要求，这便拉开了调查所有有关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出版和发行方面问题的司法序幕。

当然，女法官帕特里西娅并没说，费利克斯·布尔戈斯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作的剽窃发行者；也没说，卡塔拉因和爱德华多·金特罗他们是盗版发行者。她所说的是，作为黑绵羊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希望证实所谓赃物的方式是不妥的，是不合乎规定的。

黑绵羊出版社人员曾向检察院提出上诉，他们正等待着最后决定。检察院可能会决定，布尔戈斯及其同伴是剽窃出版者；但是也可能决定，说自己不是的，其他出版家是剽窃出版者。因此，这段盗版历史很长。

迄今为止，惟一清楚的是，这场纠纷的最大受害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不仅黑绵羊出版社欠他数百万比索，而且不少书是剽窃出版社出的。如：已列入学校教科书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每年盗版达 7 万—10 万册，使他的年收入少 3000 万比索。而他的著作被盗版的

达 11 种之多，损失很大。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大多数哥伦比亚作家是靠出售自己的作品维持生活的，盗版者把他们的钱据为己有是不公道的。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调查盗版问题却停止了。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他坚持不在哥伦比亚出版和发行他的著作。

第十一章 敌与友

被称为世界头号大毒梟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曾在哥伦比亚横行一时，不仅贩毒，而且制造爆炸事件，杀害无辜，使哥伦比亚一片恐怖，灾难重重。这一悲惨情景使当时移居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如焚。为了阻止死亡在祖国的蔓延，加西亚·马尔克斯担当起了使在职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当库尔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接近的重任。

光阴荏苒，岁月已逝，然而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著名记者卡斯特罗·卡伊塞多回顾当年跟大毒梟和平谈判的故事时，仿佛是昨天一样。

卡斯特罗·卡伊塞多说：我确信，那是1986年4月的一个黎明，我在接电话前看到，在一个拐角处的电线杆下，雨点儿仿佛那天夜里炸弹在城市的各处爆炸时那么密集。电话铃声又连续响了两下，于是，我拿起听筒，确认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

“今天死了多少人？”他问道。

自从毒贩杀害了贝当库尔总统的司法部长后，由于总统恢复了将哥伦比亚人引渡到美国而引起的这场战事已经24个月了。在这两年期间，不断发生汽车被炸事件，律师、警察、无辜者——孩子或老人——被炸弹炸死或被子弹打死。

这天凌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是个真正男子汉的声音，从声音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十分痛苦，那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他在向卡斯特罗·卡伊塞多寒暄之前就这样喊道：

“必须想方设法使这种恐怖尽快过去！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请你告诉我：你又上白山了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暗示的白山，即指麦德林、可卡因、埃斯科瓦尔。麦德林是世界头号大毒梟埃斯科瓦尔的老巢。

卡伊塞多在电话上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还没去，但我可以再穿上滑雪板，好吧……我试试看。”

“那么，你来墨西哥吧，我需要跟你谈谈。”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同样痛苦的声音对卡伊塞多说。

卡伊塞多终于弄到一张去墨西哥的飞机票。他一点也不怀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和平意图，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见完全一致。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被杀害前，已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贝利萨里奥·贝当库尔曾对我说，在他的领导下，任何哥伦比亚人都不可能引渡到美国去；我曾在一篇专题文章中写下这一点，题为《一项虐待我们的协定》……这是因为，此时，我只向引渡开战，惟此而已。这是个原则问题，哥伦比亚不能把哥伦比亚人送到国外去受审。任何母亲也不把儿子送到邻居家，让人家惩罚他们。我进行这场斗争，因为当时我有一种我不曾透露的支持，并且这些都是贝利萨里奥说过的话。

“但是，请注意，还有更深一层的東西：当我正写将在《旁观者报》上发表的这篇短文时，我跟贝利萨里奥通过话，我对他说：‘总统，我写了一篇短文，我确信，在您的领导下，任何哥伦比亚人都不会被引渡。

我能这样定稿吗？’他回答：‘你可以这样定稿。’文章就这样发表了。”

“当文章在《旁观者报》上发表后，我曾记得，在阿莱杭德罗·奥夫雷贡家里吃午饭时，贝利萨里奥对我说过一件惊人的事：‘我们不仅跟游击队谈和，我们也跟毒贩谈和。他们自己正在提出这项建议。’”

议和的路是曲折的。

1984年4月30日，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中弹身亡。第二天，黑手党恐惧地逃到巴拿马躲藏起来。

5月份，巴拿马举行大选，哥伦比亚前总统罗佩斯·米切尔森应邀率国际代表团抵达巴拿马，他和埃斯科瓦尔及其一伙进行了接触，地点是在米切尔森下榻的旅馆。毒贩方面的参加者，除埃斯科瓦尔外，还有所谓墨西哥人、巴勃罗·科雷亚等。他们告诉米切尔森，他们愿意与政府议和。

接近米切尔森的人士说，他使贝利萨里奥总统知悉，他必须告诉总统一件事，一旦巴拿马大选结束，他就去迈阿密，请贝利萨里奥派一位前部长和他谈判。贝利萨里奥就派了一位前部长去跟他谈。

这位前部长和米切尔森谈后就回国了。他回国不到24小时就找到总检察长海梅·戈麦斯，他既是官员，又是无党派人士，便于和毒贩会谈。

1984年5月29日，总检察长在巴拿马的索洛伊旅馆会见了埃斯科瓦尔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的一天早晨，埃斯科瓦尔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解释：

“我和全体人员到了总检察长的所在地，在向他说明局势之后，我要求他，让贝当库尔总统了解一项和平建议。总检察长说，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此，必须以书面的形式送给总统。于是，我们不是送给总统一封信，而是一份备忘录，这样总统可以不作回答。

“希梅尼斯博士说，如果你们希望和平，你们也应该将备忘录送给美国使馆一份。

“那天晚上，我们又让麦德林的律师来，我们给总统和美国使馆送去了备忘录。”

后来，关于备忘录，美国政府公开说它拒绝毒贩提出的任何建议。

一年过后，贝当库尔总统说了很严肃的最后一句话。

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邀，卡斯特罗·卡伊塞多乘飞机来到墨西哥。在机场耽搁很久才入了关，半夜时分才到了旅馆，第二天上午总算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国家的形势感到痛苦。他先把卡伊塞多带到他的办公室里，那里有几个人正研究马尔克斯的一个电影脚本；然后又把卡伊塞多带到他的家里。他们躲在学习室里经过认真研究，最后一致决定，由卡伊塞多回哥伦比亚和埃斯科瓦尔接触，以便告诉他，在合法的范围内，帮助谋求国家的和平。

几周以后，贝当库尔总统将访问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借此机会跟总统谈谈。但是，他所需要的是，埃斯科瓦尔和他的人必须告诉他，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这些毒贩们想要什么。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墨西哥总统府，他们让我了解到贝当库尔总统的访问日程排得很紧。但是，总统在坦昆有一个自由支配的晚上，

在这个晚上，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我想，在那里我有机会跟他谈谈引渡的问题，于是，私下接触就定了下来，这使人想到事情将进行得顺利。

卡伊塞多在墨西哥会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后就回国了。他同意让他和埃斯科瓦尔接触的建议，准备见埃斯科瓦尔。但是，要见到埃斯科瓦尔并非易事，时间过了一年才找到和埃斯科瓦尔简单会谈的机会。卡伊塞多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法告诉埃斯科瓦尔后，埃斯科瓦尔提出直接接触。

埃斯科瓦尔说：我建议大师来哥伦比亚，因为这里办事更容易些。他要乘什么类型的飞机，他愿在这 20 条飞机跑道哪一条着陆，需要什么安全措施，这一切我们都给他提供。但是，最理想的是在这里跟所有的人来谈。

为了把埃斯科瓦尔的话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卡伊塞多和另一位著名的哥伦比亚记者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共进午餐，商量的此事。卡伊塞多认为，这是件重要的事。达里奥正有事要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天下午，两人便飞抵墨西哥，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埃斯科瓦尔的话带给了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不去白山和他们会谈，你找到他们，让他们说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因此，卡伊塞多又回哥伦比亚，在波哥大更衣后，去麦德林。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 10 点半，会见了埃斯科瓦尔。

那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混血儿”的工作间。由于卡洛斯·埃查瓦里亚（埃斯科瓦尔的别号）晚到，卡伊塞多瞧着一辆辆的汽车来消耗时间。

到了 12 点时，卡伊塞多发现一辆城运小客车过来了，车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两分钟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出现了，他的后边是辆出租汽车，车上坐着两个乘客，司机就是头戴黑色“圣父”帽的埃斯科瓦尔。

他们将卡伊塞多接走，离开麦德林，来到野外的一个房子里。那个带着胡子的“墨西哥人”正在那儿等着，他自称名为“安德烈斯”，由围着埃斯科瓦尔转的所有仆从陪着他。

当埃斯科瓦尔解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建议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墨西哥人”，他说：

“那好吧，为此必须付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少钱？”

这时，埃斯科瓦尔摘掉他的帽子，点一下头，用眼斜视着他，对他有点不客气地说：

“年轻人，安德烈斯，你别说傻话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比你有权，比我以及这个房子里的所有秘密犯罪组织的成员都有权力。”

这时，墨西哥人不服气地反问埃斯科瓦尔：“难道这条子比我还有钱？”

“兄弟，他当然没你有钱。”埃斯科瓦尔说，“但是，这位神，他能招呼俄国的掌权者，或者法国的总统，人家立刻会把电话给他接通。此外，如果他需要，他们就给他派飞机，让他去跟他们会谈。而我们呢，连麦德林市长的电话都不会转给我们。如若不信。你叫一下试试。”

埃斯科瓦尔与安德烈斯交谈了几分钟后，他们问卡伊塞多能否将一封写好的信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卡伊塞多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派他

们的信使送去，并要求他们告诉他，谁将去送这封信，以便让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此事。卡伊塞多然后就告辞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伊塞多说：那天上午，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个家伙要来啦，我便等他。这家伙两天后来到佛洛伦西亚街上的一家新旅馆。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到后通知我说，他准备好了，后来我会见了。他是个很年轻、高个头、金头发、结实又很热情的家伙，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且彬彬有礼。他带个手提箱，把它放在面前，我们就开始谈我所感兴趣的是是什么，怎样更好地来权衡这场如此肮脏的战争的局势……我不知道他的手提箱是开着的还是他把它打开的。但是，谈到半截我意识到是开着的，他开着它以便录我们的谈话，这使我很不安。我虽然不安，可我也不想对他说不要录音，因为我相信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我们谈到很多事，具体是：

埃斯科瓦尔建议如下：他保持巴拿马的所有各个点，但在第一次谈判中放弃引渡问题，以便晚些时候再讨论它。

这是个新的大的并便于接近和平议题的问题。把引渡放到以后是对的，因为它是主导一切的重点。

当听到这一要点时，我对那个家伙说：“这多么好。甭担心贝当库尔总统那天不来，我去跟他谈，然后我把会谈的结果通过赫尔曼告诉你们。但是，这种大屠杀必须结束，因为哥伦比亚正遭受着无缘无故的灾难。”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贝当库尔总统终于来到墨西哥，正如所说的那样，他是为了实现一个相当困难的方案而来。坎昆的会已被取消，因为他决定去危地马拉。这时，我发现，这个晚上，我们不可能安静地会谈，于是，我自言自语说：我现在干什么？我趁这个小小的空隙，在我的家里举行了一个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胡安·鲁尔福、何塞·路易斯·奎瓦斯、路易斯·卡多萨和已故危地马拉大作家阿拉贡。自宴会一开始，我就思考着能与总统谈话的时刻，我等待，我思索，什么也没等来。当我知道，一旦他告辞而去，我将再也看不到他时，我便利用一个停顿之机对他说：“请到这儿来，我给您看件东西。”我把他领到院子另一端的我的书房里，将海明威的《在河另一边的丛林里》一书的校样让他看，上面还有海明威本人亲自用铅笔改动的地方。当贝当库尔把校样拿在手里，沉默不语，有些激动，他说：“多么漂亮！”我对他说，“将它赠给你！”

我们对视一下，我接着又说：

“你把它带走吧，但我首先想给你一个口信。”

“谁的口信？”

“埃斯科瓦尔的口信。”我对他说。他立即回答：“不，不，不……”

他随后向门口走去，我便对他大喊：

“听着，总统：你是共和国的总统，你不能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就拒绝这个口信。因为这是关乎到国家命运的问题。”于是他回答我：“不管埃斯科瓦尔的何种口信，现在都先不去谈它。如果他们千方百计想杀我……”然后他穿过院子回到了宴会桌上。

这一天夜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反复地思考：如果我们告诉埃斯科瓦尔总统的反应是什么，他必定会把总统杀了。所以我只能保持沉默。

大毒梟埃斯科瓦尔已被击毙，他是个什么东西呢？

埃斯科瓦尔 17 岁时，由盗墓和偷汽车的小偷成了最有名的罪犯。他曾把黑手伸到最高当局那里，使 1991 年修改了国家政治宪法，最后投票通过不引渡本国国民案。当新宪法公布几天之后，埃斯科瓦尔投案自首。但他于 1992 年 7 月引人注目的越狱潜逃，直到 1993 年 12 月 2 日被击毙，整整潜逃 17 个月。

埃斯科瓦尔被指控对杀害记者及新闻界负责人吉列尔莫·卡诺和豪尔赫·恩里克负责，因为他们曾揭露了毒贩的活动和罪行。据警方及公安局说，前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和卡洛斯·皮萨里也是这个集团子弹的牺牲品。

警方能结束埃斯科瓦尔的生命靠的是无线电方位测定法。他要求政府以保护其家属的安全换他的投案，尽管政府不大相信这种可能性，但还是接受了。检察院宣布取消警戒，埃斯科瓦尔也减少警卫。

由于埃斯科瓦尔不投案，他的家属去德国避难不成返回圣菲波哥大。于是他通过无线电话与家属通话，仅仅谈了几分钟，就足以让警察确定他呆在麦德林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区里。这时警方的电脑加紧工作，声音传来，证实说话者就是埃斯科瓦尔。无线电方位测定法帮助警察取得了对这个大毒梟斗争的胜利。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人们一道欢庆这一胜利。

1994 年 8 月 29 日，在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威廉·斯蒂伦家中就餐的，不仅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著名作家、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卡洛斯·富恩特斯，而且在这次不寻常的晚餐上还有总统克林顿。

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吃，但却谈了很多。他们谈到古巴，自然也谈到拉丁美洲的问题，而谈得更多的是文学。他们将近谈了一整夜，甚至连晚餐也忘了吃，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他饿了时，他们才想起来用餐。

世人会以为，这次聚会谈论的主题是由于古巴移民达到高潮而在古美之间出现危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又过从甚密，因此古巴是必谈的问题。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事后这样说，古巴不是主要议题，古美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任何干预都是不严肃和不适宜的。但大家都赞成必须找出解决移民的办法，谈判已进入轨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这是试图铺设一座桥梁，因而，这次会晤在政治上来说，比我们谈政治还更重要。”他们坐在桌上之前，并没有事先拟定议程。在谈到毒品和哥伦比亚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问道：“美国警方，何时才会对本国的毒品采取一种最大限度的控制？”

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勾画拉丁美洲的前景时说：“但愿克林顿拥有一批好的顾问，把一项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进行密切协商的政策付诸实践。”

克林顿正在度假。三位作家既没有为某些问题，也没有以特殊的方式邀请他。他倾听着两位拉美作家概括而又十分迅速的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政治。

但是，克林顿将他们的谈话转到文学方面，使谈话者不禁大吃一惊。于是，他回顾往昔，并询问作家们正在读什么书。而总统本人正在阅读一部有关未来经济的书。

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接过话茬，对克林顿说：“您应读读《堂吉诃德》，书中有解决一切的办法。”

“《堂吉诃德》我已经读过。”克林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还说，他曾读过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著作，当然也读过斯蒂伦的书。但是他说，在竞选总统的最后阶段，最喜爱读的书是《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听克林顿上述一席话之后，他想克林顿这样做，肯定是为了谋求拉丁语系者的选票。

也许克林顿是想利用这顿晚餐的机会，向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述他的知识。他还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女儿也读过《百年孤独》。此外，他对马尔克斯说，对于他的另一部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也颇感兴趣。

“玻利瓦尔真这么惨吗？”克林顿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实际情况更惨，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克林顿还说他每晚读两小时书。在他喜爱读的书中，并不轻视侦探小说，主要是墨西哥帕科·伊格纳西奥的小说。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行想与克林顿共进晚餐，身着马球运动服正和夫人、女儿度假的这位美国总统，欣然地接受了。

“从他的谈话内容来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可能是本世纪最有文化修养的美国总统。”

卡洛斯·富恩特斯总结说，克林顿总统的文化修养要比他的前任们高出上千米。

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感到吃惊的是，这次晚餐竟在美国之外引起了轰动。谁也不认为，这次聚会仅仅是一则政治消息。

这次聚会早在3月卡塔赫纳电影节时，在哥伦比亚总统塞萨尔·加维利亚家里就定下来了。但是，克林顿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大作家会晤乐于在作家威廉·斯蒂伦家里。这是一次非正式地谈论拉丁美洲问题的良好机会，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提出此建议后，克林顿接受了。

与会者都说这的确是一次谈论拉丁美洲的好机会。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些事情必须要做。外交有它自己的特长和关注的方面，而这次聚会不是外交，所以不想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是这往往比政治会谈本身更有助于交易。”

卡洛斯·富恩特斯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认为，如果克林顿总统对我们这些作为拉美人所关心的东西有个明确印象，这就足够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语重心长地说道：“饭菜味美可口，但会谈更饶有趣味。”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是有道理的。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圆满结束

了对华访问，这使人联想到他曾对南美哥伦比亚进行的那次私人访问。尽管两次访问的时间、地点、性质和意义都不同，但都受到热烈欢迎。

1993年8月，卡斯特罗对哥伦比亚进行的私人访问，其主要目的是参加他的伟大朋友、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居落成仪式。落成典礼正是由于卡斯特罗和哥伦比亚在职总统加维利亚的光临而举行的，所以参加该仪式的是卡斯特罗这次访问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时，哥伦比亚的传媒对卡斯特罗的访问十分重视，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或发表文章，或通过图像，均称卡斯特罗的罕见访问是多年来的第一次。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促进对卡斯特罗的成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乐于沟通哥、西之间的关系，并设法从哥伦比亚方面解决古巴缺油问题。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古巴的石油成了一大难题。产油的哥伦比亚如向古巴供油，可谓雪中送炭，给改革中的古巴输送新鲜血液。所以卡斯特罗的访问和哥、古关系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

实景实情让人深深体会到，哥伦比亚人都为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仗义勇为感到骄傲，因为他高举民族义旗，维护国家尊严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和不义作坚决的斗争。然而，也有少数人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形象，由于他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过从甚密而受到影响。哥报甚至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他是卡斯特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利亚对古关系的可靠指导者，是卡斯特罗驻哥伦比亚的最好大使。

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明明知道有人对他与卡斯特罗的关系不理解，进而提出反对的看法，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依然故我。他认为，美国对古巴进行长达30多年的封锁是错误的，他坚持站在古巴政府和人民一边，反对以强凌弱的强权政治，以大压小的霸权主义，是天经地义的。

作为小说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在美国每天都有三四千万人像喝牛奶和吃面包一样吸食毒品，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使美国进行严肃调查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哥伦比亚是毒品的最大牺牲品，但美国政府却借毒品问题向哥伦比亚施压，这是不公平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人们阅读，也许他是最重要的两三个西班牙语作家之一，是继塞万提斯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他的整个一生正在变成一个故事，而他和卡斯特罗的交往将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家会把它写入史册。

早在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反对古巴独裁统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已成为拉丁美洲乃至世界青年的榜样，这时正流亡欧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十分佩服，并为他的革命精神和行动所感动。

1959年，大西洋加勒比海上最大的岛屿之国、产糖闻名于世、并有“加勒比海明珠”之称的古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了独裁统治，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权，成为美洲大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古巴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和世界和平，坚决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作为进步记者和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古巴的革命和卡斯特罗新政府的立场，持坚决支持的态度。当古巴新政府的拉美社聘请他为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特派记者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欣然接受；接着他作为拉美社的记者去纽约，担任拉美社纽约分社副社长兼常驻联合国

记者，一直工作到 1961 年 6 月。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近百年来美国一直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视作它的势力范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美国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它决不允许其后院有一个敢于和它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因此把古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摧毁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府恢复旧政权的方针驱使下，1960 年 5 月，美国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并切断了古巴的原油供应线；1961 年初宣布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1961 年 4 月，美国赤膊上阵，派出 1000 多名雇佣军在吉隆滩和猪湾登陆，武装入侵古巴，企图把古巴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此时，作为古巴拉美社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美国欲消除古巴革命政权的狰狞面目和险恶用心，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于是，操起他那如椽之笔，写了一些谴责美国、声援和支持古巴革命的消息和通讯报道。

自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人民及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关系。这种在革命中建立的深情厚谊，古巴人民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也不会忘记。了解内情者都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过从甚密的缘故。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集团消失，古巴与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战略结盟关系也不复存在。由于外援急剧减少，古巴陷入了革命胜利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此时，美国以为搞垮古巴革命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采取以压促变的战略，进一步推行对古巴的孤立和封锁政策，逼使古巴就范。

但是，美国的阴谋并未得逞，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主席的领导下，与美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外交上，古巴奉行了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政策，重返拉美、回归拉美大家庭是古巴近年来外交的重点。卡斯特罗主席频频出访拉美，而 1993 年 8 月他对哥伦比亚的私人访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积极促成的。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受到在职总统加维利亚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热情欢迎。访问期间，卡斯特罗主席所到之处也给哥伦比亚群众留下很好的印象。从电视屏幕和报刊上都能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陪同卡斯特罗活动的镜头。总统加维利亚给予卡斯特罗十分友好地接待，还达成了哥伦比亚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协议，解决了古巴的应急问题。

当时，哥伦比亚报纸载文称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伟大朋友，他写过一系列有关古巴人的人道主义的报道。

古巴是哥伦比亚的近邻，在中断了数十年外交关系后，古巴近两年中先后与哥伦比亚、智利等 10 个拉美国家复交或实现了关系正式化。加西亚·马尔克斯致力于哥—古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终于见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访问古巴，他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和密切。

从圣菲波哥大传来一条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百年孤独》饮誉世界的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纪实小说《绑票消

息》，将于 1996 年初与读者见面。小说纪录了哥伦比亚贩毒集团 1989 至 1991 年先后绑架 9 名记者的过程，反映了贩毒集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由记者到作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向仗义勇为，打抱不平。早在 80 年代初，他应政府的委托，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和记者卡斯特罗·卡伊塞诺一道，与大毒梟埃斯科瓦尔进行谈判。

当时，世界大毒梟埃斯科瓦尔正猖獗横行一时，谈判未果。后来，这个以盗墓和偷汽车起家的大毒贩把黑手伸向最高当局，借 1991 年修改国家政治宪法、投票通过不引渡本国国民案的机会，投案自首，被关押在一座有豪华设备的监狱里。但他后来越狱逃跑，躲藏在麦德林城里。他潜逃 17 个月后，才于 1993 年 12 月 2 日被击毙。

埃斯科瓦尔干尽了坏事。据揭露，他不但绑架记者，还杀害了《旁观者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及豪尔赫·恩里克等记者。由于贩毒集团的操纵或影响，哥伦比亚最近 10 年的凶杀数字增加 4 倍，而记者是他们杀害的主要对象之一。

哥伦比亚职业记者伊西多罗·梅迪纳和卡洛斯·奥维多合著的《我是记者，不要开枪》一书指出：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不论是从事文字工作，还是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都是为我们苦难深重的国家，为记者的崇高事业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在哥伦比亚人的脑海和心灵里都占有重要位置。

在雷纳尔多·拉米雷斯的著作《关于新闻权》里也指出：为了反对毒品贩子，为了揭露不道德行为……总之，是因为他们严格地坚持记者是对社会批评有道德心的人这一原则，许多记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哥伦比亚《共和国报》1993 年 3 月报道，从 1987 年到 1993 年 3 月 12 日，库库塔市《舆论报》社长欧斯托希奥·科尔梅纳雷斯遇害，惨遭杀害的记者已达上百人。3 月 17 日，女记者图利亚·欧亨尼娅又遭毒手。为此，《新世纪报》署名文章惊呼：哥伦比亚的新闻事业已处于危机。这使一批围着欧亨尼娅遗体的记者倍感悲伤与困惑：一个这样年轻、能干、漂亮、丈夫也是记者的女人为何会死？他们还惊讶地自问：下一个该轮到谁？

在哥伦比亚，记者无需受到恐吓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只要他每天完成他的报道任务，并对发生的事进行评析，就使他的生存与活动陷入麻烦之中。新闻报道的原则往往与毒贩的活动相悖，毒贩希望他们搞的炸弹暴力活动不要被报道，或者只报道与他们利益相符合的消息。

据悉，《旁观者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在波哥大被害，玛格丽塔在西米塔被害，豪尔赫在塞哥维亚被害……都不明不白地搁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部纪实小说，也许会引起哥伦比亚乃至世界记者和人民的关注，世人也许会因此更加警觉拉丁美洲的祸害——贩毒。众所周知，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头子埃斯科瓦尔被击毙了，但是，据说掌握着对美、欧百分之八十毒品交易的卡利集团尚未斩草除根，记者对毒贩的报道任重道远。

1994 年 10 月 1 日，当美国驻哥伦比亚前缉毒局局长约瑟夫·托夫特发表声明，指责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利亚禁毒不力，称哥伦比亚实行的

是“毒品民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立即发表声明予以反驳。他认为，约瑟夫·托夫特的声明是恐怖性的，令人感到愤怒。

他说，造成哥伦比亚悲剧的惟一责任是美国当局及其文明社会的被动与共谋。如果没有公开的、不受制裁的与受到保护的市场，哥伦比亚不可能处于这种磨难之中。

他说，毒品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主要是因为美国有三四千万吸毒者，他们对毒品的需求就像牛奶与面包一样。这是因为存在着哥伦比亚更强大更罪恶的黑手党，才存在这种现象，尽管如此，美国连一个被囚禁的警察也没有。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美国缉毒局和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忘了，正是我们哥伦比亚记者早于它们更好地调查和揭露了在我们国家里吸毒者制造的恐怖事件，而且自多年以前，我们就同一大批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遇害同事一道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斗争。相反，在美国没有一个警察，也没有一个记者，履行了其职业道德和义务，来揭露使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者的恐怖机构，也没有为反对毒品而流过一滴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声明中最后说，每当出现这种事时，我们哥伦比亚人都气愤得声嘶力竭，并为我国的外部形象受损不寒而栗。现在战胜自我哀怨的时候到了，劳美国的大驾做严肃调查的时候到了。美国曾拒绝调查，拒绝通过调查向美国社会和整个世界表明，可怖的自我种族灭绝及全民吸毒的极大可耻是怎样造成的，而哥伦比亚则为这种吸毒的最大牺牲者。

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欣慰的是，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对毒品和毒贩的危害已经看清楚，并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了扫毒的部分胜利。1995年初，哥伦比亚政府决定在两年内完全根除非法毒品作物。这一年共根除30476公顷古柯、罂粟和大麻。1996年在1995年反毒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捣毁毒品作物的同时加强了对贩毒集团、毒品加工和毒品运输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卡利集团的6名主要头目，1名被击毙，5名被关进了监狱。但哥伦比亚不会因为内有困难、外有美国指责而放松缉毒斗争。

第十二章 上书总统

1994年7月21日，在由10名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教育和发展委员会会议闭幕式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宣读了“哥伦比亚学者”递交给总统的报告。评论家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以如此简捷明确的方式阐述过哥伦比亚的现实。这篇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独特风格撰写的关于国家历史和现实的报告，是科学、教育和发展委员会的第一项重要文件，题为《为一个造福于儿童的国家而奋斗》：

第一批来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为鸟儿的歌声所震惊，被纯粹的香味所陶醉；他们在短短几年里，就吃绝了一种味道极美的土著居民喂来食用的哑巴狗。这些西班牙人中的许多人和随之而来的另一些人，都是在自由条件下的普通罪人，他们再也没有理由留下来；土著居民很快觉得更没有理由希望他们留下来。

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书信的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由于犯了一个地理上的错误，才发现了这座乐园，但是这个错误竟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在哥伦布到达这个乐园前夕，他在黑暗中听到第一批鸟儿的飞翔声前，曾在风里闻到一股地上的花香，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甜美的东西。

哥伦布在他的船上日记里写道：土著人就像他们的母亲分娩他们一样在广场上迎接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漂亮的人，性格好，又如此自然单纯。他们用金环和铜铃鼓换东西。然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手镯、项链、耳环、护踝和鼻环一样，都是金质时，他们的心便失去了自制力；于是，有的用玩的金钟，有的用金囊掩饰自己的羞耻。这种华丽是装饰用的，不是他们人的价值，而这种华贵成了从那天起新的创世纪主角们谴责土著居民的东西。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死的时候并不知道侵略来自哪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死在什么地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代表哥伦比亚最著名的学者，为科学、教育和发展委员会起草的题为《为一个造福于儿童的国家而奋斗》的文件，是一个纲领性的宣言。全文共分八个部分，从过去讲到现在，从今天讲到明天；从科学谈到教育，从教育又谈到发展；从民族说到国家，从国家说到政府……

具有极其渊博历史知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从历史的角度，将哥伦比亚的历史变迁，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以及西蒙·玻利瓦尔等英雄人物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奋斗，讲得清清楚楚；同时指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奋斗目标，应很好地利用第二个机会，为一个正义繁荣的造福儿童的国家而奋斗！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撰写这个历史性的文件时，并非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而是以政治家的风度，分析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为人民群众和祖国的未来着想，愿哥伦比亚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很多哥伦比亚人都乐于倾听或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最著名

的演说，这些美妙的演说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82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演说和1993年在纳里尼奥政府宫为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而发表的题为《为阿尔瓦罗·穆蒂斯祝寿》的演说。但是人们只知道这两次响彻国内外的演说，而知道他发表第一次演说的人也许很少。

早在50年前，在西帕吉拉国立中学毕业典礼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正式演说者，发表了一篇阐述友谊的重要演说。这篇未发表过的演说就已经显示出这位作家的才气。1994年11月17日，那些在西帕吉拉中学举行金婚纪念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学友们，回顾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那次演说。

才华横溢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过几年的中学生活，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加上他是该校文学杂志《地平线》主编，广泛联系群众，同时了解每个同学的个性和爱好，尤其是对那些与他同是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学生们，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演说的是友谊。

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说的方式也不落俗套，而是特别重视演说的艺术和技巧。请看他是如何开头而又将听众牢牢吸引住的：

“一般来说，在像这样的所有社会活动中，要指定一个人发表演说。这个人总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题目，面对听众来发挥这个议题。但是我不发表演说，我愿为今天选择一个高尚的题目：友谊。”这几句话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说的开场白。他用“友谊”二字概括了毕业典礼要达到的目的。但他又说不是演说，这比千言万语的作用还要大。

紧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上面的话茬，把友谊引向深入。于是他问他的学友们：“我为什么能向你们谈论友谊呢？因为我肚子里装着某些趣闻和格言之类的东西。请每个人都来分析一下你们各人的感情及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那么你们各人就会找到一个自己愿把心事寄托其身的偏爱者。于是，你们就将懂得今天这个活动的道理了。”

这段话不问自明。说明每个人都有可以向其吐出肺腑之言的朋友，相互信任，亲密无间。这就是同学之间的友谊。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所有一切日常琐事，通过牢不可破的纽带，把我们这批今天将开辟生活之路的青年人团结了起来，这就是友谊。这就是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一切。但我再重复一句，我不发表演说，我只想任命你们为有良心的评判员，然后请你们和本校同学一起来度过这离别的痛苦时刻。”

说完上面一席话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将要告别母校奔向新生活的同学的名单宣读了一遍。同时，把同学们之间谁与谁有着共同的爱好、志向和特长，都明确说了出来。对每个人或几个人的共同点讲了出来，就是对他们的认可和赞扬，以便在新的生活道路上发扬光大，努力奋斗。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这批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将载入哥伦比亚最美的画册。大家将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去奋斗。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面的这段话作为他的这篇题为《义务学校》演说的结束语：

“现在，你们都听到了每人的品德，我就宣布你们作为有良心的法

官应考虑的判断：我以国立中学和社会的名义，借用西塞罗的话，宣布这批青年为义务学校一号学员和聪明公民。”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学结业式的演说给他的学友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以50年后，温贝托·海梅斯还以题为《卡博在西帕吉拉》撰文，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发表演说时的情景，以及他们愉快的学生生活。这些如今已传为佳话。

《拉丁美洲的孤独》被誉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著名的演说之一。

以其代表作《百年孤独》而获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他站在他的拉丁美洲同行、危地马拉诗人兼作家的阿斯图里亚斯、智利两位大诗人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站过的神圣讲台上，于1982年领取瑞典文学院为他颁发的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拉丁美洲的孤独》这一著名演说，道出了拉丁美洲的真正现实，迄今还仿佛回响在人们的耳际。

然而，当时站在领奖台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竟是一位长时间流亡的作家。他先流亡在欧洲，后客居墨西哥。

当他被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派驻欧洲之后，由于本国独裁者封了《旁观者报》，他便断绝了生活来源。于是，他穷困潦倒在巴黎街上，靠卖文为生。朝不保夕的生活境况使他与留居那里的拉美人进一步接触，从他们身上又联想到拉美各国人民的情况。和欧洲人相比，拉美人的生活是何等困苦，其地位何等低下！他们的拉美兄弟需要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是帮助。但是却得不到。

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演说中所说：“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是拉丁美洲这个巨大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它每时每刻、每天每日决定着不计其数的生离死别……这一异乎寻常的现实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诗人还是乞丐，音乐家还是预言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很少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了使生活变得令人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拉丁美洲为什么缺乏必需的常规财富，是这个大陆不富饶美丽，还是人民不辛勤劳动？都不是。因为拉丁美洲是个神奇的大陆，又是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凡是世界其他地域有的矿物，也许拉丁美洲都有。不然的话，欧洲人为何曾冒险去那里寻找“黄金国”和“永葆青春之泉”呢？

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演说中是这样说的：“摆脱西班牙统治而获得独立并未使我们脱离愚昧疯癫的状态。”墨西哥出了个三次连任的独裁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纳将军；厄瓜多尔出了个进行绝对君主统治达16年之久的加西亚·莫莱诺将军；萨尔瓦多出了个一次屠杀三万个农民的暴君马克西米利安诺·马丁尼斯将军等。也就是说，赶走了殖民主义者，跳出了当地的军事独裁者。他们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哪里还有生活的常规财富？

西塞罗，古罗马的思想家和演说家。

尽管拉丁美洲有着辽阔的疆域和宁折不屈的人民，但是由于统治者争权夺利，使人们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致使一个合法总统即智利总统阿连德在火海般的官邸以身殉职；在此段时间内，发生了五次战争、十七次政变；被镇压致死的人几乎有十二万之多；那些逃离家园，流离失所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就是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这篇演说中揭露出来的拉美现实，也是拉丁美洲孤独的原因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如果说，这些困难阻碍了我们，那就不难理解世界上这一边的头脑清醒的天才们，为什么沉醉在欣赏自己的文化之中，而寻找不到表现我们的有效方式。”“以他人的图表来表现我们的现实只会使我们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知，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孤独。”

拉丁美洲不愿、也不应成为一盘棋局中没有主见的“相”。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却是生活。”

应该怎么生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演说的最后部分指出，应该着手建造一个与人类有史以来的某种乌托邦相抗衡的乌托邦。“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灿烂如锦的、生意盎然的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被人决定死亡的方式，爱情真诚无欺，幸福得以实现，而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最终会获得并将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为阿尔瓦罗·穆蒂斯祝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4年在阿·穆蒂斯70寿辰之际发表的又一篇最著名的演说。

阿·穆蒂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伟大朋友，是哥伦比亚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演说中，陈述了他们二人多年以来的交情。现将演说摘录如下。

我们曾经订过盟约，在公开场所，一个人不谈另一个。这正如疫苗与天花相制约一样。但是，恰在10年以前，就在这同一个地方，仅仅因为他不喜欢我给他推荐的理发师，他破坏了那个有助于社会健康的盟约。自那时起，我一直等待一个吞吃这盘冷碟的报复机会。

当时，阿尔瓦罗叙述了贡萨洛·马利亚里诺怎样在田园诗般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的事。这使我突然出神地想起我的大学岁月，当时的我们，就躲藏在哥伦比亚国家图书馆那个无人的小音乐室里。

阿尔瓦罗经历过职业上的无数危险。18岁他任国家电台播音员时，在他的节目中即兴表演一个全副武装的好忌妒的丈夫在街角上等待着的情形，因为他以为曾将密码口信示意给了他的妻子。

还有一次，在总统府举行的一次庄严仪式上，他把两个大耶拉斯的名字弄混了。后来，作为公共专家，他在一次慈善会上放错了影片。他放的不是孤儿故事片，而为那些上流社会的淑女们放映了在一个无辜标题《种植柑桔树》掩饰下的修女和战士之间的色情故事片。

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馆里，阿尔瓦罗大喊着说，他的邻桌企图袭击他，因为以为他真的是他在电视片《不可碰的人》里扮演的那个人。

在长达23年的拉美影片推销员的工作期间，曾给他17次飞往世界各地的机会，却并未改变他做人的方式。他对学校教师慷慨大方，达到酷爱的程度，然而由于他有爱打台球的坏习惯，他从来没有当过教师。

没有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作家像他那样关心他人，特别是关心比较年轻的人。他鼓励他们违背父母的意愿学习诗歌，用秘密书籍改变他们，

用生花的口才感化他们，让他们漫游世界，使他们确信，成为诗人是可能的。

谁也没有我从他的这种美德中得到的实惠更多。

我有一次曾经说过，是阿尔瓦罗把第一册《佩德罗·帕拉莫》带给我的，他并且对我说：“书里有您可学的东西。”

他从来不曾想像到他参与了这种文学创作。因为我从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中，不仅学会以别的方式写作，而且学会准备一个不同的故事，以便不重述我正在写的东西。我的这种可以用来挽救作品的写作方法的纯粹牺牲品，从我写作《百年孤独》起，就是阿尔瓦罗·穆蒂斯。

他在 18 个月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我家里，让我跟他讲述完成的章节，我以此接受他的反应，尽管不是同一个故事。

他以无比的热情听我讲述这些章节，让我继续重述这些章节的部分。事后，他的朋友向我叙述此事时，就像阿尔瓦罗跟他们叙述这些章节一样，而我多次占有了他的贡献。第一遍初稿结束后，我把它寄送到他家里，第二天，阿尔瓦罗就在电话上愤慨地对我说：“您使我像一条狗一样跟它的朋友在一起。”我对他说：“这与您跟我说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自那时起，他便成了我的原稿的第一读者。他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但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至少有 3 部小说夭折在废纸篓里，因为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我本人不好说，几乎在我的所有书里都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

人们经常问我，这种友谊如何能在这样不寻常的时间里长存下来。回答是简单的。阿尔瓦罗和我很少见面，仅仅是朋友。尽管我们都曾在墨西哥生活 30 多年，又几乎是邻居，就是在那里我们也很少见面。当我想见他，或者他想见我时，我们事先电话联系，以便确定我们都希望见面。

我仅有一次破坏了这种基本友谊的原则。情况是这样的：被龙舌兰酒困扰着的我，和一位十分亲爱的朋友，在凌晨 4 点钟，叩开阿尔瓦罗房间的门。他当时是单身，过着一种听从命运摆布的忧郁生活。

面对他那仍被睡意困扰的目光，我们没作任何解释，便取下博特罗的一幅长 1.2 米，宽 1 米的珍贵油画。我们没作解释，带上油画，并对他做了他赐予我们的表示，走了。

阿尔瓦罗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有关那次突袭的话，而我一直等到他 70 寿辰这个晚上，才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这种友谊的另一个好支柱是我们多次在一起进行的旅行。这便于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别人和别的事，只有实际上值得时，我们才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

我们对旅游学校最美好的回忆不是上课，而是课间休息。

在巴黎，我正在等待着女士们购物，坐在时髦咖啡馆台阶上的阿尔瓦罗，把头扭向天空，翻着白眼，伸出一只乞讨的手。这时，一位无可指责的先生，用典型的法语调儿对他说：“您是个穿着卡耶尔之流运动衫的无耻的乞讨之徒。”他给了阿尔瓦罗一个法郎，在不到一刻钟内，他收到 40 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塞斯科·罗西之家，阿尔瓦罗用自己创造的意大利语

（实际上没一句意大利语），便使费利尼、莫尼卡·比蒂、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对意大利的电影和文学精华着迷；并且几小时的跟他们讲述金迪奥省的恐怖史，使他们惴惴不安。

在巴塞罗那，他模仿巴勃罗·聂鲁达的声音和沮丧的语调朗诵一首诗，一个亲耳听过聂鲁达朗诵的人走过来，要求他亲笔签名，以为他就是聂鲁达。他的一首诗，自从我读过之后，就感到不安。现在我才知道，我将永远不认识伊斯坦布尔，那是一首在不可挽救的君主政体下产生的奇怪的诗，因为从来不说伊斯坦布尔，而说拜占庭。这正如在历史给予他理由很久以后，不叫列宁格勒而叫彼得堡一样。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种预感，我们应该为那首承认伊斯坦布尔的诗驱邪。因此，我说服了他，让我们乘一艘慢船走，这正如一个人和命运挑战时应该做的那样。尽管如此，在我们住在那儿的3天里，由于受到那首诗的预兆的恐吓，阿尔瓦罗没有平静的时候。只有今天，当阿尔瓦罗是一位70岁的老人，我成了一个66岁的孩子时，我才敢说这句话。我当时没说，不是怕败坏一首诗，而是为了阻碍死神。

不管怎么说，惟一的一次我真的以为差一点儿要死了，也是和阿尔瓦罗在一起。我们驾车行驶到著名的普罗斯的时候，一个患精神病的驾驶员驾车从反方向朝我们开来。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右打方向盘，我也没时间看我们跌到何处。一时间，我剧烈的感到，方向盘在空中不听我使唤。一直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卡门和梅塞德斯，直到汽车像一个小孩似的躺在春天大葡萄园的排水沟里时，才喘过气来。我对那次事故还惟一记忆着的是，在旁边座位上的阿尔瓦罗的脸，仿佛在死的前一刻，用一种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好像在说：“这个笨蛋做的什么鸡巴事。”

阿尔瓦罗的母亲曾是个漂亮迷人的女性，但是，20年以来，她已不再照镜子，因为她开始以自己认为的不同方式来看待自己。她是一个进步的老奶奶，她穿着猎人服，骑着自行车，在大草原的庄园里为人们无偿地打针。

在纽约的一天晚上，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请她留下照看我的14个月的孩子。她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们要当心，因为在马尼萨莱斯时，她曾对一个孩子使过一招。由于这个孩子不停地哭，她不得不用一枚有毒的甜黑莓使他安静下来。

尽管她这样说，那一天，我们在“梅亚西斯”商店里还是把孩子委托给了她。当我们看完电影回来时，发现只有她一个人，而治安机构正在寻找孩子。可她还企图安慰我们，就拿她的儿子同样严肃的例子说：“你们别担心，阿尔瓦罗在布鲁塞尔时也曾让我丢失过，当时他7岁，现在你们看他还好好的。”

当然他好好的，这是她的一种文明、极好的解释。他还在半个地球上出了名，这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歌，也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人。他所到之处，均留下狂热的奇谈，拼命的美餐和才华横溢的难忘的踪迹。

只有我们认识他和最爱他的这些人，才知道吓唬他的幻觉的不过是虚张声势。谁也不会想像到，阿尔瓦罗·穆蒂斯为成为这种和蔼可亲的人不幸付出的极高代价是什么。

我见过他躺在一张沙发上，在半明半暗的学习间里，心里怀着一种任何一个上夜的幸福查帐员也不忌妒的酒后不适。这种无法医治的孤独是他的另一位母亲。他的无限智慧，他那异乎寻常的文学才能，他的无比好奇心和幻想美，他的诗歌的不尽的忧伤感，都归功于这位母亲。

我曾见他躺在奎尔纳瓦卡公园偏僻的一角，靠森林逃避现实，在长长的假期里，专心攻读巴尔扎克的全集。

他6年写了八本书。只要读过任何一本的仅仅一页，便足以了解它的全貌。阿尔瓦罗的全部著作是他的生命本身。他以某种意识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失去的乐园。

让我们和这个不幸的结论在一起，我们今晚与阿尔瓦罗一道过他的70大寿。第一次没有虚伪的害臊，没有提及母亲，因为怕哭，只为了全心全意地对他说，我们多么钦佩他，我们多么爱他。

第十三章 孕育幸福

加西亚·马尔克斯关心哥伦比亚的教育事业，也主张通过历史来教育人们，所以他希望写一部新的哥伦比亚历史。

他在如何在哥伦比亚青少年中发现和培养文艺天才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根据我的观点，记者、艺术家、作家和一般艺人，他们在出生时就伴随某些以后会出现的爱好、能力和才干。我这里想要说的是，在叙述故事方面，有些人会叙述，有些人就不会叙述，我并不想说，第二种人比第一种人差，我只是认为他永远不是讲故事的料。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记者和艺术家身上。总的来看，仿佛今天不存在教育一般，它将才能化为乌有，因为人们把儿童和青年引上歧途，以便剪断他们的翅膀。这不是因为心坏，而是由于不了解学生的天才。我从经验中知道这个。对我来说，为了成为作家，所有那些年我都变戏法般地学习，因为代数、几何及其他一切夺去了我的时间。当然儿童必须学习，并用总的文化来塑造自己，但是，教师们应该意识到，学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本领。而要得到这些本领和为这些本领开辟适当道路，就应该从在家庭里的努力开始。因此我创造一种工作——它不是一种教育方法或一种学校——在此工作中体现出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经验，以便看一看我们能否帮助教育家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的设想是，教育开始在摇篮，结束在坟墓，而不仅仅是在学校。我本人认为，艺术家们从幼年便可觉察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成长为作家的经验谈论如何教育和培养哥伦比亚的青少年。他视下一代是未来的希望，十分重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提出用哥伦比亚的历史和历史故事，并借助于电视，来教育青少年及全体人民，所以他提出“新历史”一说。

他希望编制一套关于哥伦比亚新历史的电视节目，作为特别节目播放；他还希望创建一所哥伦比亚秘密历史研究院，之所以冠上“秘密”两个字，大概是在初创阶段不想公诸于世，待成绩斐然后再公开。这符合这位大作家的逻辑思维。

哥伦比亚的一家报纸在评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设想时说，他的这个念头是用文火煮制成的。作为美好的设想，并没去寻觅，它就出现了。它是从女历史学家玛丽亚·特雷莎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次偶然相遇后产生的，因为两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不安：哥伦比亚的历史！

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一种特殊兴趣说：“为了澄清我们过去的真实情况，建立我们的秘密历史研究院。”

研究院的“产品”也许将是历史与文学、真实轶事与再创作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合理平衡。

这些产品将反映在电视特别节目中，通过电视向成百万的哥伦比亚观众介绍哥伦比亚的历史。具体来说，这段历史是自1790到1915年。历史学家建议，把这段历史称为“从叶绿素到烟火”。

这个令人激动的节目，其主持者是卡米洛·托雷斯、安东尼奥·纳里尼奥和卡尔塔斯等。

围绕着卡博的构想和卡博本人，聚集了历史学家、档案和文件爱好者与查阅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们查找资料，

研究那个时代人们的爱好与生活方式，甚至连送一个孩子上学要花多少钱、贵族和贫民为什么会死亡那么多，是患伤寒或是肺病……都研究得很详细。他们定期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奇闻轶事，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等材料查找好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调整了电视小说的结构，调查了哥伦比亚人的接受能力，并研究了如何使各种年龄的电视观众都达到最佳的收视效果，最后确定编制一套分为6个部分的电视连续剧，每次播放1小时。

这部电视连续剧6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个由于种族不和而未如愿的爱情故事；一伙梦想得到自由的黑人；村上有个滥用权威的家庭；两个审判妖术的妇女；关于一个饶舌女人的故事以及两个村镇都想左右村政府的故事等。

卡博对这套电视连续剧感到高兴。因为他不仅接触到了国家的秘密历史，而且学会了分组工作：“我在生活中的伟大发现，我幸运地认为，还不算太晚”。

总之，卡博的想法是为达到让哥伦比亚人对历史感兴趣的目的，让人们从电视小说过滤器里看一下历史。

卡博的做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所以能得到支持。在支持卡博并参加实际工作的人员中不乏历史学家。有大学教授、专攻政治历史的马加丽塔·加里多和专攻社会历史的巴勃罗·罗德里格斯；罗伯托·路易斯是麦德林国家大学教授；而女顾问迪亚娜·奥夫雷贡是专攻科学历史的国立大学教授。

但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一做法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利用与滥用历史》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早在1946年，路易斯·爱德华多·涅托·阿特塔就批评了哥伦比亚历史的状况，……这位巴兰基利亚知识分子的矛头指向历史研究院和当时最尊贵的祖国史学。”

文章接着说：几乎半个世纪过去后，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重开这场争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递交关于哥伦比亚教育的学者委员会报告时说：“他们批评过我们，他们把一种对历史的满意解释官方化。”加西亚·马尔克斯抨击“官方历史”不是第一次了。在《迷宫中的将军》出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接见玛丽亚·埃尔维托·桑佩尔（见1989年3月14日《一周》周刊）时说：“我惟一知道的是，我们不了解哥伦比亚的历史。”这正是他同意用他的书的收益成立一个基金会的时候，“以便去组织一批年轻的未被污染的历史学家，设法写出一部真正的哥伦比亚历史，不是官方的历史……”

1994年12月12日，哥伦比亚有影响的《时代报》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故事”后面有历史》，并刊登了一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是：故事的设想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习惯地把自己右手的食指头放在微张的两唇之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正陷入深思之中。

《时代报》告诉我们，大部分的哥伦比亚历史系列片都围绕着解放战役转，围绕着独立宣言，以及出生在拉丁美洲的高傲的西班牙人转。而这并非确实因为这是哥伦比亚漫长历史的最感人的一章，而是因为到

现在为止，少数人还没把脑袋钻进其他方案里。

哥伦比亚人说，对在电视上做出花样的最热情者是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希望通过奇闻轶事，将哥伦比亚 18 世纪隐蔽的一边照亮一下。

1993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以《为了 21 世纪的 21 位学者》为通栏标题，以灯火辉煌的卡塔赫纳城的夜景为题图，报道了在此间举行的一次世界学者深思会议降下帷幕的消息。

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召开的世界著名学者深思会议，由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主持。

这次自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的会议共进行 8 天。意大利、法国、巴西、埃及、以色列、坦桑尼亚、罗马尼亚、印度和中国的学者在讨论会上发了言。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特别关注的热情几次讲话，并作了有趣而且含义深长的总结发言，受到好评。

这次会议比 1992 年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会议的规模大。会上，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切尔·塞雷斯提出，为了满足那些不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公民的需要，创建一种远距离学习的世界大学。这样做能利用通讯技术在世界各地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又不干涉每个国家的主权。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塞雷斯的设想是对那些希望但又不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公民的一种回答。教科文组织负责人西班牙的费德里科·马约尔支持塞雷斯的设想，他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具体成果”。

意大利作家温贝托·埃科表示，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迄今为止的问题是如何教育青年人”。他又说：“为了使教育和文化能够达到那些边远的国家与地区，应该有计划的采取新的解决办法。”

埃科还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放眼未来，未来的希望在于培养全世界的儿童，而成年人已没啥事可做了。

大会的主持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说：“在这次由 5 大洲 21 位知名学者参加的会议上，应该找出解决行将结束的 20 世纪的混乱状态的办法，以此作为维护环境、和平与文化的基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由于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出现数个独立的国家后而在东欧爆发战争时说：“人类在本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遇到的最大问题将是新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大的移民问题。”

在谈到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是个很大的政治、经济和人道的问题，但根本上是个文化问题。”

为了解决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的上述问题，教科文组织负责人费德里科·马约尔说，正在制定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建立世界电台与电视网络，负责宣传教育信息和维护环境、和平与文化价值的必要性。

学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移民问题、民族主义和各国的内部冲突。他们认为，20 世纪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世界。他们正在卡塔赫纳收拾这个世界。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当今世界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说：20 世纪一切都不祥；因此，一切都要留在 21 世纪去做。今天，世界上的任何问题

都是一种文化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本次学者深思会议旨在解决现存问题。我相信，人类现存的最大问题是民族问题，特别是大的移民问题，这次会议应该关注这一点。20世纪把一种绝对的混乱状态留给了我们，我们将看看是否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必须有助于和平。

与会的学者均以饱满的热情讨论涉及到今日社会的迫切问题。他们认为，今天已陷入深刻的信任危机。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地知道是要为21世纪制定一项计划，并要以某些方式，集中力量努力实行这项计划。马尔克斯认为，障碍是很多的，但必须克服。“必须想到，生活总是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美好的东西。”

在“卡塔赫纳声明”中提出创建环球大学，即采取一种教育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容纳世界上的所有教育方式和教育水平，办法是通过一种公开的无界限的全球普及的教育体系进行教学。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没有歧视，基本合理并有道德的教育体系。

卡塔赫纳学者深思会议是在科学家们中间开始，在关心世界的朋友中间结束的。会议的最后文件，确实是一种反映了有细微分歧和观点的文件，但这是学者们都可以接受的文件。

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很多，诸如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分歧等等。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样，创造一个“能够孕育幸福”的世界。

会议最后一致认为，“希望是平静正义的生活总会战胜以任何暴力形式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生活”。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的一般情况，还摘发了采访其中12位学者的谈话纪要。中国学者张卫（音译）工程师在回答关于下一个世纪的技术问题时说：技术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科技已经以一种任何人也不可想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重视技术，可以把技术引进一个更幸福更有成就的社会。这些观点有助我们去抒写未来。

最后，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了总结性发言。他的发言妙趣横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又聚集在这里。我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仿佛听到有人说过，即使我们达不到任何目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来到了这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交了朋友。在巴黎时，我们已经迈出几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成了朋友。这要归功于我们关在一起的这么多天，好像是做夫妻，但是在两个人之间而是在二十个人之间做夫妻。我想，我们将夫妻形式中的一些形式付诸实际后便知道是夫妻或不是夫妻。一些人先试，另一些人后试。第一种，一种秘密形式是永远不会同时生气。第二种，如果两个人同时偶然生气，他们生气不超过5分钟，或最多10分钟，然后又相互说话了，仿佛任何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们用这种形式才得以进行各种讨论和争论。我们的最后意见统一在一份文件里，在这份文件里，可以觉察出在最后几分钟是有点儿仓促。我认为，在会议将要结束前的1小时，我们谁也不认为会有一份如此一致的文件出现，我们都相当赞同这份文件。

早在45年前，我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会议，我们记者都等

待一份文件。与这次会议和这份声明的惟一区别是，那份文件始终没有出笼。那次会议对他们来说不像我们这次最后大家都成了朋友。那是涉及到战争的胜利者美、苏、法、英政府。他们知道并且相信，他们实际上已经战胜了。而我们赢得的惟一战争是会议之战。我们现在是朋友，过去是朋友，将来继续是朋友，而多亏了这一点，你们才得到一份我在日内瓦没有得到文件。

第十四章 这就是生活

纵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和生活，正如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像拉丁美洲的其他大多数重要作家一样，在政治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坚定地站在穷人与弱者一边，反对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确，他师承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根据拉美的现实情况，创作出鞭挞拉美独裁者、抨击美帝国主义、抗议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宏篇巨制。他的作品中虽然流露出孤独之感，但他对拉美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并为之奋斗。他在智利前总统阿连德以身殉职时，曾举行过抗议军事独裁政权的“文学罢工”，他曾公开表示过，用诺贝尔奖金创办一家报纸，又把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奖金捐赠给委内瑞拉左派组织“向社会主义进军运动”等等。

加西亚·马尔克斯除进行文学创作外，还很重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认为这是他的永恒的精神支柱。他的妻子梅塞德斯是一位贤妻良母。他的大儿子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但他没从事历史研究，而操自己喜爱的摄影；他的小儿子曾学吹过几年笛子，但后来干起了设计。他和他的妻子从来不对孩子施加压力。他说：“光临我家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的声望也曾对他们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他大儿子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尽量不让别人知道他和父亲的真实身份。

加西亚·马尔克斯喜好旅游，并常常在旅途中瞧看自己的朋友。他说，“因为惟有在朋友中间，我才感到了真正的自我。”

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家还是他最可靠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温馨可爱令人深感幸福美满。他有两个儿子：贡萨洛和罗德里戈，两人都具有一些父亲的创作素质，但都有各自的领域，注重实际，很像他们的母亲。

梅塞德斯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既爱丈夫和儿子，又十分支持他们的事业，为他们营造了一个极其稳定的家庭。

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他和梅塞德斯结婚时的情景：他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穷记者，由于本国独裁者封闭了派他驻欧洲的《旁观者报》，他在巴黎失业了。当时不名一文，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旅店老板见他整天整夜地写作，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免收他的房租。不久，他从巴黎回到哥伦比亚。这时有位品貌端庄的姑娘已经等了他4年之久，不但不嫌他贫寒，而且愿和他结婚，这位姑娘就是他如今的贤内助梅塞德斯女士。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梅塞德斯做伴，如虎添翼，他一边给古巴写报道，一边搞创作。接着，他们的美满婚姻开花结果，生了两个儿子。他随后辞去新闻工作，由纽约到墨西哥定居。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就中也有梅塞德斯的一份心血。她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对他的创作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写作《百年孤独》时，她总是陪伴左右，清楚他的写作进度，甚至对小说中的人物结局仿佛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安排似的。所以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到奥雷良诺上校死时，梅塞德斯对他说：“他的死使你异常痛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早晚要杀死他的，但是不忍下手……现在他确实无力支持下去了，我不得不杀掉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完那一章，浑身颤抖着走上二楼。梅塞德斯正在那儿。她一看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面色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上校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没说一句话，就躺在床上，哭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写作《百年孤独》的时候，默默为他作出牺牲的妻子手里增加了相当于一万多美元的借款和赊账条。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巨大毅力，经过540个昼夜完成这部巨著时，他热烈地抱着妻子说：“要没有梅塞德斯，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后来，当好友门多萨问他“在你所认识的人里，谁是举世罕见的人物”时，他不无感激和骄傲地说道：“我的妻子梅塞德斯。”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他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晨5点半或6点起床，6点半至8点半之间看书。而从8点一直到下午1点是写作时间。中午，他的妻子梅塞德斯总是将可口的饭菜准备好，来到海边，与朋友一道等他吃午饭。那时候，经常有人带着在附近捕的新鲜鱼或龙虾、小虾什么的来到他家。他的来自药剂师之家的妻子梅塞德斯大显身手，将这些海鲜做得味美可口，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来访者一同享用，这给他的写作生活平添了莫大的喜悦。

在读者中，凡是对拉美文学感兴趣者，都读过《百年孤独》，因为这部小说被誉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但是对这部名著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的就不多了。因为这位大作家虽然对中国友好，但没有公开访问过中国，仅于1990年10月15日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从日本东京秘密来到北京。他没有惊动中国的文化部门，也没有惊动他的中国同行，静悄悄地入境，下榻于北京国贸大厦。中国读者对他不甚了解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哥伦比亚惟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极其关心国家政治生活。恐怕他是当今拉丁美洲作家——政治家中最活跃的人物。他为了拉美实现和平与安定四处奔波，可他对政治职位却很淡漠。他是为民请愿、为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繁荣昌盛而效力；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哥伦比亚的报刊和银屏上，有时甚至比总统出现的次数还要多。

倘若恰逢他的新作面世，介绍他的作品及他本人的文字和图片，几乎天天不断，令人目不暇接。比如他的最新世界畅销小说《爱情与魔鬼》，于1994年4月在哥伦比亚和安第斯条约国及美国、西班牙同时公开发行时，笔者正在他的祖国哥伦比亚，有幸浏览介绍这部小说的文字和他本人的多幅照片。其中由路易斯·米格尔·帕洛马雷斯拍摄的那一幅格外引人注目：容光焕发，笑逐颜开；身着粗呢子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双手抱在胸前，凝视着远方……显示出由于新作的成功而感到的甘甜。

平时，很少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喜形于色；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将黑黑的两道蚕眉紧锁起来。画家们说，要得笑，眉梢翘，可加西亚·马尔克斯眉梢翘的时候不很多。在他那张学者型的脸上，额头上那两道深深的平行线似的皱纹，正是他那超凡脱俗智慧的象征，而那花白的满头短发与几乎全白的上唇的小胡子相映生辉，记录了岁月的艰辛。

大师的穿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较随意。他多着白色或黑色衬衣，

外套是花呢子西装，平时爱穿甲克衫；穿西服时多打深颜色领带，显得庄重大方。而他穿毛衣外套的时候也不少。从着装来看，他并不刻意讲究，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美好印象。

当然，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的习惯与客观环境是分不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过一个由农村到城市，由本国到异域，由记者到作家的艰苦创业的历程。小时候，他是兄弟姐妹十多人中的长者，很少得到父母的特别爱护。先是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稍大一点，被送到远离亲人的他乡寄宿中学求学。他只顾一心一意地读书，哪里顾得上穿着？读大学的时候，由于内战爆发，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到巴兰基利亚一家报社工作。住在一间四壁空空，只有一张写字桌和一张行军床的楼上，而楼下便是为糊口而挣扎的妓女们。这时的青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体瘦弱，衣冠不整，褐色的脸庞，黑黑的卷发，留着一绺小胡子，身穿一件花色上衣。见人怯生生的……

195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旁观者报》派驻欧洲，但是好景不长。他在巴黎时，当时的哥伦比亚独裁者封闭了《旁观者报》，他失业了；生活困窘，不名一文，几乎无法安身。幸亏旅店老板发了善心，见他孜孜不倦地写作，就产生了恻隐之心，决定免收他的房租。这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过着不折不扣的流亡生活。就是这个流亡青年作家，阅尽人间万象百态，卧薪尝胆，通宵达旦地写作。这使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幅照片：他一手撑着头，一手秉笔疾书，不仅衣衫是破的，连鞋子也是旧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只脚全赤着，……多苦！

功夫不负有心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得意之作，可以和《百年孤独》媲美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巴黎完成了。评论家认为，也许它代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浩瀚的著作。对腐败与忧伤感到沮丧的主人公退役上校，迟迟盼不来退役抚恤金，把希望寄托在一只斗鸡上，接受穷困与挨饿，期待一种超越不义与冷漠的制度。他的最后胜利带着一种悲喜交集的英雄色彩。而当时断绝薪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处境和那位退役上校极其相似，所以写出来的这部小说字字掷地有声。

我们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是一位坚强的战士，生活的强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强不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沉重的经济与精神包袱压在肩上，喘不过气来，所以他额头上的皱纹比一般作家既多又深，还养成一种沉思的习惯。从某些镜头上可以发现：他有时坐在那里，目光凝滞，将右手的食指放在上下嘴唇之间，长时地一动不动，仿佛陷入无穷无尽的思虑之中；有时，他两手玩弄着一件东西，两眼静视着手中的玩物，好像要从中引发出一种新的构想；有时，他右手轻抚着脑袋，左手拿着某种计划，双目齐视，嘴角与眼角间隐含着一丝笑意，似乎找到了颇令人开心的好办法……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年近古稀，但他的身体相当健康，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很少见他戴眼镜。这也许与他长期经受磨炼，又注意锻炼身体，讲究饮食卫生有关。

1994年10月份，人们偶然从照片上发现他戴上了一副黑边眼镜。当时他正与哥伦比亚及阿根廷新闻工作者一道，研究如何办一所新闻写作车间，为哥伦比亚及拉丁美洲培养跨世纪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名人为婚礼助兴也是哥伦比亚的一种习俗。一个清风徐来的 9 月的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洛斯·罗萨莱斯教堂参加了一对新婚夫妇的婚礼。当新娘新郎步出教堂时，笑容可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向他们洒去一阵稻雨，象征着吉祥幸福。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沉浸在自己忙中偷闲为新人祝福的喜悦中。

最令人难于忘怀的是，平时穿着大方自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 年金秋时节，当他接过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证书与奖金时，他穿的是一套铁青色的崭新西装，表情自然，举止潇洒。他在那篇语惊四座的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演说词里说：“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英姿及其著名演说已载入史册，这是人类文学史的光荣！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里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卡博，这是他的绰号。他每天总是 5 点差 10 分起床，多年来，养成了读书和写作至下午 2 点的习惯。但他在生活中却引入了新的内容，比如做体育运动，注意饮食卫生，早餐只吃水果和燕麦。他还是电影爱好者……

卡博写得多，亦博览群书。他夜以继日，迎着晨光，读将起来。他一直忠实地保持着阅读他人小说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中学时代在西帕吉拉养成的。当时，他把课本放在课桌下，用阅读诗歌代替学习动词时态在理论上的区别。迄今，他还仍然很感谢他的西语及文学教师卡洛斯·胡利奥：他知道，他的学生正用两腿夹着诗歌，弯着腰贪婪地学习着，他从不阻止他。他一直认为，这个来自阿拉卡塔卡的瘦弱青年，总有一天会成诗人。他直到与世长辞时都这样认为。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然是一位好的读者。在面对现实社会以前，他便沉浸在魔幻世界之中。每天，在他两小时的早晨活动中，他总是手里拿着三四本乐于交替着看的书。

如果故事不吸引人，他就毫不留情地把它放弃。如果非常有趣，他能一口气吞下整本书去。近期，他把早晨的时光用来读的书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著作；他还读约翰·卡雷的《浸润》。早在两年前，卡雷在写这部调查记时，曾给卡博打过电话，请他帮助他跟巴拿马社会的一些人物接上关系。卡博读的第三本书是劳拉雷斯特雷波的《向阳金钱豹》，这本书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因为他从中发现，这位哥伦比亚女作家是如何把新闻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他认为，本国没有给予这位作家应有的重视。

每天用两小时来读书已经足够了。

那么，卡博何时写作呢？再晚一点，大约是早晨 9 点钟。

现在，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又成了体育爱好者……在斯德哥尔摩

是因为著作奖赏他，也是由于体力奖励他。

卡博的运动之一是走路，在街上兜圈 5 公里。因为哥伦比亚暴力活动频仍，需有身强力壮的运动员或私人保镖跟随身后。尽管卡博的脸上满是汗珠儿，但是，那些起早的人，在臂下夹着一本书还是来到他的面前说：“大师，请您签个名。”他签名后，又继续奔走，继续大汗淋漓。每天走两小时路，或痛快地玩一小时网球，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9 点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饿了，然而，他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却要忍受着荷包蛋夹肥猪肉的诱惑，只吃水果和燕麦。他像运动员一样吃水果和燕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必须保持一种像漂浮物那样的饮食制度，必须按照尽可能健康的方式进早餐。必须保持体形。必须节制烈性食物，尤其要控制酒。漂亮的姑娘是文学的敌人（放荡不羁已经过时）。肝脏闹危机写不出好东西，或者不能像前一天那样写作。昨天是个乐观者，明天可能变成一个消极的人。牙疼也能成为创作灵感的敌人。总之，任何不适都能影响精神状况。因此，卡博要求像运动员那样，吃水果和燕麦。

最后，写作时间到了。从 9 点钟开始写到下午 2 点钟。当然，他当记者的时候，时间表是另外一个。在《旁观者报》工作的时候，他的同伴们都工作到夜里 11 点离开，而他仍继续和机器并肩战斗，一直战斗到凌晨 3 点或 4 点。这个时候他用不着撰写消息。而是进行文学尝试。他留在那儿，数小时地敲打机器的键，看着黑色的打字带绕着转。当时的目标是每日一页。那是十分成功的一页，优质的一页。

早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久以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学会了“说谎”，只要能和平地写作，尽管在他的家庭里都希望他很好地学习法律，最后从事法律事业或其他任何正当有益的职业。但是，他当时十分顽固，比现在更顽固地坚持写作。决意从事这种取胜可能性很小的职业。但是，卡博，这个新的执拗者，打定主意要这样干。他许下成为一个好作家的诺言，并尽可能地成为优秀作家。因此，他工作到清晨 3 点钟甚至 4 点。在撰写一部充满幽灵的著作。

但是，当他住在墨西哥的时候，那又是另一码事。时间已经不是他的了，他的时间是他的孩子们的。当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一所中学里学习代数 and 大陆史，学校只准他们呆到下午 2 点钟。于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学习白天写作——像现在一样——写到下午 2 点钟。然后去接儿子贡萨洛和罗德里戈，并正式宣布家庭生活开始。

30 年以来，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打字机仿佛是他不可分离的女朋友，是他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更是他的手延伸，使他得以平均每 7 年写出一部著作。但是，当电脑来到人间以后，卡博每两年就写出一部书。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遇到的新事物也越来越多，也发现了不少利用时间的新方法。然而，他最大的不安之一是每一部新书的开头，当开了新的头后，他的手就凉下来。使手再热起来又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连最善于冒险的矫形外科医生也解决不了。卡博发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方法，即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和手掌保持一种适当的温度，在写小说与小说之间，来写一种不使自己高度紧张的作品。他找到的这个妙方就是写回忆录。他已经写好了完整的一部分，定名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回忆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岁月。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新畅销小说是《爱情与魔鬼》。在书与书之间并没有休息，他每天都在写作，一直写到下午 2 点钟。当他写到一个满意的地方时就坐下来吃午饭。一般都是由他的妻子梅塞德斯陪着他，或由从世界某处来找他的一位朋友陪着。

吃过饭后点心，稍微休息一会儿。

午休之后，朋友也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户外，换换空气，消除一点儿疲劳，因为他每天的起点是从 5 点差 10 分开始的。

第十五章 飘泊的男子汉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法兰西共和国有着不解之缘。倘若将他的文学成就比作一股汹涌奔腾的洪流，那源头是拉丁美洲的苍茫大地、碧蓝天穹、座座高山和莽莽森林；洪流由涓涓溪水汇聚而成，然而，其中有一条小溪竟流自巴黎的塞纳河。

人们知道，青年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法国首都巴黎住了数年。他熟悉法国，法国人把他当作知己。

1995年，法国迎来了爱情的春天，人们喜上眉梢，在书店门口竞相购买封面为红底黄字的翻译小说《爱情与魔鬼》。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4年4月出版发行的这部小说，是继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又一部世界性畅销小说，由法国著名翻译家莫尔旺翻译出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法国出书，像在整个欧洲一样是件最大的文学盛事，因此所有评论家都立即给予关注，纷纷发表评论。

首先给予《爱情与魔鬼》足够重视的是法国较有影响的《世界报》。为了唤起读者的重视，该报在它的头版上登出了作者的照片、小说的简介、小说首发式的消息和音碟等；此外还发表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记。简讯和采访记都是《世界报》撰稿人福热尔写的。福热尔由于出版了《哈瓦那世纪之末》而在哥伦比亚颇有知名度。

在谈到《爱情与魔鬼》时，福热尔动情地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工作仿佛一种事业，旨在畅述光辉有缘的爱情，鞭打肆虐无度的爱情。”“从这一点来看，这部被译为法语的第十三部小说，像其他小说一样，值得给予高度热情的肯定。”

福热尔还提到近几年来在法国翻译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几部小说，即《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和《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等，都在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法国人都清楚地知道，福热尔对这位哥伦比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进行采访并录下音来是难得的，价值是很高的，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忙于写作，很少接待采访者。他能接待福热尔是对法国情有独钟，另眼相看。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说：“成百个向我发出邀请或提出要求者都将得不到我的答复，而回绝他们也并非困难。”因为“有个惟一规定，我上午不接待任何人，我把午饭前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他尽一切可能不让自己成为荣誉的俘虏。每天早晨5点钟他就起床，润色作品。乘飞机外出例外，但在飞回时的飞机上也改稿，以便驱逐惊恐情绪。

他对福热尔说，对《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他在原稿上改8遍，在清样上改3遍，一共改11遍。就这样在送去出版时还不放心。

福热尔说，如今生活幸福、住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面向加勒比海住所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动情地回顾他昔日住在巴黎，冻得发木，一贫如洗的情景。

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28岁的哥伦比亚记者，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并获过一次奖，但当时却游荡在巴黎街头，毫无目的和方向。

就是在这个前途渺茫的时刻，他在巴黎遇到两位各具特色的北美小说家。他将他们称为他的两位文学大师。

这两位文学大师，一位是威廉·福克纳；另外一位是曾从巴黎街角向他道别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总是萦绕我的一生。”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受过英国的乔伊斯、艾略特，法国的普鲁斯特、萨特和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等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他侨居巴黎时，读了他们的大量作品，从中得到了某些启迪，尽管他后来摒弃了那些与拉丁美洲的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

众所周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反帝斗士，反对美国以大欺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是对美国的文学精华和对法国的文化遗产还是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也许这是他侨居巴黎，刻苦钻研的收获。他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福克纳是一位与我的心灵有着许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是一位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

人们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侨居巴黎时，是在过着清苦的生活时遇上福克纳、海明威及其他欧美作家的，从他们那里汲取了某些东西，但是，他并不单纯沿袭欧美现代派的创作手法，而是结合本地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印第安文化，将上述创作手法加以丰富，形成魔幻现实主义。

尽管今天他住在风景如画的世界旅游名城卡塔赫纳，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侨居巴黎过着流亡生活时困难的经历迄今未忘。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拉丁美洲和欧美各国的很多杰出人士。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热尔说，今天，在卡塔赫纳可以遇到土著人、阿拉伯人、巴拿马运河的工人、中国人和他们的饭馆；他每天都和自己九十高龄的慈母在一起，与自己的夫人梅塞德斯在一起，但有时也不免回忆起年轻的时候流亡巴黎街头的情景……

巴黎，这个举世闻名的文化名城，曾留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少辛酸的昔日记忆：这里尽管有游人流连忘返的著名博物馆、美术馆、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凡尔赛宫和塞纳河……但当时食不果腹、专心写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哪有闲暇去光顾？

现在，巴黎的读者正在阅读这位曾流亡在巴黎的哥伦比亚作家的作品，因为这位小说家的天才像魔术一样，能将一片纸，或一句日常的话，变成一个世界或一个异常的生命。与《百年孤独》开头写的当一个孩子看见冰块同时发现金刚钻的奇迹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不停地用通俗语言创作出语言精炼、结构严谨、颇具魅力的小说来。

与法国有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69年法兰西学院选出他的《百年孤独》为当年最佳外国作品；1991年他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勋章；1992年他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

从地图上来看，位于南美洲北端、加勒比海南岸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漂泊在加勒比海上的明珠古巴这三个美丽的拉丁美洲国家，仿佛是个以古巴为上角，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为两个下角的三角形。

早在1957年至1961年间，作为记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加西亚·马尔

克斯曾繁忙地穿梭于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古巴之间，为报刊和通讯社撰写文章、消息，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被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派为驻欧洲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6年离开法国首都巴黎回国。同年他与等他4年之久的姑娘梅塞德斯结婚。这位出身于药剂师之家的姑娘既漂亮又贤惠，自此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恩爱的贤内助。

婚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便与爱妻梅塞德斯于1957年，离开内战阴影笼罩着的祖国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他在这个地处热带、海拔1000米、气候温和、风光秀丽的南美名城担任《旁观者报》驻外记者。

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发表了短篇小说《伊莎贝尔在马孔多的观雨独白》和获波哥大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颁发的文学奖的《周末后的一天》，以及中篇小说《枯枝败叶》3部作品。这3篇小说构思新颖、想象奇特、情节跌宕，笔法多变，带着浓重的恍惚迷离的色彩，突破了哥伦比亚当时小说的平淡无奇的写法，给平静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爽洁之风，使读者为之振奋和鼓舞。

然而，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位穷记者，既无名气，又无地位，所以当他的朋友赫尔曼把《枯枝败叶》寄给乌拉圭出版商出版时，发行量很少。更不幸的是，这位出版商接着又破产了，这部小说连同出版商的财产一同被没收了。

不管是前进的路上荆棘丛生，还是生活动荡不安，困难重重，都动摇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决心与信心。于是，他更加热情地写，夜以继日地写，连午休时间也不放下手中的笔。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尤其善于学习他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比如，他在1982年和好友作家门多萨谈写作经验时，当谈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作家、政治家胡安·博什几十年前说的关于写作修养的那段话时，他仍记忆犹新。他说：“大约25年前，我在加拉加斯听过胡安·博什的讲话。他说，作家这个职业，要求他的技巧，他的构思才能，甚至细腻而又难以察觉的巧夺天工般的描述，在青年时代都应该完全掌握。我们作家是些鹦鹉，年纪大了，就学不会说话啦！”这段话也许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几十年过后他仍念念不忘。

经委内瑞拉总统批准，于1964年在委内瑞拉设立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在1971年的第二次评奖时，从讲西班牙语国家的146位小说家的165部小说中，经过认真筛选，最后选出近5年内的优秀作品《百年孤独》。当评委会将这笔奖金（100万玻利瓦）授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后，他却把这笔奖金转赠给了委内瑞拉的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当时他仍是位穷记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授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1959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记者的身份，由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革命刚刚胜利的古巴进行访问，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同年，他被古巴官方通讯社拉美社聘任为驻波哥大特派记者。1960年任拉美社驻纽约分社副社长兼驻联合国记者。

此间，加西亚·马尔克斯穿梭于加拉加斯、古巴哈瓦那和哥伦比亚

首都之间，在繁忙的报道中并没忘记文学创作。1958年，他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原稿寄给好友赫尔曼；赫尔曼认为小说写得很精彩，就四处奔走，张罗出版；有人要求作家付4万比索出这部书，可哪里有这笔钱？后来，赫尔曼把原稿交给了豪尔赫，他当时正在办一份文化杂志，就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立即引起文艺界的极大震动，但是杂志的发行量不大。直到1961年，赫尔曼才在麦德林使这部小说得以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写了9遍，是他最好的小说。

作为古巴通讯社的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过一些有分量的报道古巴革命的通讯报道和消息，这种为古巴革命和人民服务的鲜明立场和做法，必然引起对古巴革命无比敌视的美国政府的不满和反对。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外出采访或办事时，腰里经常别着根铁棍以防不测，而挨臭鸡蛋袭击是家常便饭。他就是在这种敌对包围下，一直工作到1961年4月辞职为止。

在此期间，他加深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同时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所以，他写出的一些文学作品都带着强烈的反帝情绪。如《百年孤独》和《格朗德大妈的葬礼》等。他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反对原苏联的很多做法，认为那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说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加西亚·马尔克斯迄今仍然和古巴人民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和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过从甚密。据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被人称之为“哈瓦那大度的政治家”，他在哈瓦那的住宅已成为回忆古巴革命的友谊室。

此外，据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担任古巴拉美社记者时，经常光临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借阅新闻稿，一阅就是很长时间；看累了就靠在长沙发上休息片刻。因此，他和新华社的友谊自60年代就开始了。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57年至1961年任记者期间，不仅履行了记者的光荣职责，而且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自1961年起他基本上结束了记者生涯，走上了文学之路，即由记者成了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5年被哥伦比亚的《旁观者报》派为驻欧洲的记者，使他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经历了欧洲文明的熏陶。他采访过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旁观者报》于1957年改派他任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记者。驻欧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如饥似渴地博览了欧洲诸国文学名著，研究了卡夫卡等世界一流作家。同时，他还精读了美国名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的作品，并视他们为导师，尽管他仅在巴黎街头毫无目的和方向游荡时见过海明威一次。

欧洲，对于当时身为记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欧洲的几年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而立”之前后的人生磨练之年。自从哥伦比亚独裁政府查封《旁观者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断绝了生活的一切来源。他住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旅馆里，吃穿无着，连房租也只能将他的小说原稿拿出来作抵押……

中国有古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一边勤奋写作，一边等待着国内寄款糊口的时候，方能创作出他自己的得意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因为流亡欧洲，生活拮据，经常出入于下等酒吧和咖啡馆，他才认识了移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即认识了阿根廷人、墨西哥人、哥斯达黎加人、智利人、巴西人，因此才意识到他是属于他们这些人的拉丁美洲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当时他是一个文学上的流亡者。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种种写作的动机，试图去认识现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所以流亡实际上使他了解了其他的国家，对他的文学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期间，他不仅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且还为他后来发表的《百年孤独》打好了部分腹稿。同时他于1992年出版的由12篇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集，构思于70年代初。这部名为《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的小说集均由作者在欧洲所见所闻引发而成，也是作者旅居欧洲长期流亡生活的情结。

他本来不想再回顾在欧洲的朝朝暮暮，而当他决定开始写短篇小说的那天起，仿佛又收回了他说过话。作为一项写作计划，曾经陪伴加西亚·马尔克斯达10年之久，或者更长些。但是直到90年代初才写作和发表这些故事，并且又几乎是断断续续的。

从整体上来看，尽管这个集子里的大多数篇章都是无关紧要的故事，但所有这12篇小说都写于欧洲，写于欧洲的大城市。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巴塞罗那、巴黎、罗马、日内瓦这一系列大城市亲自认识了一个大的欧洲。据他所说，主要题材是“在欧洲的拉美人身上发生的奇异的事”。但又像是一种笑话，因为在拉美人身上发生的这些奇异的事，其实又没有在任何人身上发生过。都是些神奇的或讽喻性的事。尽管不是些绝妙的事，但它们仿佛是从马尔克斯魔幻的温室里被一股温流挤出来的，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把这些故事放在一个再好不过的旅游的氛围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些故事基于新闻的事实，但又具有诗灵感。谈起这些故事的时候，既让人觉得都是真实的，但又有诗的意境和诗化的语言。同时这些故事仿佛是寓言，在过于理智的欧洲人中间闯入一群思念故乡的拉美人，他们虽然有点野蛮，但愿意为理智献出一切，甚至于去死。

在12篇小说中，最好也是最长的小说是《总统先生，一路顺风》，它不带任何魔幻色彩。故事里集中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惯用的优秀的描写手法，写的是，一个来到日内瓦的加勒比的老年总统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他来欧洲流亡时身上仅有一个玻利瓦，在渡海时并没有死。他病了，需要动手术，可钱从哪儿来？他的同胞帮助了他。帮助他的同胞是一对生活困苦的劳动者，他们富有强烈的同情心，将他们要回加勒比的部分路费节约下来，帮助这位总统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而当他回到加勒比之后，便开始幻想要复辟。故事说明，在拉丁美洲幻想是自然而

然的事，同时可怜的欧洲平淡无味的生活也是那个总统回国的一个理由。

这本集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饱含着一种悲伤感。比如有几个收入的故事：《睡美人的飞机》、《八月的恐慌》和《十七个中毒的英国人》等。都简练得出奇，仅仅一件奇怪的事，经过作者的发挥，就形成一篇小说。并赋予它某种神奇的激情，仿佛一首带着悬念的歌。

在这部几乎每篇都有伤感成份的小说集子里，却可以随手将大放异彩的比喻和大发的诗兴捡出来。这毫不奇怪，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对诗歌情有独钟，在那种苦不堪言的文学流亡中，虽然自己不去写诗，却把诗情画意融于自己作品的人物和故事里。

小说中充满伤感：“她”是个76岁的老妓女，醉心于安排自己的丧葬后事。她经常训练她的狗去墓地里找她未来的墓，并在墓前洒狗泪。

这部作品集中，回复到纯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只有《光就像水》这篇小说。有两个小男孩，他们怀念他们那个位于海边的哥伦比亚的家，但是，他们却被关在他们在马德里的一座有许多层的楼房的公寓里。这时候，他们收到一个经过强烈要求后的檣，人们对他俩说，“光就像水”，他们可以依照这个比喻去航行。于是两个男孩砸碎了一个灯泡，结果发现，他们可以把光液化，并把自己父母的马德里寓所变成一个水上运动场。行人发现一股光的瀑布从一座掩映在树丛中的楼上倾泄下来……人们强行打开这五层楼的房门，发现满室直到天花板都是光。这不管看起来有多迷人，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这类古怪的念头走。

《她只为在电话上说话》这一篇是逃避现实的，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的汽车夜晚搁浅在一片荒地上，她寻求帮助的单位是个收容所。在那里，人们像对待一个“很重的”病人般对待她：给她提供了镇静药，并诊断出她被暴力行动所感染，“患的是一种打电话着魔症”，因为她希望通知她丈夫，让他把她从那个地狱里救出来。

小说《圣人》说的是一个老者拖着一具棺材在罗马城里转了25年，棺材里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但神奇的是那尸体永不腐烂。这个老者企图竭尽一切力量要找到一批主教，指望他们把他女儿变成圣人。

这些小说的场景都没有作具体描写，但气氛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为凡是到过欧洲都市游览的人都会体会到。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某些比喻常常是忧伤的语调，赞美人与人之间那种单纯的社会交流。还有“和她们呆在一起乃是人类的快事”一句中的形容词“人类的”一词精确而奇特的分量。那蓝、粉红和绿色鲜艳夺目的色彩呈现出异国的情调，也许正是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使我们忘记去询问那些阳伞怎么被战争的雨水腐蚀得如此厉害。

《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作者青年时期流亡在欧洲的生活。这些小说写的都是移居欧洲的南美人和加勒比人的故事，笼罩着一种古怪、不安、思乡和懊悔的气氛。而小说中的环境是日内瓦、罗马、巴黎、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维也纳。这些世界性的城市里住满过路的游人。这些人之中，有来自拉丁美洲诸国的，因为手里不宽裕，他们往往住在廉价的旅店或偏远可怜的地方。

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将拉美的现状与欧洲的情况相比较，以

便他对拉美的问题看得更透彻。

欧洲情和对拉美的爱交织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当时流亡在欧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态。

1982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自50年代末，他的小说就把我们领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

许多评论家甚至认为《百年孤独》还隐隐地浓缩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称赞《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也被认为是“继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天才们之后，继巴勃罗·聂鲁达之后最伟大的天才”，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陶醉于他的辉煌业绩。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作家，是一个政治态度特别鲜明的作家，他在荣誉面前总是谦虚谨慎的。

附 录

马尔克斯年表

1928年3月6日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镇，他是电报员和上校女儿之长子。8岁以前，他由其母亲的姑母和他的外祖父母抚养。在学文化前先学绘画，他读的第一本书是《一千零一夜》。

1936年他的外祖父死后，他回到父母身边，被送到巴兰基利亚读小学。

1940年进西帕吉拉国立寄宿中学上学，开始写诗，博览世界文学名著，领导十三人文学小组，创办《地平线》杂志，担任主编。

1947年被录取为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学生。并创作了第一个故事，迈出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步。

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他中途辍学，移居卡塔赫纳。在当地大学继续学习法律的同时，开始为《宇宙报》写新闻报道。

1950年由卡塔赫纳去巴兰基利亚，担任《先驱报》专栏作家。同时悉心积累创作素材，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

1954年回首都波哥大，担任《旁观者报》记者，撰写通讯报道。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有：《死亡联想曲》（1948）、《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1948）、《兰彼罗的眼睛》（1951）、《有人弄乱了玫瑰花》（1952）。

1955年作为《旁观者报》记者去日内瓦，但他乐于在罗马电影摄影中心学习。发表短篇小说《伊莎贝尔在马孔多的观雨独白》和中篇小说《枯枝败叶》。

1957年访问东欧各国，并将所写文章结集为《铁幕内的九十天》。

1958年在波哥大《神话》杂志上发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作为《旁观者报》驻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记者访问古巴。被聘任为古巴新政府的新闻社驻波哥大记者。

1960年作为古巴拉丁社记者被派驻纽约和联合国，写了不少同情古巴革命的文章。

1961年辞去拉丁社记者之职，移居墨西哥，小说《恶时辰》获埃索小说奖。

1962年发表小说《格朗德大妈的葬礼》和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这个镇子没小偷》、《周末后的一天》。

1963年在华特广告社工作。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曾根据鲁尔弗的小说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金公鸡》。

1967年1965至1966年在墨西哥专心致志创作《百年孤独》，1967年在阿根廷发表。在此期间还发表如下短篇小说：《巨翅老人》（1968）、《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1968）、《魔幻舰的最后一次旅行》（1968）、《布拉加曼，一个优秀的推销员》（1968）、《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1970）和《放荡时期的海洋》。1967年移居西班牙巴塞罗那。

1971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

1972年发表《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

1973年《百年孤独》获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即拉丁美洲文学大奖。

1974年发表《蓝色鱼的眼睛》。由巴塞罗那回墨西哥居住。

1975年发表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为抗议智利军人发动的推翻法制总统阿连德的政变而举行文学罢工，自此搁笔5年之久。

1976年生活在墨西哥城、哈瓦那和圣菲波哥大之间。

1981年发表《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参加坎昆会议。

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因哥伦比亚发生大地震，他回到祖国。

1984年这年1月返回墨西哥，2月重新回到哥伦比亚名城卡塔赫纳，并在那里定居。

1985年发表了他的首部爱情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认为，写这部小说时期是他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1989年发表《迷宫中的将军》。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1992年发表他的第二部爱情小说《爱情与魔鬼》，它可以和《百年孤独》相媲美。

1996年被瑞士《周报》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作家”。

